



# 社会心理服务

湖州市社会心理学学会

2021

(增刊)



# 社会心理服务

## (半年刊)

### 浙内准字第 E083 号

编委会主任：陈传锋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陈卫星 郭建根

金岍立 史金芳

王文岭 吴 松

熊 华 张宝元

章立平 周继平

主 编：张宝元

副主编：史金芳

责任编辑：(按姓氏拼音为序)

陈汉英 冯 霞

李梦霞 陶维东

俞文奇

主管单位：

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

湖州市社会心理学会

承印单位：

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

本期编印 100 册

发送对象：会员

## 目 录

### 身心健康与社区服务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

宋省成 谢瑞波 丁菀 吴伟 陈艳华 李伟健 1  
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

结果预期和主观规范的作用 王逸文 陈海德 10

### 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

中学生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吴秋红 徐淑慧 胡瑜 19

俯身开怀，协同规划——谈学优生心理问题初期的家庭调适策略 薛慧 24

在语文日常教学中如何利用舒尔特训练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罗欣蔚 29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实证研究 袁全云 36

###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咨询

“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COVID-19 疫情防控期在线教育下小学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

许科威 吴文婷 梅思佳 周凡 陈莉 44

沙盘游戏对幼儿攻击性行为的个案干预研究

楼晶 56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沉迷网络游戏学生中的运用

沈婷婷 60

沙之物语，“蝶变”从心开始——基于心理沙盘游戏对儿童辅导的个案研究 邵琳 64

###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犯罪青少年的形成因素及预测模型评估

徐淑慧 70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对暴力风险罪犯的影响 胡宗南 倪金荣 张友良 俞文奇 史金芳 83

### 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

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胜任特征构建研究

时勤 李秉哲 杨雪琪 李晓琼 90

长江三角洲高端人才智能匹配的初步探索

时勤 王译锋 宋旭东 王明山 方鹤 覃馨慧

焦松明 97

地址：湖州市仁皇山路 1141 号心助心理二楼

电话：2677598

邮箱：52687525@qq.com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邮编：313000



#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

宋省成 谢瑞波 丁菀 吴伟 陈艳华 李伟健

浙江师范大学 1954632423@qq.com 321004

**摘要：**为探究父亲协同教养对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父子依恋和自尊的中介作用，采用父亲协同教养问卷、父子依恋问卷、自尊量表以及长处与困难问卷对 613 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2) 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中介作用显著，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留守儿童；父亲协同教养；父子依恋；自尊；问题行为

##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民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到城市工作，但由于各种压力，他们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家庭。因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而被迫留在户籍所在地，长期与父母分离的未成年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段成荣，周福林，2005)。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有 6102.55 万，占全国儿童总数 21.88%(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内在化问题行为(抑郁、孤独、焦虑等)和外在化问题行为(攻击、违纪、犯罪等)显著高于一般儿童(Zhou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0)。留守儿童的早期问题行为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发展，因此，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十分必要。根据问题行为的社会心理模型，对于问题行为的研究既要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又要考虑内部心理因素(Jessor, 1987; 张永欣等，2018)。然而，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减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留守儿童内在的积极心理品质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拟从外部因素(协同教养、亲子依恋)和内部因素(自尊)综合考察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父亲协同教养是指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父亲对于母亲教养行为的支持和破坏，是父亲对母亲教养态度和行为的反应(Mchale, 1997)。父亲协同教养分为团结、一致、冲突

和贬低四个维度，其中团结、一致是积极协同教养行为，冲突和贬低是消极协同教养行为(刘畅等，2017)。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属于微系统，对儿童的发展起着最直接的影响(Bronfenbrenner, 1986)。其中协同教养作为家庭系统中的一个三元子系统(Minuchin, 1974)，对儿童问题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协同教养对于儿童的众多发展结果都具有解释作用(Teuber & Pinquart, 2010)，如积极协同教养有助于减少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Schoppe et al., 2001)，消极协同教养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Margolin et al., 2001)。在留守家庭中，绝大多数以父亲外出为主(李松，2006)。虽然父亲与留守儿童交往上存在距离远、互动频率低等问题(李庆丰，2002)，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协同母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养。因此，父亲协同教养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以往关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中较少考察父亲协同教养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假设 1：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父亲消极的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中的溢出假说(spillover effects)，协同教养可以通过其他家庭子系统来影响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发展

(Feinberg, 2003)。作为父母子系统的父亲协同教养可能会溢出影响父子子系统内的父子依恋(Minuchin, 1985)。父子依恋是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是父子二元关系的核心特征(Cassidy, 2008)。以往研究发现协同教养是父子依恋的重要预测变量(Brown et al., 2010),积极的父亲协同教养能够促进良好的父子依恋,而消极的父亲协同教养则会阻碍父子依恋的发展(黄彬彬等, 2019)。在农村留守家庭中,父亲外出是普遍存在的留守模式(李松, 2006),父亲长期在外务工使得他们对于儿童的教养主要通过协同母亲教养的方式进行。当父亲对母亲的教养行为表现出肯定与支持时,儿童会感到即使父亲在外务工也依然和母亲一起关心自己,从而有利于父子依恋的建立(黎志华, 2012);相反,当父亲对母亲教养行为表现出否定或贬低时,儿童会觉察到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不利于父子依恋的发展(黄彬彬等, 2019)。此外,有研究进一步发现高质量的父子依恋能够预测儿童较低的问题行为(Lieberman et al., 1999),而低质量的父子依恋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内外化问题行为(Wang et al., 202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父子依恋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亲协同教养和亲子依恋虽然与儿童的问题行为紧密相关,但是其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儿童问题行为的状况,儿童自身的内部核心因素自尊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陆京军等, 2014)。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积极评价,是自我的核心成分(Leary & Baumeister, 2000)。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场所,是最先影响儿童自尊发展的外界因素(贾高鼎等, 2016)。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自尊的影响,罕有研究考

察父、母、子三元关系的协同教养对儿童自尊的影响。鉴于留守儿童家庭特点,尤其父亲长期在外,父亲协同教养对于留守儿童的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其对留守儿童自尊的影响。此外,自尊作为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儿童的问题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Jeong et al., 2020)。自尊的缓冲假说认为,自尊能够缓解压力带来的不利影响(Orth et al., 2009)。对于处境不利的留守儿童来说,自尊能显著负向预测他们的内化情绪问题(杨会芹, 刘晖, 201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Bowlby & Bretherton, 1982)认为依恋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式起作用的,这种内部模式是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与自我有关的概念,其中自尊是重要成分(邓林园等, 2015)。以往研究发现,父子依恋与儿童自尊显著相关(Pinto et al., 2015),父子依恋质量是预测个体自尊水平的重要因素(刘真等, 2019)。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测父亲协同教养可能会通过父子依恋作用于留守儿童的自尊,进而影响其问题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此外,儿童的问题行为是动态发展的,小学中年级儿童的问题行为显著高于高年级儿童(刘广增等, 2018),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小学三年级是儿童问题行为发展的高峰期(韩绍欣, 2005)。鉴于小学三年级儿童问题行为较为突出,本研究将选取 613 名小学三年级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并提出假设模型如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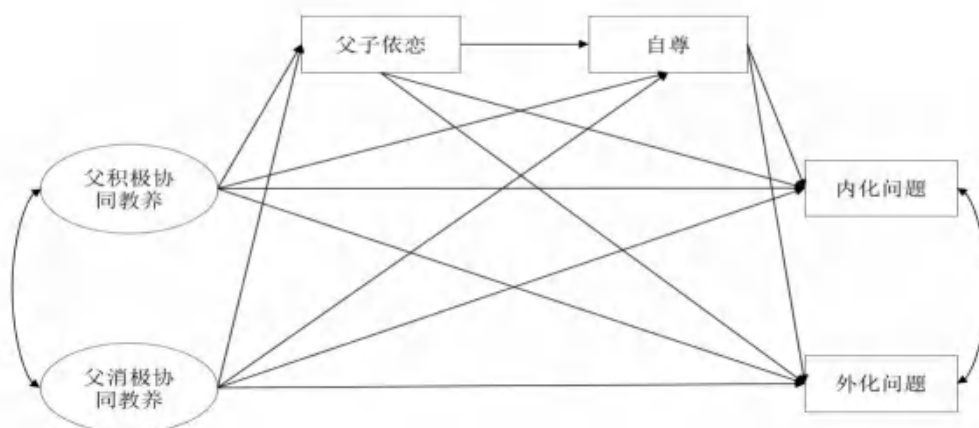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本文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1037名小学生三年级儿童中根据父母外出情况最终筛选出613名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400人,女生213人。儿童平均年龄 $9.63 \pm 0.92$ 岁,年龄主要集中在9-11岁,其中9岁儿童264人(43.07%),10岁儿童239人(38.99%),11岁儿童58人(9.46%),其他年龄阶段儿童30人(4.82%),缺失人数22人(3.59%)。

### 2.2 研究工具

#### 2.2.1 父亲协同教养问卷

采用了McHale(1997)编制,刘畅等人(2017)修订的父母协同教养问卷中的父亲问卷,其中包括团结、一致、冲突、贬低四个维度,团结和一致是积极协同教养方式,冲突和贬低是消极协同教养方式。问卷共29道题目,采用7点计分,1分表示“从不”,7分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该行为越多。本研究中父亲协同教养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5,其中积极协同教养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5,消极协同教养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4。

#### 2.2.2 父亲依恋问卷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编制,金灿灿等人修订(2010)的青少年亲子依恋问卷中的父子依恋问卷,包括15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这样”,5表示“总是

这样”。问卷分为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其中信任与沟通的分数相加再减去疏离的分数为最后的依恋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依恋状况越好。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是0.88,其中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是0.84、0.86、0.67。

#### 2.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共有10道题目,采用4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该量表为单维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是0.67,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指标分别为 $\chi^2/df=1.60$ , CFI=0.98, TLI=0.97, RMSEA=0.03, SRMR=0.03,拟合指标可以接受。

#### 2.2.4 长处与困难问卷

采用Goodman(1997)编制的长处与困难问卷,该问卷包括情绪症状、同伴交往、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问题四个方面。问卷共20道题目,采用3点计分,1表示“不符合”,3表示“完全符合”。参考Goodman等人的划分标准(Goodman et al., 2010),内化问题包括情绪问题和同伴交往两个维度,外化问题包括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问题两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多,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是0.87,其中内化问题的Cronbach's  $\alpha$  是0.78,外化问题的Cronbach's  $\alpha$  是0.74。

##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在征得学校、家长和学生本人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测试开始前由主试讲解指导语,在班主任的帮助下指导学生独立作答,测试结束后统一回收问卷。采用 Spss 25.0 和 Mplus 8.3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23 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8.12%, 小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 3 结果

### 3.1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父亲协同教养各维度、父子依恋、自尊以及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父亲积极协同教养与父子依恋、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儿童的内外化问题相关不显著;父亲消极协同教养与儿童内外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父子依恋相关不显著;父子依恋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且两者都与儿童的内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 $n = 613$ )

	$M \pm SD$	1	2	3	4	5	6	7	8
1 团结	29.90 ± 11.76	1							
2 一致	44.98 ± 16.01	0.74**	1						
3 冲突	19.34 ± 10.59	0.32**	0.36**	1					
4 贬低	18.55 ± 11.55	0.33**	0.27**	0.64**	1				
5 父子依恋	24.27 ± 9.38	0.34**	0.32**	-0.04	-0.03	1			
6 自尊	30.35 ± 4.60	0.23**	0.25**	-0.15**	-0.14**	0.35**	1		
7 内化问题	18.03 ± 3.54	-0.04	-0.03	0.27**	0.25**	-0.13**	-0.28**	1	
8 外化问题	17.34 ± 3.56	-0.05	-0.04	0.32**	0.37**	-0.19**	-0.32**	0.60**	1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 3.2 父子依恋和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检验

以留守儿童的父亲积极、消极协同教养为自变量,父子依恋和自尊为中介变量,内外化问题为因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良好( $\chi^2/df = 3.00$ , CFI = 0.989, TLI = 0.965, RMSEA = 0.057, SRMR = 0.012)。结果显示(如图 2),父亲积极协同教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父子依恋和自尊( $\beta = 0.52$ ,  $p < 0.001$ ;  $\beta = 0.37$ ,  $p < 0.001$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父子依恋和自尊( $\beta = -0.29$ ,  $p < 0.001$ ;  $\beta = -0.35$ ,  $p < 0.001$ ),父子依恋显著正向预测自尊( $\beta = 0.20$ ,  $p < 0.001$ ),但对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 $\beta = 0.02$ ,  $p > 0.05$ ;  $\beta = -0.02$ ,  $p > 0.05$ ),而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

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beta = -0.17$ ,  $p < 0.001$ ;  $\beta = -0.15$ ,  $p < 0.001$ )。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如表 2),父子依恋在父亲积极与消极协同教养到留守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 95% 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其中介作用不显著。其他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中介路径显著。进一步对各条路径在两组中的差异进行 Wald 检验发现,父亲积极协同教养通过自尊影响留守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与通过父子依恋到自尊这一链式中介影响留守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chi^2 = 7.98$ ,  $df = 1$ ,  $p < 0.05$ ;  $\chi^2 = 7.84$ ,  $df = 1$ ,  $p < 0.05$ ),自尊中介的效应量显著大于父子依恋到自尊这一链式中介的效应量(-0.02 vs. -0.06; -0.02 vs. -0.06);父亲消极协同教



养通过自尊影响留守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与通过父子依恋到自尊这一链式中介影响留守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 $\chi^2 = 10.34$ ,  $df = 1$ ,  $p < 0.05$ ;  $\chi^2 = 10.27$ ,  $df = 1$ ,  $p < 0.05$ ), 自尊中介的效应量显著大于

父子依恋到自尊这一链式中介的效应量 ( $0.01$  vs.  $0.06$ ;  $0.01$  vs.  $0.05$ )。因此, 父亲协同教养主要是通过自尊这一个体内部因素来影响留守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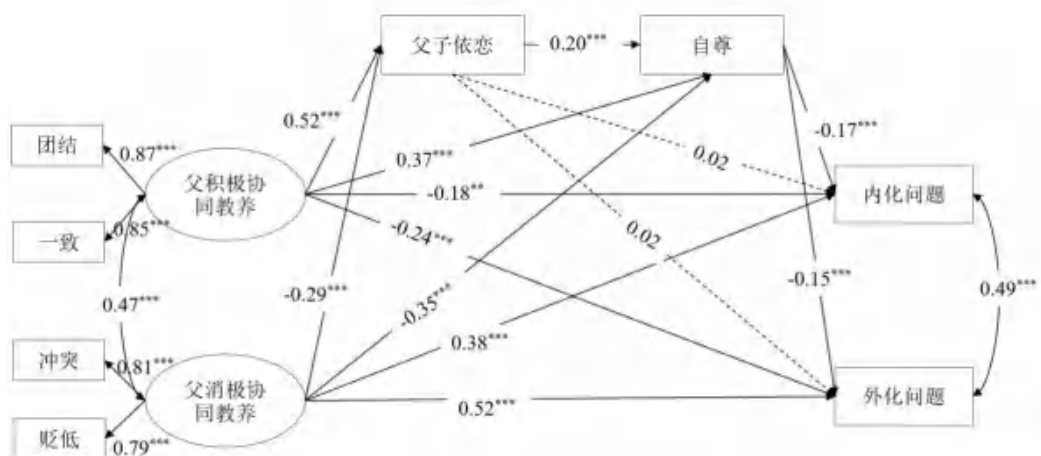


图2 父子依恋和自尊的中介模型图

表2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父子依恋-自尊-内化问题	-0.02*	8%	-0.03	-0.01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自尊-内化问题	-0.06**	24%	-0.11	-0.03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父子依恋-自尊-内化问题	0.01*	2.27%	0.004	0.02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自尊-内化问题	0.06**	13.63%	0.03	0.10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父子依恋-自尊-外化问题	-0.02*	6.06%	-0.03	-0.01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自尊-外化问题	-0.06**	18.18%	-0.10	-0.03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父子依恋-自尊-外化问题	0.01*	1.70%	0.003	0.02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自尊-外化问题	0.05**	8.47%	0.02	0.09

#### 4 讨论

##### 4.1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预测留守儿童较少的问题行为, 父亲消极协同教养预测留守儿童较多的问题行为。结果显示父亲积极地为母亲提供支持性的教养行为, 不仅可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情感氛围, 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 同时也能够减少孩子问题行为的发

生, 相反如果父母之间相互破坏、贬损, 可能会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从而导致儿童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这一结果不仅丰富了协同教养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留守家庭中的应用, 同样也说明了即使父亲很少与儿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但是父亲仍可以通过协同母亲来参与儿童的教养从而影响其以后的行为发展。这也提示我们即使父子分离, 父亲仍然在留守儿童的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另外, 本研究发现父亲积极协同教养与消极协同教养呈正相关。可能由于以往关于协同教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的核心家庭中, 但在受到“家本位”传统思想的中国家庭结构中, 父母之间的协同教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刘畅, 伍新春, 2015)。在农村留守家庭中, 由于育儿观念与夫妻之间相处模式不够完善, 父母之间的协同教养可能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 当父亲认同母亲的教养时, 父亲会对母亲的教养行为表现出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相反, 当父亲反对母亲的教养时, 父亲会否定甚至贬低母亲的教养, 从而对母亲的教养行为做出负面的评价。此外,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本身可能更为敏感(张春阳, 徐慰, 2012), 他们更容易觉察到父母之间积极配合或消极冲突的氛围。因此, 留守儿童可能会同时感受到父亲的积极协同教养与消极协同教养。

####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另外, 本研究表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不仅发现了父亲协同教养主要通过自尊这一内部因素来影响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 也填补了以往关于留守家庭的协同教养与自尊相关研究的空白。因为父亲积极的协同教养促进了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 减少了父母之间的冲突对立(陈小萍, 安龙, 2019), 所以儿童感受到了和谐的家庭氛围和父母关爱, 有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看待事物的视角, 从而促进其自尊水平的提高。此外, 本研究也支持了自尊的缓冲假说(Orth et al., 2009), 由于留守儿童需要面对父母关爱缺失的压力, 低自尊的儿童缺少足够的应对资源从而导致问题行为, 而高自尊的个体拥有较多的应对资源可以缓解压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范兴华等, 2018), 从而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积极性评价(Leary & Baumeister, 2000), 考察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的机制, 减少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 同时也可以提高留守儿童对自己的评价, 使他们

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走出一条积极发展的人生道路。

#### 4.3 父子依恋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父亲协同教养可以通过父子依恋来影响留守儿童的自尊从而作用于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具体而言, 父亲积极的协同教养有利于促进父子之间积极的互动从而提高了父子依恋的质量, 而这种高质量的父子依恋会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邓林园等, 2015), 使他们对自己做出更积极的评价从而减少内外化问题行为。该结果支持了问题行为的社会心理模型, 对于问题行为的研究既要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又不能忽略内部心理因素, 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父子依恋还可以通过内部心理因素的自尊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发展(Jessor, 1987; 张永欣等, 2018); 同时也进一步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 代表父母子三元关系系统的父亲协同教养会溢出影响到近端环境变量的父子依恋, 进而通过个体内部因素作用于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这也提示我们当父亲消极协同教养降低留守儿童的父子依恋时, 他们也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内部的积极品质来降低外界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刘真等, 2019)。留守儿童本身就处于不利环境, 只注重减少问题行为并不能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减少问题”并不等于“积极发展”, 还应该在减少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提高自尊等积极心理品质, 建立“减少问题”和“促进发展”的新思路, 使他们即使处于不利环境下也可以做出积极的认知与评价, 从而获得更好地发展。

#### 4.4 父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亲协同教养不能通过父子依恋影响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虽然父亲协同教养可以影响父子依恋, 但父子依恋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亲子分离, 他们的父子信任与父子沟通水平较低(李晓巍, 刘艳, 2013), 虽然父亲可以通过网络沟通来协同母亲的教养行为, 但是在父子交往上存在距离远、非面对面等特点(李庆丰, 2002), 这使得

父亲对于儿童的影响具有间接性,从而导致父子依恋不能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日常行为表现,而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父子依恋更可能通过个体内部稳定的品质去影响留守儿童的行为发展。这也提示我们,虽然父子依恋不能直接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但仍然可以通过内部的自尊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因此,即使父亲长期在外,父子依恋对留守儿童未来的行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 4.5 研究意义和局限

本研究以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考察了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及其内在机制的影响,不仅表明了父亲在留守儿童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发现了留守儿童自身积极心理品质在其面临不利处境中的重要保护作用。此外,本研究不仅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减少,同时也注

重留守儿童自身积极品质的提高,对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建立了“减少问题”和“促进发展”的新思路,也为未来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采用追踪设计进行验证。其次,本研究未对母亲协同教养,婚姻质量等因素进行控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控制其他家庭系统因素来检验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 5 结论

(1) 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2) 父亲协同教养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也可以通过父子依恋-自尊链式中介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

#### 参考文献

- 陈京军, 范兴华, 程晓荣, 王水珍. (2014).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2), 319-323.
- 陈小萍, 安龙. (2019). 父亲协同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安全感和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04), 803-807.
- 邓林园, 马博辉, 武永新. (2015). 初中生依恋与主观幸福感: 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2), 230-238.
- 段成荣, 周福林. (2005). 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 *人口研究*, 28(1), 29-36.
- 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陈锋菊, 余思. (2018). 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50(9), 1029-1040.
- 黄彬彬, 邹盛奇, 伍新春, 刘畅. (2019). 父亲协同教养行为与青少年同伴依恋的关系: 父子依恋的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2), 176-183.
- 贾高鼎, 曾明, 王爱平, 杨子京. (2016).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自尊的独特贡献: 儿童气质的调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535-539.
- 金灿灿, 邹泓, 曾荣, 窦东徽. (2010). 中学生亲子依恋的特点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父母亲密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6), 577-583.
- 黎志华, 尹霞云, 蔡太生, 苏林雁. (2012). 父亲参与教养程度, 父子依恋关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5), 705-707.
- 李庆丰. (2002).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 河南, 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 *上海教育科研*, (9), 25-28.
- 李松. (2006). 农村初中生“留守子女”家庭环境状况调查及其心理健康和学绩的影响. 郑州大学硕

士论文。

李晓巍, 刘艳. (2013). 父教缺失下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3), 493-496.

刘畅, 伍新春, 陈玲玲. (2014). 父母协同教养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4), 727-730.

刘畅, 伍新春, 邹盛奇. (2017). 父母协同教养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5-25.

刘广增, 张大均, 罗世兰, 房立艳. (2018). 8-12 岁儿童孤独感及其与父母情感温暖、问题行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3), 586-589.

刘真, 程文红, 肖泽萍. (2019). 自尊在父母依恋水平与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7(5), 481-484.

全国妇联课题组. (2013).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中国妇运*, (6), 30-34.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的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邢淑芬, 梁熙, 岳建宏, 王争艳. (2016). 祖辈共同养育背景下多重依恋关系及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5), 518-528.

杨会芹, 刘晖. (2014). 生活事件自尊及冗思对初中留守儿童内化情绪问题影响路径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6), 1107-1110.

张春阳, 徐慰. (2020). 大学生留守经历与攻击性: 安全感与自卑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1), 173-177.

张永欣, 周宗奎, 丁倩, 魏华. (2018). 班级同学关系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 自尊和亲子亲合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6), 732-741.

赵金霞, 李振. (2017). 亲子依恋与农村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关系: 教师支持的保护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3), 361-367.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Rev. ed., Vol. 1). New York: Basic Books, 27-42.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2nd ed.).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6), 723-742.

Brown, G. L., Schoppe - Sullivan, S. J., Mangelsdorf, S. C., & Neff, C. (2010). Observed and reported supportive co-parenting as predictors of infant - mother and infant - father attachment security.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0(1-2), 121-137.

Cassidy, J. (2008). *The nature of the child's ties*. The Guilford Press.

Feinberg, M. E. (200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context of coparenting: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3(2), 95-131.

Goodman, R. (1997).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8(5), 581-586.

Goodman, A., & Lamping, D., & Ploubidis, G. (2010). When to use broader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subscales instead of the hypothesised five subscales on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data from British pare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8), 1179-1191.

- Jeong, H., Yim, H. W., Lee, S. Y., Lee, H. K., Potenza, M. N., Jo, S. J., & Son, H. J. (2020).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self-esteem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subsequent features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children: a 12-month follow-up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20, 1-10.
- Jessor, R. (1987). Problem-behavior theory,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ing.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82(4), 331-342.
- Leary, M. R. & Baumeister, R. F. (2000).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Advance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2, 1-62.
- Lieberman, M., Doyle, A. B., & Markiewicz, D. (1999).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security of attachment to mother and father in lat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Associations with peer relations. *Child development*, 70(1), 202-213.
- McHale, J. P. (1997). Overtand covert coparenting processes in the family. *Family process*, 36(2), 183-201.
-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Ox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th, U., Robins, R. W., & Meier, L. L. (2009).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low self-esteem and stressful events on depression: Findings from three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2), 307-321.
- Pinto, A., Ver íssimo, M., Gatinho, A., Santos, A. J., & Vaughn, B. E. (2015).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s, peer acceptance, and self-esteem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7(6), 586-598.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oppe, S. J., Mangelsdorf, S. C., & Frosch, C. A. (2001). Coparenting, family process, and family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preschooler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5(3), 526-545.
- Scrimgeour, M. B., Blandon, A. Y., Stifter, C. A., & Buss, K. A. (2013).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7(3), 506-511.
- Teubert, D., & Pinquart, M. (201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parent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A meta-analysis.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10(4), 286-307.
- Wang, S., & Xie, F. (2020).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on Problem Behavio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1-10.
- Zhou, R. Y., Wang, J. J., & Ma, B. X. (2020). The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Pediatric Research*, 87(5), 802-803.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

## 结果预期和主观规范的作用

王逸文（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电子邮箱：1054111299@qq.com 邮编：321004）

陈海德（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电子邮箱：chenhaide351@126.com 邮编：321004）

**摘要：**考察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以及拒烟结果预期和主观吸烟规范的作用。对 924 名男性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2）拒烟结果预期在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3）指令性吸烟规范负向调节身份认同和拒烟效能感的关系。结果说明了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通过拒烟结果预期对拒烟效能感产生作用及受主观规范调节的机制。

**关键词：**男性吸烟者 拒烟效能感 身份认同 拒烟结果预期 主观规范

### 1 引言

我国吸烟者人数多年来居高难下，尤其是男性吸烟者。这可能因为分享香烟的行为被认为具有表达友好的意义。调查显示，80%以上的吸烟者认为拒绝别人递烟不礼貌，且这种观念是吸烟启动和维持的危险因素（褚成静，张岚，杨彦春，2010）。有研究者将“吸烟者能否对自己在他人递烟或要求吸烟的情况下抵制吸烟的评估”称为拒绝他人递烟效能感（简称“拒烟效能感”；Langlois, Petosa, & Hallam, 2006）。拒烟效能感对吸烟者戒烟有积极的作用。拒烟效能感可能与吸烟者身份认同密切相关（e.g., Blondé, & Falomir-Pichastor, 2020）。因此，本研究欲考察我国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影响及其社会心理作用机制。

吸烟者身份认同指个体对自己吸烟者身份的认同。有研究者通过交叉滞后分析表明了成瘾者身份认同是成瘾行为的前因（Hertel, Baldwin, Peterson, & Lindgren, 2020）。诸多研究表明，吸烟者身份认同越强，吸烟频率越高（Smith, O'Connor, Collins, Hyland, & Kozlowski, 2019），抵制吸烟的效能感越低（Blondé, & Falomir-Pichastor, 2020）。根据班杜拉（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对某种行为的结果预期是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基础（Bandura, 2001）。拒绝他人递烟的结果预期可能对拒烟

效能感有显著作用。拒绝他人递烟的结果预期（简称“拒烟结果预期”）是指个体对拒绝他人递烟后可能带来结果的判断（Langlois et al., 2006）。此外，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rcel, & Toby, 1978）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Willer et al., 1987）指出，群体会赋予所有成员积极或消极的期望，而个体往往希望从其认同的群体中得到积极的评价。个体越认同某群体的身份，越可能认同该群体的行为期望。当他们拒绝实施群体期望行为时，更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预期。有研究表明，身份认同显著预测相应行为结果预期（e.g., Cheung, Lai, Wu, & Ku, 2015）。鉴于此，本研究欲检验男性吸烟者拒烟结果预期在身份认同预测拒烟效能感中的中介作用。

个体的行为往往受主观规范的影响（e.g., Lac, Donaldson, 2018）。主观规范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和实施情况（Ajzen, 1991）。以往有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作用能够增强群体效能感，进而影响该群体的行动倾向（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身份一致性动机理论（Theory of Identity-based Motivation; Oyserman, 2007）认为，身份认同对相应行为的影响有赖于该身份是否被激活，而激活的过程又取决于

包含某种群体规范的情境。Frings 和 Albery (2015) 的成瘾戒断维持的社会认同模型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essation Maintenance) 认为, 个体周围的成瘾者越多且他们对成瘾的态度越积极, 则他的成瘾者身份认同越可能被激活。当个体拒绝做出成瘾者群体所期望的行为时, 可能产生消极结果预期, 进而降低抵制成瘾行为的效能感。鉴于此, 本研究欲考察男性吸烟者主观规范在身份认同预测拒烟结果预期和拒烟效能感中的调节作用。

主观规范可进一步区分为“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两者分别指个体感知到的所在群体实际吸烟行为和群体对吸烟行为的态度 (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规范焦点理论 (the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提出, 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具有并存性, 且它们对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陈思静, 何铨, 马剑虹, 2015; Chen, Cao, Gao, Xie, & Li, 2019; Li, Gao, Chen, Cao, & Sun, 2018; Phua, 2013)。描述性规范与个人目标相联系, 使个体更关注个体自我; 指令性规范与社会赞许的人际目标相联系, 使个体更关注社会自我 (Jacobson, Mortensen, & Cialdini, 2011)。例如, 陈思静等人 (2015) 发现, 当描述性规范低, 无论指令性规范高或低, 被试的合作行为水平都较低, 而当描述性规范较高时, 指令性规范的提高显著增加合作行为的水平。因此, 本研究欲比较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的不同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1: 男性吸烟者身份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 H2: 拒烟结果预期在身份认同和拒烟效能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 指令性吸烟规范在身份认同与拒烟结果预期、拒烟效能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H4: 描述性吸烟规范在身份认同与拒烟结果预期、拒烟效能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 2 方法

### 2.1 被试

先制作招募现在吸烟者参与在线调查的

广告 (广告中明确吸烟者的界定为“以往吸过烟且最近一个月有吸烟”), 然后通过主试亲朋好友的关系网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和 qq 群等平台广泛宣传招募广告, 最终招募到自愿参与调查的 1234 名现在吸烟者。删除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测谎题选择错误、一致性作答等情况的无效被试, 获得 1016 名有效被试。本研究以其中的 924 名男性吸烟者为样本。样本的年龄分布情况为: 青年早期 (29 岁及以下) 516 人 (55.8%)、青年期 (30-44 岁) 262 人 (28.4%)、中年期 (45-59 岁) 137 人 (14.8%)、老年期 (60 岁及以上) 9 人 (1%)。其中日吸烟量 5 支及以下 286 人 (31.0%)、6-10 支 236 人 (25.5%)、11-20 支 342 人 (37.0%)、20 支以上 60 人 (6.5%)。按照已有研究者制定的尼古丁依赖程度划分标准 (e.g., Ríos-Bedoya, Snedecor, Pomerleau, & Pomerleau, 2008), 尼古丁依赖轻度 (FTND  $\leq 3$ ) 582 人 (63.0%) 以及尼古丁依赖重度 (FTND  $\geq 4$ ) 342 人 (37.0%)。

### 2.2 工具

#### 2.2.1 主观吸烟规范

选用 Phua (2013) 编制的主观吸烟规范量表。量表共 6 个项目, 分为描述性吸烟规范 (如, “你的要好朋友 (包括好友、恋人) 有在吸烟”)、指令性吸烟规范 (如, “你的要好朋友 (包括好友、恋人) 赞成你戒烟”) 两个维度。项目采用 4 点计分 (1=非常不符合, 4=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吸烟者感知到周边人越赞同吸烟或者周边人吸烟行为越多。本研究 CFA 表明,  $\chi^2/df=3.85$ , CFI=.99, AGFI=.97, TLI=.96, RMSEA=.056 (90%CI=.028, .086), 两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62 和.74。

#### 2.2.2 拒烟效能感

选用 Langlois 等 (2006) 编制的拒烟效能感量表。量表共 9 个项目 (如, “你的长辈或领导不断地要求你吸烟”), 要求被试判断自己是否能控制住不吸烟。采用 4 点计分 (1=我完全控制不了, 4=我完全可以控制不吸), 得分越高表明拒烟效能感越高。本研究 CFA

表明,  $\chi^2/df=4.04$ , CFI=.99, AGFI=.96, TLI=.98, RMSEA=.057 (90%CI=.042, .073),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1。

### 2.2.3 拒烟结果预期

选用 Langlois 等 (2006) 编制的拒烟结果预期量表。设计的情境是“假设你和吸烟的朋友或领导一起玩, 这位朋友或领导给你递了一支烟。”要求被试判断自己拒绝他人递烟后可能发生的后果。量表共 5 个项目 (如, “这位朋友或领导会嘲笑或看不起我”)。采用 4 点计分 (1=肯定不可能发生, 4=肯定会发生)。得分越高表明对拒绝他人递烟的后果评估越消极。本研究 CFA 表明,  $\chi^2/df=1.98$ , CFI=.99, AGFI=.99, TLI=.99, RMSEA=.033 (90%CI=.000, .062),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70。

### 2.2.4 吸烟者身份认同

选用已有研究者编制的吸烟者自我认同量表 (Moan & Rise, 2005; Høie, Moan, & Rise, 2010)。量表共 4 个项目 (如, “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吸烟者”)。项目采用 7 点计分 (1=完全不符合, 7=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认同自己吸烟者的身份。本研究 CFA 表明,  $\chi^2/df=1.16$ , CFI=.99, AGFI=.99, TLI=.99, RMSEA=.013 (90%CI=.000, .090),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0。

### 2.2.5 尼古丁依赖量表和人口学信息问卷

选用 Heatherton 等 (1991) 编制的尼古丁依赖量表。该量表为自陈量表, 共 6 个项目 (如, “你是否在许多禁烟场所很难控制吸烟的需求?”)。项目转换计分后计算总分 (介于 0~10)。本研究 CFA 表明,  $\chi^2/df=4.63$ , CFI=.99, AGFI=.97, TLI=.94, RMSEA=.063

(90%CI=.042, .085),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66。

另外, 本研究自编人口学变量问卷, 包括性别、出生年月、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等级和健康状况等。

## 2.3 研究过程

数据收集采用网上测验形式。为提升调查的可靠性,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研究生担任主试, 采用一对一方式指导被试作答。先向被试介绍调查基本情况, 经被试同意后, 在其空闲时间发送问卷链接指导其作答。答题时, 主试全程在线及时解答被试填答过程中的困惑。测验结束后, 会向被试表示感谢。

## 2.4 数据分析

收集和整理数据后,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发现,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共 5 个, 第一个因素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24.59%, 低于 40% 的临界值, 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数据采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3.3 宏程序中的模型 4 先检验 H2 中介模型是否成立, 再使用模型 10 检验 H3 和 H4 是否成立。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 (重复抽样 5000 次), 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 95% 置信区间。

## 3 结果

### 3.1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

采用偏相关分析法, 控制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尼古丁依赖、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 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结果发现 (见表 1), 拒烟效能感与描述性吸烟规范、指令性吸烟规范、拒烟结果预期、身份认同显著负相关; 描述性吸烟规范、指令性吸烟规范与拒烟结果预期显著正相关。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i>M</i> ± <i>SD</i>	1	2	3	4
1 拒烟效能感	2.71 ± .69	—			
2 拒烟结果预期	2.28 ± .54	-.27***	—		
3 身份认同	4.76 ± 1.24	-.14***	.10***	—	
4 描述性吸烟规范	2.63 ± .69	-.11***	.16***	.22***	—
5 指令性吸烟规范	1.90 ± .63	-.12***	.23***	.08**	.30***



注: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下同。

### 3.2 拒烟结果预期中介作用检验

控制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尼古丁依赖、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采用 PROCESS 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身份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加入拒烟结果预期后,身份认同依然显著负向预

测拒烟效能感,拒烟结果预期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这表明拒烟结果预期在身份认同预测拒烟效能感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拒烟结果预期的间接效应量为 $-.027$  (95%CI =  $-.049, -.007$ ), 占总效应的 18.6%。

表 2 中介模型检验

	M: 拒烟结果预期			Y: 拒烟效能感		
	$\beta$	SE	95%CI	$\beta$	SE	95%CI
X: 身份认同	.105***	.035	.036, .175	-.119***	.034	-.185, -.053
M: 拒烟结果预期	—	—	—	-.258***	.031	-.319, -.196
U1: 年龄	-.069	.050	-.166, .028	-.112*	.047	-.205, -.020
U2: 婚姻状况	-.006	.049	-.102, .091	-.033	.046	-.123, .058
U3: 健康状况	.136***	.033	.071, .202	-.012	.032	-.074, .050
U4: 尼古丁依赖	-.009	.036	-.080, .062	-.095***	.034	-.162, -.027
U5: 社会经济地位	-.108***	.034	-.174, -.041	.116***	.032	.053, .179
C: 截距	.000	.032	-.063, .063	.000	.031	-.060, .060
$R^2=.044, F=6.997^{***}$			$R^2=.145, F=22.169^{***}$			

注: 变量分析时采用中心值,各回归系数为标准值,下同。

### 3.3 主观规范调节作用检验

同样控制年龄等额外变量,采用 PROCESS 中的模型 10 分析描述性吸烟规范和指令性吸烟规范在吸烟者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见表 3),身份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身份认同和指令性吸烟规范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

能感。而身份认同和描述性规范的交互项不显著。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当指令性规范较高(W:M+1SD)时,无论描述性规范高低,身份认同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而当指令性规范较低(W:M-1SD)时,无论描述性规范高低,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M: 拒烟结果预期			Y: 拒烟效能感		
	$\beta$	SE	95%CI	$\beta$	SE	95%CI
X: 身份认同	.072**	.036	.002, .141	-.118***	.035	-.186, -.050
M: 拒烟结果预期	—	—	—	-.242***	.032	-.305, -.179
W: 指令性吸烟规范	.196***	.034	.129, .264	-.032	.034	-.099, .034
Z: 描述性吸烟规范	.085*	.034	.018, .152	-.029	.033	-.094, .037

X×W	.035	.033	-.030, .099	-.064*	.032	-.126, -.001
X×Z	-.011	.030	-.070, .049	-.019	.029	-.077, .038
U1: 年龄	-.059	.049	-.155, .036	-.115*	.047	-.207, -.022
U2: 婚姻状况	.026	.048	-.068, .120	-.040	.046	-.131, .051
U3: 健康状况	.083*	.033	.018, .148	-.002	.032	-.065, .062
U4: 尼古丁依赖	-.015	.035	-.085, .054	-.094***	.034	-.161, -.027
U5: 社会经济地位	-.101***	.033	-.166, -.036	.113***	.032	.050, .177
C: 截距	.001	.032	-.064, .062	.009	.031	-.052, .070
$R^2=.098, F=9.891^{***}$				$R^2=.153, F=15.001^{***}$		
Direct effect (X→Y)				Effect	SE	95%CI
W: $M-1SD$ ; Z: $M-1SD$				-.035	.048	-.129, .058
W: $M-1SD$ ; Z: $M+1SD$				-.074	.059	-.190, .043
W: $M+1SD$ ; Z: $M-1SD$				-.163	.061	-.282, -.044
W: $M+1SD$ ; Z: $M+1SD$				-.201	.053	-.305, -.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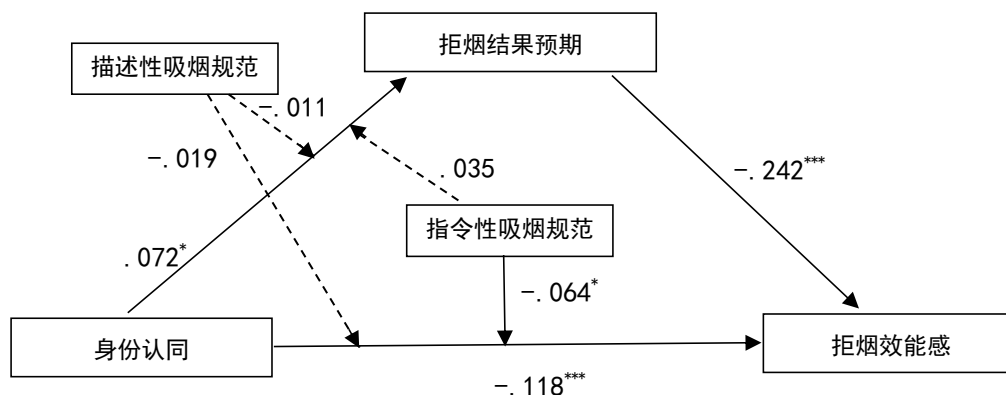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图

####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身份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拒烟效能感, 支持假设1。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 (e.g., Meijer et al., 2015)。这些结果也符合认知失调理论的假设, 即个体会做出与自己身份认知相符的行为。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拒烟结果预期在身份认同预测拒烟效能感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2。也有研究发现类似结果 (Cheung et al., 2015; Kassem et al., 2015)。可能原因如下。第一, 身份认同、结果预期、拒烟效能感的统一性有助于个体避免认知失调。根据认知失调理论 (Festinger, 1957), 当吸烟者身份被激活时, 拒烟行为会引发其认知失调状态 (Harmon-jones et al., 2015), 产生消极结果预期, 做出与自己身份认知相符的行为。第

二,对行为的结果预期可能导致该行为被激活或被选择。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Bandura, 2001),如果吸烟者预测到拒烟会导致消极结果,个体拒烟效能感会大大降低,那么这一行为可能不被选择。

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首先,指令性吸烟规范在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指令性吸烟规范越高,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作用越大。这可能原因如下。第一,个体某种身份认同的激活会随着情境中特定社会规范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身份一致性动机理论(Oyserman, 2007),在社交场合中,个体会根据群体成员身份定义自己,建构出共同的社会身份。群体越赞同吸烟行为(即指令性吸烟规范高),吸烟者越有可能激活吸烟者身份,这降低了他们在社交场合的拒烟效能感。第二,指令性规范与建立和维持更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直接相关。Jacobson等人(2011)研究表明指令性规范会激发更多的人际关系导向的自我觉醒。在社交场合中,吸烟者在思考自己是否有信心和能力拒绝对方递来的烟时,可能把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摆在首位。指令性规范在这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本研究发现,指令性吸烟规范在身份认同对拒烟结果预期的预测中不起调节作用。这可能的原因是,与源自微观系统的指令性规范相比,源自宏观系统的社会价值观在身份认同影响结果预期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生态系统模型强调了宏观系统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Bronfenbrenner, 1994)。我国社会文化特别强调关系建构。关系导向特征是我国国民人格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范为桥,张妙清,张建新,张树辉,2011)。无论群体成员是重要他人(如亲友)还是非重要他人(如不熟悉的人),该价值观均能发挥较强作用。我国吸烟者普遍持有“拒绝他人递烟是不礼貌行为”的观点(褚成静,张岚,杨彦春,2010)。该价值观的作用可能掩盖了指令性吸烟规范对我国吸烟者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描述性吸烟规范在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的预测中不起调节作用,结果

不支持假设4。这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指令性规范倾向于通过他人的态度来影响行为。相比较描述性规范,吸烟者如果不遵循指令性规范,就很可能受到社会排斥(Pagliaro, Ellemers, Barreto, & Leach, 2010)。个体为了避免社会排斥,而更会去遵循指令性规范而非描述性规范。第二,描述性规范可能存在“自食其果效应”,即会促使不良行为增长并产生误解(Perkins, Haines, & Rice, 2005)。描述性规范会使个体高估或低估了不良行为发生率,而规范焦点理论(Cialdini et al., 1990)认为指令性规范是防止“自食其果效应”的重要方法。据此,在认知层面激活指令性规范更能提高个体拒烟效能感。

本研究对已有戒烟理论有一定的贡献。首先,本研究从身份认同对拒烟效能感预测的视角切入,补充了效能感理论对吸烟者戒烟动机改变的解釋。另外,本研究表明了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以及指令性规范的调节作用,补充了身份认同理论对行为意向变化的解释。本研究结果对我国控烟实践具有一定启示。首先,须引导吸烟者意识到吸烟者身份认同转变的重要性,在戒烟期更是要重塑和强化其非吸烟者的身份。其次,须引导吸烟者意识到拒绝他人递烟不一定会产生消极结果。最后,媒体须通过宣传营造人人反对吸烟的公共氛围,从而削弱吸烟者指令性吸烟规范的感知。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完善。第一,吸烟者身份认同可能存在不同的维度——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这两个维度对行为可能有不同的作用(Suha & Sharif, 2018)。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考察和比较它们对戒烟的影响。第二,身份认同和效能感的关系不仅受到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作用,而且从效能感到实际行为也需经历一系列的心理加工过程(刘源,黄蕴智,2016;陈海德,曹柠梦,高峻峰,李伟健 & 李新宇,2018)。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身份认同对戒烟行为的影响及其具体的心理加工过程。第三,尼古丁依赖对吸烟行为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取样本大部分为尼

古丁依赖较低的吸烟者,未来研究可以获取更多古丁依赖程度较高的吸烟者,并比较社会心理因素对两类吸烟者影响的差异。第四,本研究采用网络填答问卷的形式调查吸烟者,样本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吸烟者被试。然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吸烟者对吸烟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5)。因而未来有必要专门针对此类被试开展调查研究。第

五,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和问卷调查法。一方面被试可能受社会赞许效应影响,对吸烟相关题目答题时有所隐瞒;另一方面难以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内隐测量范式、生态瞬时评估法等行为实验范式测量吸烟者吸烟行为,或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进而表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 参考文献

- 陈海德,曹柠梦,高峻峰,李伟健, & 李新宇. (2018). 吸烟利弊权衡对戒烟计划的预测作用: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科学*, 41(02), 423 - 429.
- 陈思静,何铨, & 马剑虹. (2015). 第三方惩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规范激活的解释. *心理学报*, 47(03), 389 - 405.
- 褚成静,张岚, & 杨彦春. (2010). 成年男性吸烟行为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 26(7), 850 - 853.
- 范为桥,张妙清,张建新, & 张树辉. (2011).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 CPAI 及其跨文化应用. *心理学报*, 43(12), 1418 - 1429.
- 刘源,黄蕴智. (2016). 从“想”到“做”——卢比孔模型的解释力和应用. *心理科学*, 39(3), 754 - 760.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 2015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2015). *上海预防医学*, 27(12), 752.
-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 - 211.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1 - 26.
- Bronfenbrenner, U. (1994). Ecolog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P. Peterson, E. Baker, & B. McGaw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Oxford: Elsevier.
- Blondé, J., & Falomir-Pichastor, J. M. (2020). Accounting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obacco dependence on cravings, self-efficacy, and motivation to quit: consideration of identity concerns.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3(34), 1 - 9.
- Chen, H. D., Cao, N. M., Gao, L. F., Xie, R. B., & Li, W. J. (2019). Comparing of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injunctive and descriptive norms on the willingness to quit smoking among chinese low - rate and regular smoker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4), 401 - 406.
- Cheung, F., Lai, B. P. Y., Wu, A. M., & Ku, L. (2015). Academic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youth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5(8), 1092 - 1107.
- Cialdini, R. B., Reno, R. R., & Kallgren, C. A. (1990).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recycling the concept of norms to reduce littering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6), 1015 - 1026.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ngs, D., & Albery, I. P. (2015).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essation maintenance: Formulation and initial evidence. *Addictive Behaviors*, 44, 35 - 42.

Harmon-Jones, E., Harmon-Jones, C., & Levy, N. (2015). An action-based model of cognitive-dissonance process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184 - 189.

Heatherton, T. F., Kozlowski, L. T., Frecker, R. C., & Fagerström, K. O. (1991). The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A revision of the Fagerström Tolerance Questionnaire.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86(9), 1119-1127.

Hertel, A. W., Baldwin, S. A., Peterson, K. P., & Lindgren, K. P. (2020). Identification with drinking predicts increases in drinking behaviors (but not vice versa). *Addictive Behaviors*, 116(6), 106796.

Høie, M., Moan, I. S., & Rise, J. (2010). An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Prediction of intentions to quit smoking using past behaviour as moderator. *Addic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5), 572 - 585.

Jacobson, R. P., Mortensen, C. R., & Cialdini, R. B. (2011). Bodies obliged and unbound: Differentiated response tendencies for injunctive and descriptive social nor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3), 433 - 448.

Kassem, N. O. F., Kassem, N. O., Jackson, S. R., Daffa, R. M., Liles, S., & Hovell, M. F. (2015). Arab-American hookah smokers: Initiation, and pros and cons of hookah use.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 39(5), 680 - 697.

Lac, A., & Donaldson, C. D., (2018). Testing competing models of injunctive and descriptive norms for proximal and distal reference groups on alcoho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ddictive Behaviors*, 78, 153 - 159.

Langlois, M. A., Petosa, R. L., & Hallam, J. S. (2006). Measuring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 for resisting social pressures to smoke.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15(2), 1 - 17.

Li, W. J., Gao, L. F., Chen, H. D., Cao, N. M. & Sun, B. H. (2018). Prediction of injunctive and descriptive norms for willingness to quit smok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moking risk perception. *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23(3), 274 - 279.

Meijer, E., Gebhardt, W. A., Dijkstra, A., Willemsen, M. C., & Laar, C. V. (2015). Quitting smoking: The importance of non-smoker identity in predicting smoking behaviour and responses to a smoking ban. *Psychology and Health*, 30(12), 1387 - 1409.

Moan, I. S., & Rise, J. (2005). Quitting smoking: Applying an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Biobehavioral Research*, 10(1), 39 - 68.

Mummendey, A., Kessler, T., Klink, A., & Mielke, R. (1999).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2), 229 - 245.

Oyserman, D. (2007).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regulation. In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432 - 453). The Guilford Press.

Pagliaro, S., Ellemers, N., Barreto, M., & Leach, C. (2010). Strategies (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management: The role of group norms and personal profit (original Italian). *Psicologia Sociale*, 3, 385 - 399.

Parcel, & Toby, L.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5), 1193 - 1194.

Perkins, H. W., Haines, M. P., & Rice, R. (2005). Misperceiving the college drinking norm and related problems: A nationwide study of exposure to prevention information, perceived norms and student alcohol misuse.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6(4), 470 - 478.

Phua, J. J. (2013). The reference group perspective for smoking cessa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reference groups on smoking cessation self-efficacy.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7(1), 102 - 112.

Ríos-Bedoya, C. F., Snedecor, S. M., Pomerleau, C. S., & Pomerleau, O. F. (2008). Association of withdrawal features with nicotine dependence as measured by the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FTND). *Addictive Behaviors*, 33(8), 1086 - 1089.

Smith, D. M., O'Connor, R. J., Collins, R. L., Hyland, A. J., & Kozlowski, L. T. (2019). Correlates of smoker identity among intermittent and light daily young adult smokers: Findings from wave 1 of the population assessment of tobacco and health (path) study. *Addictive Behaviors*, 98, 106034.

Suha, F. S., & Sharif, O. S. (2018).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as drivers of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towards luxury fashion good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premium price. *Asi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3(2), 161 - 184.

Willer, D.,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94(4), 645 - 646.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中学生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吴秋红, 徐淑慧, 胡瑜

温州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 962207008@qq.com 325035

**摘要:** 研究以 383 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 运用校园欺凌调查问卷、自尊量表、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法律认知量表等研究工具, 探究中学生发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1) 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 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与个体自尊情况两者呈显著负相关. (2) 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与法律认知情况、亲子关系情况均呈显著负相关. (4) 以卷入欺凌程度为因变量, 以其他三个量表数据为自变量做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

**关键词:** 校园欺凌; 自尊; 亲子关系; 法律认知

## 1 引言

自 Dan Olweus 在《校园侵害行为: 施虐者与替罪羊》一书中明确提出欺凌行为的定义以来, 校园欺凌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章恩友, 陈胜, 2016). 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文化中的某一因素出发来探究其与校园欺凌的关系. 如李佳洋等人探讨了父母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责任(李佳洋, 刘文利, 2020). 张文娟从个体的性格、自我认知等方面来探讨影响欺凌行为生成的因素(张文娟, 2018). 从同伴关系、同伴力量等角度探讨的同伴友谊质量在校园欺凌中的调节作用(刘炎, 2019)等. 任海涛等人从法律角度界定校园欺凌概念及其法律责任(任海涛, 2017), 以及邹贺等人从法律治理角度探讨校园欺凌(邹贺, 2020)等. 综上所述, 以往研究多以单一视角探讨校园欺凌, 而欺凌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因此本文综合个体、家庭、社会等角度, 试图通过探讨几者之间关系, 为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提供建设性意见. 的家庭因素主要从亲子关系探究其对孩子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影响. 个体因素主要从个体自尊水平高低、性别、年级进行探究. 学校、社会文化因素创新地从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进行探究, 本研究对影响因素既有质的分析也有量的分析.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某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计 383 人参与了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366 份, 其中初中生 183 人, 高中生 200 人, 总人数中男生 225 人, 女生 141 人.

### 2.2 研究工具

#### (1) 校园欺凌调查问卷

采用自编量表, 在温州市某几所中学发放并测试信度和效度, 测试可行后, 后续再发放此问卷进行调查. 采用五级评分制, 分数越高则代表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 在本次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918, 拟合程度较为理想, 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 (2) 自尊量表

采用 1965 年罗森博格(Rosenberg)编制的用于个体自尊和自我容忍的一般评估的量表, 用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 得分越高代表的自尊程度水平越高. 在本次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839, 拟合程度较为理想, 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 (3) 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吴继霞等人编制的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五级评分制, 分数越高则代表亲子关系越好(吴继霞, 2011). 在本次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821, 拟合程度较为理想, 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 (4) 法律认知量表

采用徐淑慧编制的量表,共有 15 个题目,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越好(徐淑慧,2019).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值为 0.880,拟合程度较为理想,对本研究的样本的适用性较为良好.

###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方差分析、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 3 结果与分析

### 3.1 校园欺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将年级、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3-1 所示,说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程度有显著差异,根据统计结果可推测,年级越高,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 $P < 0.05$ ),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P > 0.050$ ).

表 3-1 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学生的校园欺凌程度方差分析表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值
年级	5909.346	2	2954.673	17.091**
性别	1128.068	1	1128.068	6.525*
年级*性别	225.627	2	112.813	0.653
误差	64483.765	373	172.879	
总差异	74771.789	378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3.2 校园欺凌与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的相关分析

如表 3-2 所示,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个体自尊情况、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P < 0.01$ ).

表 3-2 校园欺凌程度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欺凌程度	个体自尊	法律实践认知	法律知识认知	法律价值认知	法律权利义务	理解沟通	苛责干涉	喜爱尊重	成长宽容
欺凌程度	1								
个体自尊	-.446**	1							
法律实践认知	.029	-.004	1						
法律知识认知	-.122	.219**	.294**	1					
法律价值认知	-.238**	.085	.234**	.384**	1				
法律权利义务	-.116	.094	.377**	.440**	.574**	1			
理解沟通	-.276**	.246**	-.024	.113	.262**	.225**	1		



苛责干涉	-.328**	.201**	.002	.089	.154*	.268**	.459**	1		
喜爱尊重	-.300**	.238**	-.019	.109	.337**	.351**	.687**	.392**	1	
成长宽容	-.261**	.194*	-.013	.033	.294**	.314**	.674**	.419**	.772**	1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 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 对校园欺凌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欺凌总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首先纳入（模型 1），自尊总分在此基础上进入（模型 2），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再进入（模型 3），亲子关系四个维度进入（模型 4），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已验证研究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Durbin-Watson 检验值为 1.910），最终模型（模型 4）纳入所有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  $R^2=0.317$ ， $F(4, 153)=3.019$

（ $P<0.05$ ），调整  $R^2=0.268$ 。仅增加自尊总分变量（模型 2）后， $R^2$  值增加 0.2， $F(1, 161)=40.841$ （ $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增加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变量（模型 3）后， $R^2$  值增加 0.050， $F(4, 157)=2.663$ （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增加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变量（模型 3）后， $R^2$  值增加 0.054， $F(4, 153)=3.019$ （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3 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结果

进入顺序	R2	调整的 R2	三角形 R2	F	P	β	t	P
	0.014	0.002	0.014	1.151	0.319			
年龄						0.084	1.073	0.285
性别						-0.079	-1.01	0.314
第一层	0.317	0.268	0.303	7.555	0.000			
自尊总分						-0.375	-5.236	0.000
法律价值认知						-0.235	-2.743	0.007
法律权利义务						0.154	1.591	0.114
法律知识认知						-0.024	-0.281	0.779
法律实践认知						0.009	0.121	0.904
理解沟通						0.020	0.201	0.841
苛责干涉						-0.217	-2.777	0.006
喜爱尊重						-0.097	-0.833	0.406
成长宽容						-0.002	-0.014	0.989

4 讨论

4.1 个体因素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校园欺凌的性别方差分析发现，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本次调查结果与 Mok M 等人研究结果一致（Mok M, 2014），因此需要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给予关注，从而从性

别角度提出一些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策略。  
根据不同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个体卷入校园欺凌程度：高一>初二>初一，因此推测高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的概率更大，本研究结果与 Olweus 等人报告的欺凌随着年级的增加而降低的结果相反，与

Hartung 等人报告的欺凌在年级上没有差异的结果也不同 (Mok M, 2014)。可以关注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育, 找寻他们之间的差异, 降低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后续研究在这一面还需要更严谨的设计与考虑。

从上文的相关分析中可知个体自尊情况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即自尊水平越高的学生, 卷入欺凌的可能性和程度越小, 与乔琳琳等人报告的自尊心高出现欺凌行为少的结果一致 (乔琳琳, 2020), 肖彩燕在其报告中也指出: 自尊在同伴接受与受欺凌者/欺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肖彩燕, 2019)。因此, 我们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提升其自尊水平, 为减少其卷入校园欺凌做贡献。

#### 4.2 亲子关系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亲子关系的四个维度: 理解沟通、苛责干涉 (反向计分)、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欺凌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即表明亲子关系越好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进一步分析可知: 苛责干涉与欺凌的相关系数最高 ( $r=-.328^{**}$ ), 次之为喜爱尊重 ( $r=-.300^{**}$ ), 理解沟通与成长宽容相关系数相近 ( $r=-.276^{**}$ ,  $r=-.261^{**}$ )。郭勇等人在其报告中指出: 孩子在只满足孩子基本生活需求, 而没有提供安全和支持性的相互依赖的成长环境中成长, 容易产生校园欺凌 (郭勇, 2019)<sup>23</sup>。李佳洋等人也指出有效的沟通、细心关注孩子生活等都是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产生的途径 (李佳洋, 2020)。家庭不仅是提供物质支持的场所, 更是给予孩子安全感和相互依赖的港湾 (郭勇, 2019)。因此, 良好

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是防治校园欺凌的解决途径之一 (苏春景, 2016)。为了让孩子与家长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要注重自己的教养方式, 与孩子有效沟通, 给予孩子支持和安全感, 并关注孩子的日常变化, 防微杜渐。

#### 4.3 法律认知程度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防治校园欺凌相关法律较少的角度出发 (申寅子, 2017), 或是从界定校园欺凌的法律概念出发 (任海涛, 2017), 本文创新地引入法律认知程度, 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 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 其中法律价值认知与校园欺凌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 $r=-.328^{**}$ ), 其他三个维度与校园欺凌也均存在相关, 且分析表明法律认知程度高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法律的普及、法治的社会环境, 有利于儿童提高法律认知, 增加对法律的了解和敬畏, 从而遵守法律、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 从而其可以降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 降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维护社会稳定, 营造良好氛围。

### 5 结论

(1) 性别和年级在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上有显著差异, 卷入校园欺凌程度: 高一>初二>初一, 男生>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 交互作用不明显。

(2) 个体自尊、法律价值认知、亲子关系与卷入欺凌程度均显著负相关。

(3) 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多方面存在, 防治校园欺凌应多角度考虑, 采取措施。

#### 参考文献

- [1] 章恩友, 陈胜. 中小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思考[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11): 13-17.
- [2] 吴继霞, 郭小川, 黄希庭, 李世娟. 中学生 9 快亲子关系问卷编制[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7(04): 39-44+223-224.
- [3] 徐淑慧. 中学生法律认知测评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9(02): 52-56+51.
- [4] Mok M, Wang WC, Cheng YY, et al. Prevalence and behavioral ranking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second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J]. Asia-Pac Educ Res, 2014, 23(3): 757-767.
- [5] 乔琳琳. 初中生学校人际关系与欺凌行为[D].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 [6] 郭勇,郭晗曦.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校园欺凌预防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02):65-69.
- [7] 李佳洋,刘文利.父母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责任[J].江苏教育,2020(08):22-25.
- [8] 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8-23.
- [9] 申寅子.中学校园暴力行为的特征及其防控路径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7(11):36-40.
- [10] 任海涛.“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02):43-50+118.
- [11] 肖彩燕.同伴关系、自尊对初一-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及干预研究[D].广州大学,2019.
- [12] 邹贺.我国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D].吉林大学,2020.
- [13] 张文娟.乡村中学欺凌行为生成的个体因素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 [14] 刘炎.欺凌事件中初中生道德推脱与主动性人格对同伴干预范式的影响[D].温州大学,2019.

(责任编辑:史金芳)



## 俯身开怀，协同规划

——谈学优生心理问题初期的家庭调适策略

湖州市石淙镇石淙学校 薛慧 xh679039@163.com 313015

**内容提要：**学优生心理问题隐蔽堆砌，端倪初现于家庭，如何实施家庭教育转变尤为关键。一需重新定位角色，适时陪伴，协同游戏，常常示范，俯身开怀以导，绝不放任自流；二需重新规划生活，适量劳动，序列化家务清单，丰富体验，项目式创意劳动，聚焦素养，绝不越俎代庖；三需理智对待问题，适度惩戒，讲究家庭惩戒的术略，不过激干预，也绝不一叶障目。以此三“适”，助推学优生在行走中成长。

**关键词：**初中学优生；家庭教育；陪伴；劳动；惩戒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完满的状态。翻飞的网络，2020 年突发的疫情，长期的宅家，学生的各类心理健康问题迅速泛起在社会视野，而且那些以前让人格外“放心”的学优生似乎转变尤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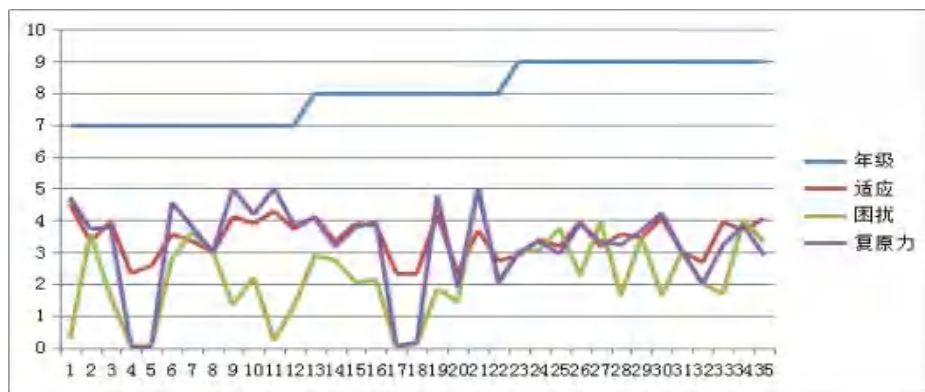
抽取本校和联盟学校初中段参与上学期末检测的 185 位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试，内容主要包含“适应”、“困扰”和“复原力”三方面，从检测数据来看，35 位学科总分优秀学生的对各类环境的适应能力基本保持平均，而心理困扰却明显高于平均，复原能力则远不及其智力的发展。我们常为那些情绪稳定性较差、学习成绩不佳的后进生忧虑，却忽略

了也在同样环境里悄悄成长的“乖孩子们”。一直处于光环之下的他们更需要被关注，拨开卷面亮眼的数字，走进他们的内心，疏导指引，及早干预，跟踪化解，去“忧”为“优”。

### 一、学优背后的三“堵”

检测结果显示，学优生整体未能达到检测“健康”标准的有 13 位，占 37.14%，“困扰”值居平均以上的有 15 位，占 42.86%，“复原力”在平均以下的 9 位，占 25.71%，折线图 1 呈现的即是被测 35 位学生的具体数据。逐一细究这些数据，并将此与他们的性格、家庭、交往与在校表现等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分析，我们发现如下问题：

图：35 位学生心理健康检测数据



1. 自我适应性不高，但被认可意识强烈  
被测 35 位学优生的适应值基本均衡，维持在 3 分左右（总分 5 分），作为班级中的佼

佼者，他们的自我适应性并不高，而他们想被周围环境认可的意识却很强烈。学习上，长期以来一直是保持优越的心态，一旦不适应课程

节奏暂时滞后,便会产生莫大压力,这压力有来自于学科学习本身,也有来看迫切希望被认可的潜意识以及过度的自尊。这个时期他们的表现会相对其他孩子更加浮躁,更加沮丧,严重者会更加偏激,甚至会产生自残等想法。

## 2. 受挫复原力不均,但被困扰羁绊诸多

图1可以看到,学优生的困扰值与复原力近乎反比,困扰值高,复原力也相对弱者居多。有的与周围的环境不太融洽,会产生莫名的恐惧,甚至有回避和逃离的冲动;有的经历学习小挫折,不能较快地摆脱,甚至学习的兴趣慢慢地减退,自信渐失,颓靡不振。情绪的天平倾斜,终日思之,睡眠不好,食欲不振,嗟叹烦恼,陷入自己消极认知的怪圈中,苦恼不已。在这样多的困扰中,复原力反而弱者,不能自我调节,没有别人的帮助很难恢复,久之,抑郁沉积,成疾。

## 3. 缺陷各方向隐蔽,而被求助通道梗堵

在老师和家长的眼中,他们都是埋头于学习、学有所成的“乖娃”,是同龄人效仿的榜样,至于缺陷,则在“大红勾子”面前被堂而皇之的隐蔽,部分孩子便在这样的“放任”与“放心”中失衡地成长,当问题真正暴露在大家眼前的时候便可能会措手不及,难以挽回,亲子沟通也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同学的眼中,他们一直在自己的一方学习世界,显得难以靠近,而学优生们,或许会因为自负,或许会为保住自己的位置,缩小自己的生活圈子,同伴间的交流与倾诉减少,陷入困境能找到的帮助也更少。放了学可能需要参加各类补习班,放松、休闲的时间更多地被挤占,消极情绪很难找到出口。

近些年,我们时不时地能看到远赴海外的优秀留学生轻生的新闻,前期被无限缩小的缺陷在走进更广阔的社会圈子之后被无限放大,而曾经引以为豪的学业轻如鸿毛,压力如山而来,欲诉不能,便草率地做了最冲动的决定。目前,尤其是疫情之后,曾经的小黑斑因为没有耀眼光华的掩盖也逐渐显现,潜在的一些问题被提早激发,而这其中,学习优秀的孩子占据不小的比率。

## 二、初期教育的三“适”

与其仓促地亡羊补牢,不如提早有序地规划,防患于未然,至少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学校需要细致地做好各阶段的辅导课程,个别与团体相结合,教育与活动相结合,务求健康于心。家庭也不能游离于外,责不容贷。学优生问题最初的端倪显现往往是在学习之外,在家庭这相对更加轻松与自我放飞的环境里,表现也会相对明显,家长应是捕获他们变化的第一人。因而,俯身开怀,协同规划,做好学优生问题初期的家庭引导尤为关键。

### (一) 不放任自流,适时陪伴,常常示范

#### 1. 走出误区,重新定位角色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迅疾,现今学优生知识面较之前更广阔,学生成熟更早,自我意识也很强,许多家长想当然地认为,孩子们“懂事”更早了,尤其是学优生,家长们相信孩子已经有完全的自主意识,不必去干涉他们的行动,这是对他们的尊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位学优生家长曾反映,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兼顾孩子,但孩子也挺乖,每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好作业,手机也可以放心地交给孩子自己保管,但后来,竟然发现孩子有了自残倾向。

不论是哪类学生,在这个阶段,都容易听从自己感性的念头,或者未经理性判断与审视的想法来指引自身的选择,任由冲动摆布自己的行为。作为家长,要防止教育控制力的放大效应——过分干预,对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来说更会让他们产生反感;也要摒弃过分“尊重”孩子、放任发展的错误观点。我们需要正确定位角色,固然奔波赚钱养家,本身也是爱和责任的体现,但是家长的职责从来不只是为满足家庭的物质需要,家庭教育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家长们应尽可能地将一切可以留出来的时间交给孩子,陪伴他们成长,时常与孩子进行心灵的交流,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缺席,有意识地从自身魅力对孩子的智力、能力以及价值观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长。

#### 2. 审时陪伴,加固亲子情感

学优生中较多孩子极为敏感,突来的关注会让他们有被监控感,因而家长在交流陪伴的时间选择上需要慎重,力求自然、无痕。

**利用餐前饭后的时间,自然拉近沟通距离。**尽量坚持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下班之后餐桌上的闲聊,看电视时就新闻大小事或某一剧情的探讨,不一定非要拿出整块的时间,但要让孩子时刻感受到家长对自己的爱 and 关注,并通过这些生活细节建立起与孩子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加固情感纽带,也可以让教育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增添协同游戏的时间,潜移默化杜绝网瘾。**不把所有时间都固定在从这个补习班到那个补习班,甚至把余下时间也都绑在作业中。可以带孩子走亲访友,锻炼社交能力,提高以后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陪孩子进行体育运动或到户外去游戏,领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在轻松趣味的游戏中令孩子不知不觉地接受父母气质、情感、智力等方面的影响,为自身的心理与智力发育补充养分,而且时常的陪伴还可以避免当下较为严重的网络成瘾现象的发生。

**促成体验失败的时间,历练提升复原能力。**作为一直顺风顺水的学优生,生活中一呼百应,没有丁点儿磨难经历,畸形的成长格局会导致他们人格的变异。因而要根据他们的身心发展状况选择提供一些磨练和冒险,随时地注意心理的细微外在表现,抓住瞬间的心理动向,果断地采取措施,防止消极因素的滋长,哪怕只是微小的缺点。在经历活动中允许“浪费”一定的时间,等待他们自己去体验化茧成蝶的艰辛,享受成长过程的成功与失败,因为这种体验是任何人无从替代的。

### 3. 榜样示范,传递正向能量

《说文解字》中说,“教者,与人以可放(仿)也;学者,学而放(仿)之也。”家长也要做好这样的示范,而跑在前列的学优生更需要获得一个适合自己的榜样,成全自己的方向,也引领他人的前进。

**蹲下身来教,让孩子自己循着脚印前进。**很多家长习惯以过来人的长辈反复授予经验,

所讲的道理对于学优生来说——“文字都懂”,听多了,只会心生厌烦。这时,家长不妨放下权威身份,蹲下身来,不用太多言语说教,与他们的亲密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在不经意的闲谈中示以尊重与信任,在贴心的陪伴中示以爱与责任,在多元的活动中示以探索、竞争、互助等积极的意识,用自身可展示的一切良好行为来熏陶孩子。

平时言谈处事均应以身作则,大方明朗,摒弃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方法,克服自身在人格上的缺陷,避免对他人、对事件作表面浮躁的评价,用自身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子女成长传递正能量。在之前的调查中也看到,有些家庭不关心孩子的日常,但当成绩有下降时,便甚为严厉地加以训斥甚至大打出手,教育的方式简单而粗暴。家长的本意可能是想鞭策孩子,但结果往往是扼杀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更坏的影响是会让一些孩子也用暴力来解决事端。暴力是会“遗传”的,单一权威的教育也不适合快速成长的学优生们。

### 敞开怀来听,让孩子自己选择偶像靠拢。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偶像,学优生也不例外。但由于社会阅历尚浅,对事物的认识容易只看到灿烂的表象,他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首位价值观念难以定型,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这些都会使其在认识偶像时出现偏差,他们因此而界定的偶像往往道德影响力不足,不利于长远发展。与其一味堵塞让他们追逐浮夸的表面,不如敞开怀来听一听孩子们的想法,交流偶像的选择心得,正确地引导,透过闪亮表象看到这些人身上的正面力量,让他们真正受益。

在这倾听与选择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参与其中,积极自主地探讨偶像价值,带来心灵触动,从而更好地于偶像中获取自我成长的养分。偶像的选择目也变得可信、可亲:可能是成龙、姚明、杨幂等明星偶像,发现能对自己产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地方,并以此激励自己,让自己获得动力;可能是和个人生活相近的同伴,目标锁定品学兼优的偶像并向他靠拢最易达到价值观的认同;可能是家长、老师,看到

他们给予自己启迪的细节,习得其中的优良品德。

陪伴的过程中,家长也不过度干预。非过高期望,非监控孩子的学习,非过度的心理控制,否则也会影响青春期孩子的健康,他们会因为达不到目标、害怕犯错误,较真于细节,恐惧失败……严重的可能产生抑郁症、焦虑症等。

## **(二) 不越俎代庖, 适量劳动, 每每创意**

“你只管学习就好,其他的,我们会替你准备好!”这句话在学优生家庭里尤其普遍。家长们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劳动,希望孩子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鼓励也不愿意孩子在劳动方面花费一丁点儿的时间,但他们都忽略了一项至理——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家庭的过度介入与干预,使学生自我效能感较低,生活适应能力差。

### **1. 序列化家务清单, 丰富日常劳动体验**

被承包了一切劳动下的学优生,动手操作和生活能力必然滞后,自理与自立不对等,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生活上依赖家长,心理上又想脱离家长约束。生活与学习稍有不如意,便心浮气躁,轻言放弃,这也是责任感意识缺失的表现。合理将劳动融入他们的生活,自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有目的地进行规划,序列化地设计家务清单,让一心扑在学习上的孩子也承担起部分家务,从整理个人房间开始,整理书柜、床铺,叠被子、洗衣服、煮饭等,设置层级,内容与难度螺旋上升,在体验趣味中让他们掌握更多生活技能,起码可做到不久的未来面对寝室生活不至于手足无措。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做好“顶层设计”,做好过程参与,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准备做一顿晚餐,让孩子感受与家长一起劳动的乐趣与温情,密切亲子关系,融化坚冰。

### **2. 项目式创意劳动, 聚焦劳动素养提升**

近年来,项目式学习以其内源性、整合性、实践性与创生性等突出特征,成为核心素养时代的重要教学理念,其现实与合作的基因,正

是劳动教育抓手的先天优势。

学优生家长可与学校一起,创意设计项目式劳动,与孩子一起选定主题,比如果蔬培植、美食制作等,确定任务,先扶后放,并给予期待:“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罗森塔尔效应表明,投入感情、希望和特别的诱导,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家长的预言会真正转换成孩子的自我预言。他们会自主探究,深度实践,不仅能达到掌握生活技能的目的,还能激发热爱劳动的情感,学会更好生活。

情境化的项目式劳动中,家庭与孩子配合,孩子与同伴搭档,尊重身体发展阶段性,在对话与合作、实践与体验中,将非正式教育形式与主题深度理解相融合,亲子沟通的鸿沟在默默缩小,曾经狭窄的人际关系圈也渐渐扩大。

## **(三) 不一叶障目, 适度惩戒, 时时点拨**

我们常会不自觉地忽略学优生的缺点,这或许就是晕轮效应,各方面的偏袒与纵容让他们成了被宠坏的孩子,心理问题堆砌。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出色,对父母和老师的付出也视为理所当然,缺少对他人应有的尊重和责任感。因为所有关注都源于学习,所以对学习以外的漠不关心,一旦高压下的结果令从来一帆风顺的他们受挫就可能无法承受,不愿面对,情绪失控。

**正视不放任, 坚持适度惩戒的必要。**学优生的家长需理智地看待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正视而不放任,用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和方法去感染孩子,从旁给予指导性建议;优秀之处,拥抱、表扬孩子,让他们在你温暖的怀抱和话语里找到归属与信任;对于他们的错误,绝不能姑息,适度惩戒是必要的。

**干预不过激, 讲究家庭惩戒的术略。**家庭教育惩戒应兼顾学优生的年龄段特点、思维深度,以及他们一直处于鲜花和掌声中的事实,选取和风细雨般方式,在清楚他们真正的“心理诉求”基础上,给予正向的暗示,和他们一起,比较鉴别,假设推理,让他们改变唯读书是瞻的狭隘,自己省悟自身的缺陷与改进



的必要。

作为学优生，鉴于他们的智识和心理需求，可与其制定家庭公约。公约的制定以协商的方式为主，共同确定，共同遵守，有要求，有底线，有惩戒。比如网络素养，父母与孩子一起协商建立网络使用规则，约定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长，帮助孩子培养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能力。而惩戒的方式，教育部近期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提及，可“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家庭教育中也应如此。可以是认识中的阅读与劳动服务惩戒，也可以是意识后的自我惩戒，温

和又善性的干预，让他们易于接受，并铭记于心。

诚然，对于学优生隐蔽的心理问题，绝不能再放任自流，家长们在教育中也绝不能再袖手旁观。适时陪伴与游戏，常常示范与引导，增添序列化与项目化的适量劳动，不越俎代庖，丰富的日常体验中，提升实践能力与劳动素养。同时理智对待问题，加以适度惩戒，不过激干预，也绝不一叶障目。此三“适”方是对学优生们最好的约束与保护，助推他们在行走中健康成长。

#### 参考文献

- [1]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3).
- [2] 孙云晓. 《懂方法的父母成就孩子一生》.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1.
- [3] 鲁洁主编. 德育新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12).
- [4] 周凤林主编. 学校德育顶层设计实践案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 [5]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2020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 [6] 章振乐. 新时代劳动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中小学德育, 2020(4): 64.
- [7] 教育部.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2021. 03.

（责任编辑：史金芳）





## 在语文日常教学中如何利用舒尔特训练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罗开富小学 罗欣蔚

**【摘要】**众所周知，孩子的注意力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但是在我们中小学教育中，很难单独抽出时间来训练孩子。舒尔特训练法是心理学中专业的提高注意力的一种游戏，它制作简单、有效性高。本文想从舒尔特训练法在语文日常教学中的应用、优点和方法三个方面，探讨在语文日常教学中如何利用舒尔特训练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关键字】**舒尔特方格 语文日常教学

### 前言

众所周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语文教学中，机械的记忆永远比不上学会学习。尤其是在小学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十分重要，它为整个学习提供保障。但是在我们日常教育中，我们真的很难单独抽出时间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

在一次和学生们的游戏时，我突发奇想，游戏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种有效方法。而舒尔特方格，它是提升注意力水平的有趣的游戏，因为它制作简单，有效性高，所以应用较广。既然有相同处，那么我们能不能整合两者，在我们语文日常教学中利用舒尔特训练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呢？

### 一、语文日常教学中的舒尔特训练法的应用

什么是舒尔特训练法呢？舒尔特训练法是世界上目前专业的、普及较高的、较为简略的注意力训练法。它提升注意力水平的效果非常明显，经常出现在飞行员、宇航员的训练上，也是锻炼人们注意力的有效训练法。舒尔特训练法要用到舒尔特方格。

国际上通用的舒尔特方格是在一张方形的纸上画上  $5 \times 5$ （25 格）的表格，每个方格大小为  $1\text{CM} \times 1\text{CM}$ 。然后在这 25 个方格内随机填上 1—25 的数字。当然，舒尔特方格也可以增加难度，它可以按照情况增加方格，但注意的是方格的大小不能改变，必须是  $1\text{CM} \times 1\text{CM}$ 。

舒尔特方格（ $5 \times 5$ ）

1	12	24	9	25
4	10	3	16	6
15	2	19	23	13
7	20	5	22	18
17	8	21	11	14

舒尔特方格 (9×9)

1	27	28	9	25	15	68	42	67
4	10	3	32	6	31	65	74	39
36	26	33	42	59	51	60	56	79
7	30	5	37	23	13	12	72	46
17	8	21	48	22	18	16	64	75
20	24	35	53	11	14	29	80	55
47	41	61	38	2	34	19	76	81
44	57	70	43	50	69	52	49	63
58	45	66	71	73	62	77	54	78

被训练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手按照数字的顺序,迅速找到所有的数字的位置,同时诵读出声。时间越短,被训练者的注意力水平就越高。以 7—12 岁儿童为例,在 25 格的舒尔特训练中,26 秒以内为优秀,这样的儿童注意力水平高,在学习生活中大部分属于名列前茅。42 秒左右属于中等水平,如果达到 50 秒以后,那么则需要多锻炼注意力了。在目前成年人测试中,我国的飞行员平均时间在

6.25 秒以内,我国目前用时最短的人是杨利伟,他的时间为 3.04 秒。

既然舒尔特训练法的基本步骤是要求被训练者在最短时间内按照一定顺序找到要求数字的位置。那么如今我们将数字转化为熟悉的文字和符号来训练,这依旧具备了有效性,这就为舒尔特训练法在语文日常教学方面的运用提供了可行性。例如:

题目:请按顺序将《春晓》指出来,记得大声诵读哦

夜		春		落
不	声	知	闻	
多		处	春	觉
处	雨	鸟	啼	眠
风	少	晓	花	来

题目:请按顺序将组成“清、叶、话、眠、姓、伙、种、时、怯、进、令、样”的组成部分依次指出来,越快越好

彳	女	火	十	木
舌	中	日	卜	目
亻	井		青	讠
生	口	令	羊	去
禾	辶	寸	民	讠

在语文教学中使用舒尔特训练法的时候要注意：首先，不论什么情况，为了避免产生机械的记忆，同一张表格最好不要重复使用，我们可以将方格里的文字、数字或者符号出现的顺序改变；其次，舒尔特训练的时候注意力是很集中的，所以为了避免过于疲劳和枯燥，让孩子失去兴趣，短时间内，舒尔特训练法最好不要超过 10 次；然后，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只能使用一只手，而且应该要指和读的动作同时进行，缺了其中之一，都会导致效果不佳；最后，舒尔特训练法的最终目的是看完成舒尔特方格后的时间，而不是指出方格的多少，时间越短越好，如果失败了，那必须从头开始。

## 二、语文日常教学中的舒尔特训练法的优点

游戏这种教学方法一直被孩子们所喜爱。它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教育家克鲁普斯卡说：“对孩子来说，游戏是学习，游戏是劳动，游戏是重要的教育形式。”因此，选择合适的游戏方式来锻炼孩子，是极其重要的，舒尔特方格训练正是这样的游戏。那么舒尔特训练法在语文日常教学中有什么优点呢？

（一）舒尔特训练法提高注意力水平，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舒尔特方格训练是注意力训练中最基础的训练，也是能专业地提升注意力水平的训练。他对注意力的集中度、稳定性和广度都有着明显的作用。当被训练者在寻找目标的时候，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如果对于这短暂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过程，我们进行反复地练习，

那么自然而然，注意力集中度和持久度就会上升。

小学学生由于年龄小，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而在语文日常教学中，注意力水平直接影响到学习的结果。因此，利用舒尔特方格这样的游戏形式激发学生兴趣，从而通过舒尔特训练提高注意力这样本身的目的来锻炼学生。

（二）舒尔特训练法能锻炼视神经末梢，拓展视幅，提高学生学习的速度。

舒尔特方训练是能锻炼被测试者视神经末梢的，而且这个方格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它是一个区域。被测试者利用视觉在这个区域里去寻找目标，这不但锻炼了视觉定向搜索能力，还拓展了视幅，通俗的说就是所谓的“一目十行”。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小学学生在读字词句子的时候，一开始往往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且容易出现漏字漏行。这是因为由于年龄小，学生视觉搜索等这样的能力还不完善。可是到了高年级，往往一篇课文有很多的字词段落，因此，学会快速识字，并从中抓取重要信息的能力相当重要。舒尔特训练能有效地锻炼学生在一个区域中快速找到目标的能力，它能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速度。

（三）舒尔特训练法制作简单、可操作性强，方便学生日常教学。

相比其他的识字游戏来说，舒尔特方格是属于制作方法比较简单的游戏之一。它只需要能够画上表格的东西和能画表格的工具就行。我们可以在纸上画上方格填上内容，甚至不用笔墨，在沙地上用上树枝来画也行，只要制作

的时候注意方格是 1CM×1CM 即可。对于小学生，一般采用 5×5 的 25 格或者更少的舒尔特方格。

这种训练方法的可操作性很强，它不受空间、时间、人数和年龄的限制，孩子可玩，大人可玩，大人和小孩之间也可以玩。只要掌握了游戏的规则，小学生都可以胜任制作者和游戏者。

三、舒尔特训练法在语文日常教学中训练注意力的方法

舒尔特训练法的操作步骤是基本固定的，那么如何有效的在语文日常教学中使用舒尔

特训练法呢，提高学生注意力能力呢？我觉得要在主要在舒尔特方格的训练内容和呈现方式进行研究，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训练。

（一）“合”“连”之法，熟悉汉字音形  
语文日常教学中，我们朗读汉字声母韵母，观察汉字的结构，理解汉字的意思都有着一定的顺序，这正好符合舒尔特训练法的规则。那么如何巧用舒尔特方格呢？

例（合）：请将下列字按照“春棉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的顺序将他们的读音指读出来。

ch	y	è	é n	ù
t	f	ū n	á i	w
í	m		b	l
ü é	j	ē ng	á n	sh
ǎ o	n	x	ǔ	i

例（连）：请将下列字按照“春棉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的顺序将他们的字和相对应的读音指读出来

ju é	风	mi á n	处	l á i	春
眠	y è		夜	sh ē ng	t í
b ù	来	xi ǎ o	不	闻	鸟
晓		ch ū n	觉	y ǔ	f ē ng
w é n	声	雨	ch ù	啼	nǐ ǎ o

“合”就是将各个部分加到一起,“连”就是一一对应,使用这两种方法的舒尔特训练可以应用到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中,我们可以通过“合”和“连”,让那学生对字音字形充分熟悉,语文日常教学中提高学生注意力能力。

(二)“拓”“增”之道,提升识字速度  
“拓”就是拓展范围,“增”就是增加字

数的意思。语文日常教学中,舒尔特方格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提升学生注意力能力;一个是增加训练的方格范围,用来拓展被训练者的视幅,锻炼“一目十行”能力;另一个是增加汉字的密度,用来增加游戏中的识字总量,提升识字速度。如果被测试者能力水平较高,也可以双管齐下。

拓舒尔特方格范围(增视幅)

闻		声		处
	眠	处	多	来
花	少	春		落
晓	鸟	知	啼	觉
风	不	夜		雨



不				处		觉
	闻		声		处	
少		眠		多		
	花		春		落	来
				啼		
鸟			夜		雨	
	晓			知		风

增舒尔特方格中汉字密度(增字量)  
我画了个彩色的太阳,送给美丽的春天。

因为春天是个多彩的季节!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个		的		天
阳	我	,		丽
	画		彩	的
色	。	太	了	
春	送	美	给	



美丽的		呢	?	太阳
!	我		多彩的	
春天是个		画了个	。	觉得
小朋友们	彩色的	,	你们	
春天	季节		送给	因为

(三)“藏”“扰”之方,发展最近发展区  
每个学生的注意力水平、识字能力不同,最近发展区也不同。对于能力一般的学生,普通的 25 格舒尔特方格就足够了。但是对于测试结果较好的学生来说,长期的按顺序找目标

他们已经游刃有余,接下去的训练就会有点枯燥了。这时候我们使用“藏”“扰”的方法,给舒尔特训练方法增加难度,激发学生的好胜心。

例(藏):请你从下面找出描写春天景色的一个成语

花	热	十	如	腾
汗	毛	鸟	金	九
语	累	牛	下	果
秋	实	月	气	云
一	雨	腾	香	累

例(扰):请你从下面找出描写春天景色的一个成语

	乌		语	
香		春	马	
玉	鸟	吾		杏
华	话	花	雨	
	画	化	乡	

“藏”就是将找寻的目标藏于方格之中,用其他的生字遮掩,被测试者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许多目标中找出最符合的目标。“扰”就是利用形近字、同音字等易错字进行干扰被测试员的判断。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舒尔特方格训练的难度。对那些喜欢挑战的孩

子来说,趣味十足。

### 结语

我们相信,在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中,利用舒尔特训练的好处很多,既能提升注意力水平,又能增加兴趣,还能提高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 参考文献

- [1]陈礼彬;陈燕惠;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工作记忆的研究进展[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 年 09 期
- [2]李艳辉.[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创新[J].科技展望. 2014(22)
- [3]黄锦秀.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几点体会[J].学周刊. 2015(21)

(责任编辑:史金芳)



##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实证研究

温州大学 袁全云 1317305738@qq.com 325006

**摘要:** 本研究从艺考高中生的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出发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可行方案对艺考高中生的心理韧性进行干预,以促进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获得,提高艺考高中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方法:采用生命态度问卷(LPS),中文版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对温州市艺术学校331名艺考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均分为 $(18.17 \pm 4.98)$ 分,83%的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处于中等水平;②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P < 0.01$ )③高心理韧性水平艺考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中、低心理韧性水平艺考生( $F = 13.59, P < 0.001$ );④心理韧性中坚韧因子对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均有显著预测效应。结论:大部分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能显著预测其生命意义感。

**关键词:** 高考;艺考生;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

### 1 问题提出

2010年7月29日,教育部公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由此,学校开始重视生命教育,但由于我国教育模式禁锢许久,生命教育并未得到普及发展。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领会、理解或看到自己生活意义,觉察到自己生命目的、使命及首要目标的程度。<sup>[1]</sup>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对自身和他人及社会都有重要作用,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水平高的个体对未来充满希望,对生命持肯定态度,有良好的适应能力,从而能更多地体验到积极快乐情绪,更少地体验到消极悲观情绪;相反,生命意义感低的个体会表现出极度的无望,对生活缺乏兴趣,在面对问题挫折时,会选择逃避甚至自杀等消极行为。<sup>[2]</sup>最早对生命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心理学家是弗兰克尔(英文全名 Frankl),他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对生命中某一特定时间内目标的认识和追求,追寻生命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动机,也是人类的本能,很多人出现心理症状就是因为长期缺乏目标和生命意义感。<sup>[3]</sup>目前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台湾地区关于生命教育的干预正在蓬勃发展,但国内的生命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系统的

研究。<sup>[4]</sup>国内外学者曾广泛探讨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幸福感、死亡态度、职业倦怠这几个方面,较少研究心理韧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sup>[5]</sup>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或是逆境时的良好反应,呈现出个体面对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并且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健康发展的保护因素之一,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压力、抑郁等负性表征呈显著负相关。<sup>[6]</sup>已有研究指出,心理韧性与积极生命态度、追求生命意义存在显著正相关,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高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可以更好体会积极情绪,提高认知能力,从而对生命意义感的体验也会更好。<sup>[1]</sup>

纵观已有文献,关于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医生、重大疾病患者等处于逆境或较大压力条件下的人群,以艺考高中生作为被试的研究较少。<sup>[7]</sup>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加大了对艺考高中生的培养,艺考高中生人数在2004年后,除极少个别年份有波动外,均呈递增趋势。<sup>[8]</sup>艺考高中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贡献出了极大的力量,但国内目前对于艺考高中生这一群体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较少。“艺考高中生”,通常定义为参加艺术类高考的学生,指“报考艺术类院校艺术专业或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的考生”。<sup>[9]</sup>由于艺考高中生数量的剧增,艺术类高考和文化类高考难度增加,所以艺考生整体录取率下降。这一情况给艺考高中生带来不少压力,面对升学压力,艺考高中生的心理韧性现状怎样呢?据已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密切相关,心理韧性水平高的艺考生会对生活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更好地理解生命意义与生活目的,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相反,心理韧性水平低的艺考生会引起生命意义感的丧失,这是心理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艺考生不能客观地认识生命意义、生活目的,甚至会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甚至产生自杀等消极的应对方式。<sup>[10]</sup>

因此研究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艺考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为更好提高艺考生心理韧性水平,树立更高生命意义感,促进心理健康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温州市艺术学校在读的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问卷 347 份,剔除明显敷衍及回答缺漏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331 份,有效率为 95.39%。样本的年龄分布为  $16.48 \pm 0.5$  岁,其中男生 39 人(11.8%),女生 292 人(88.2%);高一年级 169 人(51.1%),高二年级 162 人(48.9%)。

### 2.2 研究程序

编订“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及生命意义感问卷”(由“2.3 工具”的 2 个量表与人口学变量组合而成),印刷成一张 A3 纸正反面,完成整个问卷测评大约需要 10-15 分钟。纸质问卷交由所在温州市艺术学校学生工作部门负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在课堂上分发,并按照统一要求施测:(1)告知受测者问卷测评的科研目的,(2)声明匿名与保密原则,若有被试心存异议不愿配合答卷,亦不予勉强,使每位受测者均受到研究伦理的保护,(3)

学生现场完成问卷自评后由施测者收回,(4)剔除无效问卷后,将数据统一录入 SPSS 统计软件并进行数据分析。

## 2.3 研究工具

### 2.3.1 心理韧性量表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sup>[11]</sup>

该量表由 Connor 等编制,后经于肖楠和张建新修订成中文版,CD-RISC 有较高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人群,该量表将心理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来测量,主要用于测评受测者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的心理反弹能力。该量共有 25 道题,包含乐观、力量和坚韧 3 个维度,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各题目得分相加即为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受测者总分越高,表明其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反应能力越好,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37。

### 2.3.2 生命态度问卷 (Life Attitude Profile Scale, LAPS)<sup>[12]</sup>

LAPS 由台湾学者何英奇编制,主要用于考查对个体对生命的态度。该量表有 39 个题项,包含意义意志、存在充盈、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与思维接纳等六个维度问卷。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其中存在充盈和死亡接纳两个维度为方反向计分,其他均为正向计分,计算各维度均分及问卷总均分,受测者得分越高,表明其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越深刻,生命意义感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98。

##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4.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性分析和相关分析,并使用 Amos21.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检验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关系。

## 3 研究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问卷调查法,可能会受到共同偏差的影响,混淆或干扰真实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经过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9.538%,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艺考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基本情况

据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艺考生心理韧性总分分布为  $18.17 \pm 4.98$ ,坚韧性得分分布为  $27.13 \pm 9.01$ ,乐观性得分分布为  $9.27 \pm 2.81$ ,力量性得分分布为  $18.11 \pm 4.89$ ;艺考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分布为  $126.69 \pm 14.93$ ,意义意志得分分布为  $35.35 \pm 7.21$ ,存在充盈得分分布为  $24.60 \pm 8.67$ ,生命目的得分分布为  $13.40 \pm 3.37$ ,生命控制得分分布为  $26.30 \pm 4.56$ ,死亡接纳得分分布为  $9.36 \pm 3.26$ ,苦难接纳得分分布为  $17.68 \pm 4.21$ 。从数据中可

以发现,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少部分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或较低;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还有待提高。

2.3 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差异检验

据数据分析显示,心理韧性均分为:  $18.17 \pm 4.98$ ,参照 Aiken 和 West 对分组的建议<sup>[13]</sup>,将低于心理韧性均分 1 个标准差的分为“低心理韧性水平组”,而高于心理韧性均分一个标准差的为“高心理韧性水平组”。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组的生命意义感的差异发现,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差异,高心理韧性水平组的生命意义高于中、低心理韧性水平组,差异显著(见表 1)

表 1 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组的生命意义感差异

	<i>M</i>	<i>SD</i>	<i>n</i>	<i>F</i>
高心理韧性水平组	134.29	13.68	58	13.59***
中心理韧性水平组	126.32	7.86	225	
低心理韧性水平组	120.47	14.26	58	

3.3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分析

为探讨艺考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运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其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2)。Pearson 相关检验显示,心理韧性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339,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水平。其中,心理韧性的力量性、乐观性、坚韧性三个维度与生命意义感中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四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存在充盈、死亡接纳两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已经反向计分)

表 2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意义意志	存在充盈	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	死亡接纳	苦难接纳	生命意义感
力量性	0.398**	-0.348**	0.432**	0.530**	-0.179**	0.392**	0.322**
乐观性	0.431**	-0.453**	0.519**	0.512**	-0.202**	0.292**	0.257**
坚韧性	0.506**	-0.510**	0.576**	0.631**	-0.244**	0.430**	0.339**
心理韧性	0.506**	-0.510**	0.576**	0.631**	-0.244**	0.430**	0.339**

3.4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过程,本研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心理韧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对数据和假设模型的拟合度进行验证。经反复探索,得到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预测生命意义感

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模型的拟合指数: $\chi^2=15.986$ ,  $df=8$ ,  $\chi^2/df=1.998$ ,  $RMSEA=0.055$ ,  $GFA=0.989$ ,  $AGFI=0.941$ ,  $GFI=0.995$ ,  $NFI=0.990$ ,  $IFI=0.995$ ,  $TLI=0.977$ , 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测量学要求,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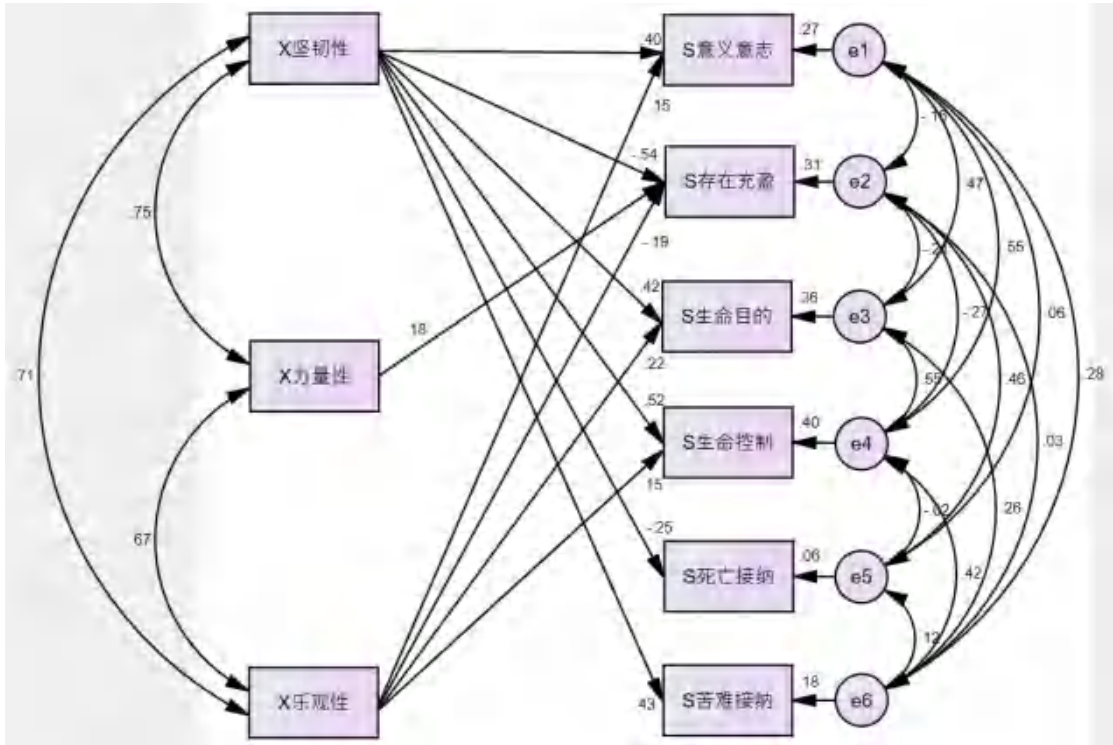


图1 心理韧性预测生命意义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结构方程模型可知,心理韧性各维度与生命意义感各维度之间的作用方向及预测系数各不相同:坚韧性正向预测意义意志(Regression Weight, R.W.=0.40),正向预测生命目的(R.W.=0.42),正向预测生命控制(R.W.=0.52),正向预测苦难接纳(R.W.=0.43),同时负向预测存在充盈(R.W.=−0.54),负向预测死亡接纳

(R.W.=−0.25);力量性正向预测存在充盈(R.W.=0.18);乐观性正向预测意义意志(R.W.=0.15),正向预测生命目的(R.W.=0.22),正向预测生命控制(R.W.=0.15),同时负向预测存在充盈(R.W.=−0.19)。模型的回归权重分析结果详见表3。

表3 结构方程模型预测路径的回归权重分析

路径			Estimate	S.E.	C.R.	p
乐观性	→	生命控制	0.242	0.089	2.719	0.007
乐观性	→	生命目的	0.270	0.072	3.726	***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预测路径的回归权重分析

路径			Estimate	S. E.	C. R.	P
乐观性	→	存在充盈	-0.573	0.184	-3.107	0.002
乐观性	→	意义意志	0.394	0.165	2.387	0.017
力量性	→	存在充盈	0.336	0.120	2.800	0.005
坚韧性	→	苦难接纳	0.200	0.023	8.533	***
坚韧性	→	死亡接纳	-0.091	0.019	-4.727	***
坚韧性	→	生命控制	0.261	0.029	8.963	***
坚韧性	→	意义意志	0.318	0.052	6.069	***
坚韧性	→	存在充盈	-0.512	0.067	-7.627	***
坚韧性	→	生命目的	0.156	0.023	6.826	***

#### 4. 讨论

##### 4.1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总体状况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艺考生心理韧性均为为(18.17±4.98),17%的艺考生心理韧性水平高,17%的艺考生心理韧性水平低,66%的艺考生心理韧性水平一般,该比例与国内心理韧性水平有显著提升。从调查结果来看,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即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其对生命的体验感越深刻,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本次问卷调查对象都是00后新生一代,大多都是独生子女,艺考高中生自身比普通高中生要承受更大升学、就业压力,在团队协作、吃苦耐劳等方面意志比较薄弱,面对一些挫折和困难时,心理韧性水平过低就会导致艺考高中生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所以提高艺考高中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实践意义很大。<sup>[14]</sup>既往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沙盘游戏、耐挫能力提高等方法可以显著提高艺考高中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艺考高中生教师可以进一步对艺考生实施心理韧性干预,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等方式引导艺考生提高

心理韧性水平,加强心理素质,树立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从而实现自我价值。<sup>[15]</sup>

##### 4.2 艺考高中生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生命意义感差异分析

按照一个标准差将高中艺考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分为“高中低组”,通过方差分析艺考高中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生命意义感差异发现,高心理韧性水平组的艺考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与一般心理韧性水平组和低心理韧性水平组的生命意义感差异较大,表明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面对挫折和困难的反应能力越好,其生命意义感越高,对生命的认识、负责程度越深。<sup>[16]</sup>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越好,生命目的越明确的艺考高中生对未来越持有积极的生命态度,越能正确对待生命、珍惜生命。<sup>[17]</sup>但综合国内资料发现,虽然各学者积极倡导提高艺考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但影响效果微乎其微。因此,结合本研究结果,不同心理韧性水平艺考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提示各艺术高中学校的教师可以从提高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出发,帮助其生命意义感的增强,更加积极的应对压力环境,提高对生命的满意度。<sup>[18]</sup>

### 4.3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及各维度与生命意义感各维度都呈显著相关,其中心理韧性及三个维度与生命意义感中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四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越好,意义意志越强,生命目的越明确,对生命的越能负责,对苦难的接纳程度也更高。心理韧性及三个维度与生命意义感中存在充盈和死亡接纳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精神空虚程度就越小,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感越低,该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符。<sup>[19]</sup>心理韧性水平高的艺考高中生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意志力坚强,能够主动调动身边资源,包括老师、同学及家长等,积极应对挫折,保持良好的生命态度,领悟生命的意义。于肖楠等学者认为心理韧性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个体保护性因素与高危情景(严重疾病、重大生活变故、挫折等)相互作用的结果。<sup>[11]</sup>所以艺考高中生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心理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如亲密同伴、坚强意志力、社会支持等可以帮助艺考高中生发挥心理韧性的作用,以解决困难、应对挫折,进而不断提高其生命意义感,明确生命目的,更好地应对高中生活,实现生命价值。<sup>[20]</sup>

### 4.4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的路径分析

由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与生命意义感各因子回归分析发现,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中坚韧因子对生命意义感中意义意志、存在充盈、生命目的、生命控制、死亡接纳、苦难接纳六个因子都有预测作用,其中坚韧因子对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因子起着正向预测作用,表明艺考高中生心理坚韧,对待生命的意志力就越强,更能明白生命目的、珍爱生命、接纳苦难;<sup>[21]</sup>坚韧因子对存在充盈和死亡接纳起负向预测作用,说明艺考高中生心理坚韧,生命的空虚程度就会越低,对死亡的恐惧感越小。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中力量因子对存在充盈因子起正向预测作

用,这与坚韧因子和乐观因子结果相反,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sup>[22]</sup>表明艺考高中生心理自强自立,对生命的态度也会越充实。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中乐观因子对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起正向预测作用,说明艺考高中生心理乐观开朗,越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把握生命的真谛、自己的命运;乐观因子对存在充盈起负向预测作用,说明艺考高中生心理乐观积极,对生命的空虚程度就会越低。<sup>[23]</sup>

## 5. 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 5.1 结论

从以上研究程序,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 (1)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总体水平一般,高心理韧性水平和低心理韧性水平比例较小;
- (2) 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程度总体上较好;
- (3) 不同性别、年级不存在生命意义感差异;
- (4) 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高心理韧性水平组的生命意义感高于中、低心理韧性水平组;
- (5) 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中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感中存在充盈、死亡接纳呈显著负相关。
- (6) 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中的坚韧性维度对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均有显著水平的预测效应,乐观性维度的预测了生命意义感大部分维度(除了死亡接纳与苦难接纳),力量性维度仅预测存在充盈维度。

### 5.2 教育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并且心理韧性中坚韧因子对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均有显著水平的预测效应,基于此结论,为了提高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应从开展坚韧性心理品质的教育出发,增强艺考高中生生命意义感,加强生命教育,特提出如下建议与措施:

- (1) 家校联合共同培养学生坚韧心理品质。据相关文献研究显示,儿童心理品质从小学逐年发展,在七年级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sup>[24]</sup>根据这样的发展特征,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从初中开始学校和家长将学生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在高中阶段,这

种现象更甚,这就导致学校和家长忽视对他们的坚韧心理品质教育,所以艺考高中生遇到困难、挫折,就开始逃避、烦躁,心理承受能力差,从而生命意义感下降。为了避免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学校应该把握好学科教学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合理设置课程;同时,家长要学会“放手”,培养学生主动解决困难的能力。<sup>[25]</sup>

(2) 针对个别差异,培育优良意志品质。本文了解到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艺考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所以在培育意志品质时,需要针对艺考高中生不同意志类型差异,采取不同的锻炼内容,如对易受暗示和行动盲目的学生,应加强行为动机教育,培育其目的性、责任性;对优柔寡断、冒失的学生,应培

养其果断大胆、耐心细致的品质。对艺考高中生的意志培养,还需其自身不断加强锻炼,制定可行的锻炼计划,以实现培育优良意志品质的目标。<sup>[26]</sup>

(3) 加强体育锻炼。通过体育活动锻炼,不仅能从生理上增强艺考高中生体质,为繁重的学业提高基础,还能增强其意志力,提高艺考高中生心理韧性。已有研究指出,个体若能克服身体上的疲劳或痛苦,内心的承受力也会更大。目前阶段,艺考高中生在课余时间,常利用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放松,忽视了体育锻炼。因此,艺考高中生在学业繁忙之时,也要合理安排体育活动时间,做到“张弛有度”,将“不怕苦不怕累”的体育精神迁移到生活和学习上。<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 胡明慧,陈璐,张晓文.大学生心理弹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05):776-779.
- [2] 赵娜,马敏,辛自强.生命意义感获取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06):1003-1011.
- [3] 焦琪,赵慧.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3(06):63-66.
- [4] 刘亚楠,张迅,朱澄铨,苏芮莹,尹媛媛.生命意义研究:积极心理学的视角[J].中国特殊教育,2020(11):70-75.
- [5] Hatice Şahin, Fulya Türk. The Impact of 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Psycho-Education Program 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rrational Beliefs,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Rational-Emotive &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2021 (prepublish).
- [6] 李旭,李志鸿,李霞.家庭亲密关系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03):387-391.
- [7] 覃丽,王鑫强,张大均.中学生生命意义感发展特点及与学习动机、学习成绩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5(10):165-170.
- [8] 彭荔.新形势下“艺考生”的界定及其特征新探[J].今日中国论坛,2013(06):121-122.
- [10] 王永,王振宏.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及其与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1):94-100.
- [10] 罗杰,张晓州,张金钟,七十三.大学新生心理弹性与幸福感的关系:新生适应的中介作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0(01):76-81+87.
- [11] 于肖楠,张建新.自我韧性量表与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表的应用比较[J].心理科学,2007,30(5):22-27.
- [12] 沈清清,蒋索.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08):634-640.

- [13]Toothaker L E.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1994,45(1):119-120.
- [14]陈夏芬. 高中艺考特长生常见心理问题应对策略[J]. 新课程(中学),2019(07):282.
- [15]吴珏,梁晓燕. 认知行为团体辅导对某中职护校学生心理韧性的干预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2017,35(14):137-138.
- [16]郭佳佳,杨飞龙,冯长虹,乔亲才. 初中生正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03):403-406.
- [17]魏灵真,刘衍玲. 中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0(36):22-27.
- [18]张晓州,罗杰. 社会幸福感在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与生命意义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9(02):99-105.
- [19]Tsai FuJu,Hu YihJin,Yeh GwoLiang,Chen ChengYu,Tseng ChieChien,Chen SiChi. The effectiveness of a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meaning of life, positive beliefs, and well-being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One-group experimental study. [J]. Medicine,2020,99(10).
- [20]林国耀,周明慧,鲍超,张荣伟.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02):30-33.
- [21]吉彬彬,蒋思珊,彭媛媛,吴雨薇,唐云,李晶. 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习压力与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12):1876-1880.
- [22]陈福侠,樊富珉.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12):1894—1896
- [23]黄煜文,罗芊懿,尚鹤睿. 广州地区医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03):398-403.
- [24]张馨萌. 江苏省儿童坚韧心理品质发展现状及教育建议[J]. 江苏教育,2019(80):15-17+21.
- [25]白艳巧. 大一新生坚韧人格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J]. 青年与社会,2019(26):289-290.
- [26]张兴瑜,周静.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Life and Discussion on Countermeasures[J]. 心理学进展,2020,10(12).
- [27]陈传东. 初中生心理韧性的培养[J]. 教育与管理,2020(25):26-27.

(责任编辑:史金芳)

# “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COVID-19 疫情防控期在线教育下 小学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

许科威；吴文婷；梅思佳；周凡；陈莉\*

（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 浙江省温州市 325035）

**摘要：**基于 2020 年全国部分地区的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调查数据，探究了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小学生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内容与表现，并重点分析了疫情期间教育监督者因素与受教育者的相关因素对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疫情期间，小学阶段各年级的家长的教育焦虑都处于较高水平，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结果比较关注，且表现出易发火、易疲劳。教育焦虑的“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得到验证，各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新生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最高，随年级上升家长的焦虑水平下降，但六年级家长的焦虑水平又再次上升，因此教育焦虑的“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得到验证。同时最后，回归分析显示孩子年龄较小、不能陪伴孩子、经常与他人作比较、孩子的学习情况不佳的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程度显著更高。

**关键词：**教育焦虑；新冠疫情防控；在线教育；心理台风眼效应；涟漪效应

## 一、引言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教育部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宣布，所有学校将推迟开学时间。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停课对教学过程的负面影响，全国各省市坚持“停课不停学”，部署各中小学及高校开展线上教育。这是我国首次出现亿万规模的在线教育，不仅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并给教育的各方带来一次新的挑战，尤其是家长。家长是居家隔离时期的在线教育监督者，对于家长来说，疫情带来的紧张担忧、传统教学模式的改变、长期居家的不自由感、以及孩子延期开学的新情况，使得他们对于孩子的在线教育情况极为焦虑。

教育焦虑是指家长对孩子教育过程和结果过分担忧，所产生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sup>[1]</sup>。现有有关教育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即线下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家长或教师在孩子教育过程的焦虑现状的探讨，而聚焦本次疫情下居家隔离与大规

模在线学习双重劣势下的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研究几乎没有。同时，本研究认为本次疫情下的家长教育焦虑是存在“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即低年级阶段的家长教育焦虑最严重，体现出涟漪效应特征，中段家长教育焦虑水平会下降，体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特征。这是因为，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刚进入风险情境，人们对该情境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越高。但若是一直处于该情境中，人们表现出心理反应随着与情境中心的距离减少而减弱的规律<sup>[2]</sup>。我们假设孩子入学对于家长来说是一种风险情境，家长们从孩子适龄入学，风险焦虑水平上升，随着孩子逐渐适应学习生活，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也随之下降。基于此，本研究于 2020 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网络调研，以“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为理论依据，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年级阶段的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水平、内容、表现与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改进家长教育焦虑现状提供证据。

## 二、家长教育焦虑

家长教育焦虑是指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活动过程中，由于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自身教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浙江省社科联“中产阶级家长的教育焦虑与亲子关系研究”（2021N100）资助



育能力的担忧和对教育失败给孩子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恐惧,从而体验到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恐慌等情绪<sup>[1]</sup>。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始于测验焦虑,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兴起,目前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聚焦于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分析,现有的研究表明文化传统<sup>[3]</sup> (“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社会背景<sup>[4]</sup> (社会转型发展、媒体报道渲染)、教育环境<sup>[5]</sup> (教育竞争秩序不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教育评价的导向偏差)和自我因素<sup>[6]</sup> (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期望不当、教育功利化导向)是引发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原因。第二,主要集中于两大家长群体:中产阶级家长与农村家长<sup>[7]</sup>。农村家长因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而盲目扩大子女的课外教育投入<sup>[8]</sup>,与此同时,城镇中产阶级家长以综合素养和成就为导向,展开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sup>[9]</sup>。第三,探讨教育焦虑的特征<sup>[9]</sup>。高教育焦虑的父母容易有疲劳乏力、失眠衰弱等生理症状,也有心慌、烦躁发怒、紧张不安、绝望无助等心理体验,同时还伴有坐立不安、知行不一、打骂与争执等行为表现。第四,应对教育焦虑的干预和治理。家长教育焦虑问题治理呈现出“松散化”和“碎片化”特征<sup>[5]</sup>。教育焦虑“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的碎片化、服务对象的碎片化、教育资源的碎片化和服务平台的碎片化,其原因则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分割、应对现状的制度框架的缺失,协同服务体系的松散等。

### 三、“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近年来,一些突发性重大灾难给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带来不小的损害,而其中相关的民众风险认知等问题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sup>[10-15]</sup>。“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则受到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表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身处不同地区民众的心理状态可能呈现出“涟漪效应”,即越靠近危机事件中心区域,人们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越高。除“涟漪效应”外,心理学家还借用气象学的“台风眼”现象来对灾难所引起的心理反应进行形象描述,提出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台风外围空气旋转剧烈,而处于中心的风力流动反而相对微弱。与之类似,在后果可控、人们心理承受范围以内的事件风险事件中,人们表现出心理反应随着与风险事件中心的距离减少而减弱的规律,此规律也更多体现在认知或行为等依靠外部线索进行评估的心理变量上<sup>[16]</sup>。关于“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主要来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内还鲜见将其运用到教育学领域去研究居家隔离与大规模在线学习双重劣势下的家长教育焦虑问题。孩子进入义务制教育阶段,其学习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家长同样地也要参与教育活动,经历心理上的转变。若是把孩子入学作为风险事件,从刚进入小学教育,到即将结束小学进入初中,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焦虑程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家长教育焦虑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学习借鉴,但依然存在一定欠缺,主要表现在

(1) 研究背景方面,既有研究对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家长教育焦虑并不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带来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线上教育,现有大多研究只是停留在疫情前普通时期的家长教育焦虑,即使探讨了疫情下家长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忽略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担忧情况。

(2) 研究对象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将家长作为一个整体群体来研究,或是探讨孩子不同学习阶段的家长教育焦虑情况,对某个学习阶段的家长群体内部的年级差异的关注不够。(3) 研究视角方面,既有研究一般从焦虑情绪、社会教育资源、社会阶层等角度探讨家长的教育焦虑状况,多局限于宏观政策与社会背景角度。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学生居家在线学习,对开学时间的不确定、网络教学的质量未知、家中的学习环境不佳等一系列生疏的情境,让家长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失助感”和“不能控制”的认识,这可能显著体现在新生家长身上。而孩子已经身处高年级的家长,因其自我的认知调整和事件经历,焦虑程度可能相对较低。以往研究未能充分展示家长心理状况的变化,对家长的教育焦虑的动态改

变分析不足。

在上述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研究者构建了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家长教育焦虑的理论影响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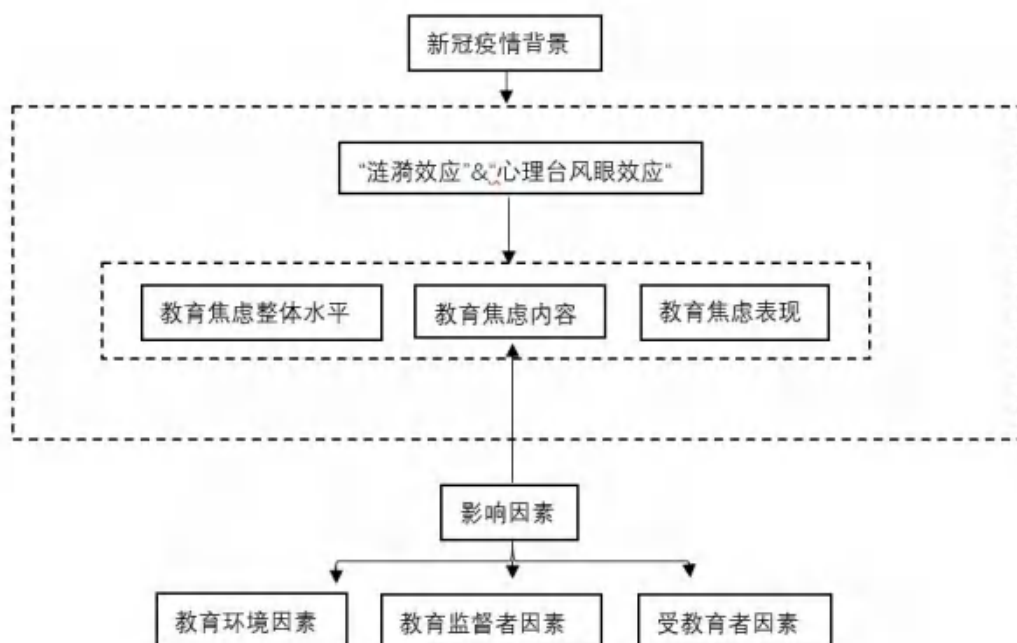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如下。

第一,在疫情居家学习情境下,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焦虑内容与焦虑表现。

第二,在疫情居家学习情境下,不同年级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焦虑内容与焦虑表现是否存在“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第三,在疫情居家学习情境下,人口学变量与孩子学习环境、家长自身情况、孩子学习等因素对整个模型的作用。

####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2020 年 2 月-4 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对浙江及其他省(区) 1055 名家长开展的网络调研。调研对象界定为孩子正在小学阶段的家长,共 1055 名学生参加问卷调查,通过去伪和去除不完整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95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9%。

##### (二) 变量测量

###### 1.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

本研究所关注的因变量是疫情期间家长

的在线教育焦虑,这部分测量的是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包含 1 个问题(疫情期间,孩子居家在线学习,您会对您孩子的学习感到焦虑吗?),询问家长对孩子在线学习的焦虑程度,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1=非常不焦虑,2=不太焦虑,3=一般,4=比较焦虑,5=非常焦虑。其中本研究将选项 1、2 计分界定为无焦虑,3 分界定为轻度焦虑,4 分界定为中度焦虑,5 分界定为重度焦虑。分数越高代表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越高。

###### 2.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内容

这部分测量的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内容,包括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因在线教育引发的不良结果。根据家长教育焦虑内容,将其分为两块,共计 8 个题目:学习结果:学习环境、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效果、预期成绩;不良结果:手机使用、眼睛视力、缺乏锻炼。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家长对此条目越关注。

###### 3.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表现

这部分测量的是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包括家长的情绪表现、行为表现以及对亲子关系

的影响。根据家长教育焦虑表现,将其分为三块,共计 8 个题目:情绪表现:压力大、易疲劳、易发火;行为表现:反复确认学习任务、反复查看班级群、无法安心做其他事;关系表现:亲子关系出现矛盾、孩子情绪受影响。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1=从不,2=极少,3=偶尔,4=经常,5=总是。分数越高代表家长在线教育焦虑表现越明显。

#### 4. 影响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因素

本研究所关注的自变量是疫情期间影响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因素,主要包括教育环境因素、教育监督者自身情况以及受教育者的学习情况。共计 14 个题目:教育环境因素:隔离限制、隔离人数、隔离时间、学习环境、子

女数量、教育投入;教育监督者因素:陪伴缺失、情绪管理、辅导能力、横向比较;受教育者因素:学习时间、网课数量、教学效果、网络使用、学习管理、学习能力、视力下降、情绪状况、学习成绩、预期成绩。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家长对此条目越关注。

#### 5. 社会人口学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的实证研究,引入以下可能影响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控制变量:身份、年龄、学历、所在城市、居住地、家庭年收入,详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情况表

控制变量	项目	样本人数 (人)	百分比 (%)	控制变量	项目	样本人数 (人)	百分比 (%)
身份	母亲	719	74.97	所在城市	东部沿海	848	88.43
	父亲	186	19.40		中西部内陆	111	11.57
	其他人	54	5.63	居住地	城镇	577	60.17
年龄	40 岁以下	672	70.07		乡村	382	39.83
	40 岁以上	287	29.93	家庭年收入	0-8 万元	437	45.57
学历	初中及以下	427	44.53		8-15 万元	226	23.57
	高中	177	18.46		15 万元以上	296	30.87
	大专或本科及以上	355	37.02				

#### (三) 质量控制和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3.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管理,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等:首先,采用基本描述性统计方法对被试的基本特征、在线教育焦虑表现和内容进行分析;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总体水平作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相关因素和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的关系。

#### 五、实证研究结果

##### (一)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水平、焦虑

#### 内容与焦虑表现

本研究首先调查了家长的焦虑水平,结果如图 2 所示。

首先,从总体上看,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 $3.59 \pm 1.01$ )处于中等偏上,标准化换算成百分制,为 71.8 分,属于较高水平。由图 2 可知,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的检出率是 85.92%,其中 28.47%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感到轻度焦虑,38.69%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感到中度焦虑,18.77%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感到重度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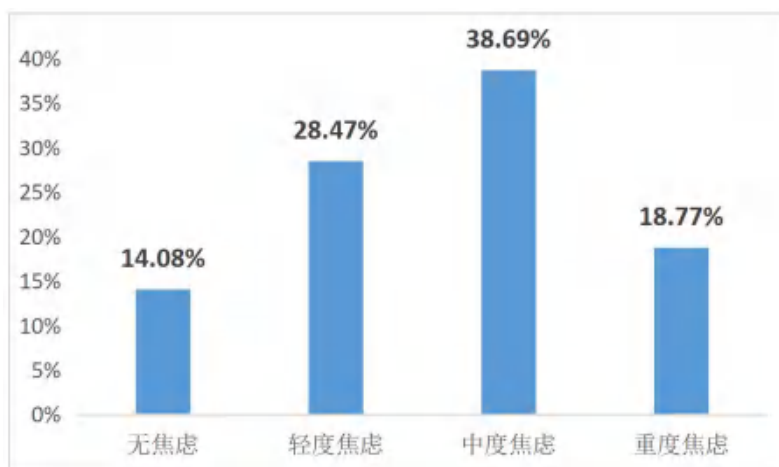


图2 家长的总体在线教育焦虑水平

其次,从内容上分析家长对孩子的在线教育焦虑,主要体现在家长对于孩子的手机使用( $3.32 \pm 1.48$ )、学习习惯( $3.31 \pm 1.41$ )、学习态度( $3.28 \pm 1.44$ )、居家学习效果( $3.27 \pm 1.32$ )、眼睛近视( $3.19 \pm 1.62$ )、开学学习成绩( $3.15 \pm 1.45$ )、缺乏锻炼( $3.02 \pm 1.49$ )、学习环境( $2.72 \pm 1.42$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对于不同内容的焦虑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习惯(80.66%)、居家学习效果(80.06%)、学习态度(79.12%)、开学学习成绩(78.75%)、手机使用(77.47%)、眼睛近视(73.57%)、缺乏锻炼(69.74%)、学习环境(60.79%)。

本研究还调查了家长在线教育焦虑的表现。结果显示,家长的教育焦虑突出表现为反复查看班级群( $3.72 \pm 1.08$ )、反复确认学习任务( $3.60 \pm 1.08$ )、易发火( $3.18 \pm 1.10$ )、压力大( $3.06 \pm 1.10$ )、易疲劳( $2.98 \pm 1.12$ )、无法安心做其他事( $2.84 \pm 1.15$ )、孩子情绪受影响( $2.81 \pm 1.14$ )、亲子关系出现矛盾

( $2.62 \pm 1.10$ )。对于不同表现的焦虑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反复查看班级群(85.92%)、反复确认学习任务(83.73%)、易发火(75.18%)、压力大(72.26%)、易疲劳(67.88%)、无法安心做其他事(63.19%)、孩子情绪受影响(62.25%)、亲子关系出现矛盾(57.14%)。

## (二)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的“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 1.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分析

由图3可知,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分别为一年级( $3.97 \pm 0.88$ )、二年级( $3.65 \pm 1.00$ )、三年级( $3.53 \pm 1.03$ )、四年级( $3.46 \pm 1.01$ )、五年级( $3.40 \pm 1.04$ )、六年级( $3.49 \pm 1.01$ ),呈现倒U型趋势,小学一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均分最高,小学五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均分最低,六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均分又向上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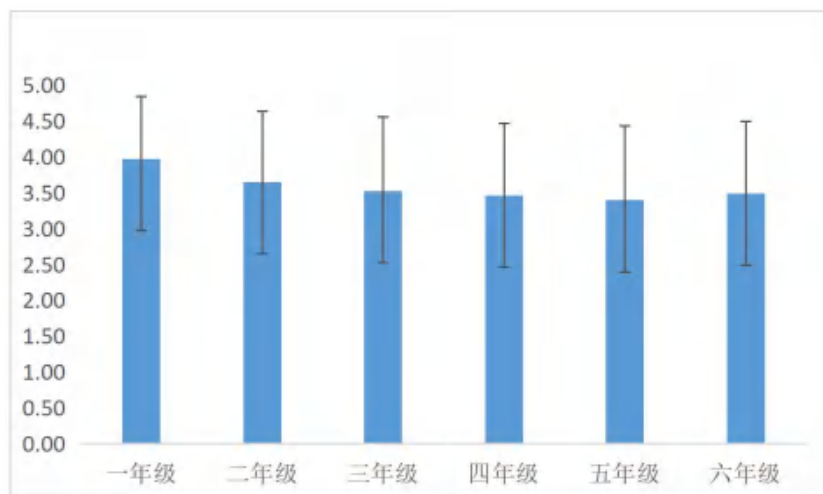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

同时,不同年级阶段的家长中重度焦虑的检出率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 $\chi^2=47.787$ ,  $p<0.001$ )。如图4所示,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检出率分别为一年级 73.26%、二年级 58.87%、三年级 58.40%、四年级 50.93%、五年级

48.91%、六年级 52.80%,也呈现出倒U型趋势,小学一年级家长的中重度焦虑检出率最高,小学五年级家长的中重度焦虑检出率最低,六年级家长的中重度焦虑检出率又向上升高。



图4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中重度在线教育焦虑检出率

2.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内容分析表2说明,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内容在学习习惯 ( $F(5, 953)=3.249$ ,  $p=0.006$ )、学习态度 ( $F(5, 953)=2.383$ ,  $p=0.037$ )、居家学习效果 ( $F(5, 953)=2.772$ ,  $p=0.017$ )、开学学习成绩 ( $F(5, 953)=2.791$ ,  $p=0.016$ )、眼睛近视 ( $F(5, 953)=2.257$ ,  $p=0.047$ )、缺乏锻炼 ( $F(5,$

$953)=4.465$ ,  $p=0.001$ )和学习环境 ( $F(5, 953)=3.028$ ,  $p=0.010$ )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学习效果、学习环境、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开学学习成绩上,一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显著高于二到五年级的家长;在缺乏锻炼和眼睛近视上,六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显著高于一到五年级的家长。

表 2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内容差异性检验 (M ± SD)

变量说明	一年级 (n=187)	二年级 (n=141)	三年级 (n=125)	四年级 (n=108)	五年级 (n=184)	六年级 (n=214)	F	P
学习	3.02±1.33	2.43 ±	2.63 ±	2.80 ±	2.68 ±	2.70 ±	3.028	0.010
环境		1.61	1.22	1.39	1.47	1.40		
学习	3.64±1.22	3.06 ±	3.17 ±	3.34 ±	3.33 ±	3.25 ±	3.249	0.006
习惯		1.53	1.41	1.32	1.58	1.33		
学习	3.56 ±	3.06 ±	3.14 ±	3.27 ±	3.26 ±	3.27 ±	2.383	0.037
态度	1.39	1.52	1.47	1.30	1.57	1.33		
学习	3.51 ±	2.99 ±	3.19 ±	3.25 ±	3.23 ±	3.35 ±	2.772	0.017
效果	1.16	1.50	1.26	1.31	1.40	1.24		
预期	3.37 ±	2.95 ±	2.94 ±	3.16 ±	3.03 ±	3.32 ±	2.791	0.016
成绩	1.37	1.60	1.36	1.41	1.65	1.28		
手机	3.33 ±	3.13 ±	3.34 ±	3.33 ±	3.28 ±	3.45 ±	0.851	0.513
使用	1.42	1.70	1.47	1.38	1.61	1.32		
眼睛	3.16 ±	2.93 ±	3.16 ±	3.02 ±	3.14 ±	3.46 ±	2.257	0.047
近视	1.57	1.77	1.74	1.49	1.70	1.45		
缺乏	3.11 ±	2.52 ±	3.02 ±	3.06 ±	3.01 ±	3.25 ±	4.465	0.001
锻炼	1.33	1.60	1.43	1.42	1.65	1.42		

3. 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表现分析

表 3 说明,不同年级阶段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表现在易发火( F (5, 953) =10.310, p<0.001)、压力大( F (5, 953) =6.213, p<0.001)、易疲劳( F (5, 953) =6.343, p<0.001)、无法安心做其他事( F (5, 953)

=6.493, p<0.001)和孩子情绪( F (5, 953) =8.473, 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压力大、易疲劳、易发火、无法安心做其他事、孩子情绪这些条目上,一年级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显著高于二到六年级的家长。

表 3 孩子不同学习阶段的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差异性检验 (M ± SD)

变量说明	一年级 (n=187)	二年级 (n=141)	三年级 (n=125)	四年级 (n=108)	五年级 (n=184)	六年级 (n=214)	F	P
情绪	3.41±0.98	3.09±1.09	2.92±1.03	2.75±1.15	3.02±1.14	3.02±1.13	6.213	<0.001
表现	3.35±1.04	3.00±1.13	2.92±0.99	2.79±1.16	2.96±1.15	2.78±1.11	6.343	<0.001
易发火	3.57±1.02	3.35±1.04	3.25±0.86	2.90±1.14	3.08±1.13	2.91±1.15	10.310	<0.001
反复确认学习任务	3.76±1.04	3.65±1.00	3.48±1.07	3.68±1.16	3.52±1.15	3.54±1.07	1.684	0.136
行为	3.82±1.03	3.77±0.98	3.56±1.07	3.86±1.12	3.59±1.16	3.71±1.10	1.824	0.105
表现	3.23±1.12	2.84±1.18	2.77±1.09	2.66±1.10	2.81±1.14	2.64±1.13	6.493	<0.001
无法安心做其他事	2.79±1.09	2.62±1.09	2.58±1.05	2.47±1.00	2.68±1.21	2.52±1.07	1.770	0.116
关系	3.22±1.10	2.91±1.08	2.81±1.14	2.64±1.09	2.71±1.22	2.54±1.08	8.473	<0.001
表现								



### (三)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与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为因变量,以社会人口学变量(身份、年龄、学历、所在城市、居住地、家庭年收入)、教育环境因素(家庭隔离人数、隔离时间过长、隔离无法出门、居家学习环境、家庭子女数量、孩子教育投入)、教育监督者因素(无法陪伴孩子、自身情绪不佳、不能辅导孩子、和他人作比较)、受教育者因素(居家学习时间、参与网课数量、网络教学效果、过度网络使用、学习不够自律、学习能力不佳、眼睛视力下降、情绪不够稳定、学习成绩情况、开学成绩落后)为自变量,以

$\alpha$  入 = 0.05,  $\alpha$  出 = 0.10 的水准,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最终模型(模型4)纳入年龄、家庭隔离人数、无法陪伴孩子、和他人作比较、居家学习时间、参与网课数量、情绪不够稳定、学习不够自律、学习成绩情况、开学成绩落后10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第一层  $R^2=0.049$ ,  $F(6, 959)=7.275$  ( $P<0.001$ ), 调整  $R^2=0.042$ ; 第二层  $R^2=0.131$ ,  $F(12, 959)=10.470$  ( $P<0.001$ ), 调整  $R^2=0.082$ ; 第三层  $R^2=0.300$ ,  $F(16, 959)=22.194$  ( $P<0.001$ ), 调整  $R^2=0.169$ ; 第四层  $R^2=0.395$ ,  $F(26, 959)=20.602$  ( $P<0.001$ ), 调整  $R^2=0.095$ 。

表4 家长在线教育焦虑水平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 $n=959$ )

因变量	预测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数		标准化偏回归数 Beta 值	$t$	$P$	$\Delta R^2$	$\Delta F$	$P$
		$\beta$	标准误						
家长教育焦虑整体水平	身份	-0.032	0.048	-0.019	-0.656	0.512	0.049	7.275	<0.001
	社会 年龄	-0.164	0.061	-0.077	-2.684	0.007			
	人口 学历	-0.051	0.042	-0.047	-1.211	0.226			
	学因 所在城市	-0.082	0.028	-0.056	-1.690	0.057			
	素 居住地	0.023	0.065	0.012	0.360	0.719			
	家庭年收入	0.007	0.041	0.006	0.157	0.875			
	教育 隔离限制	-0.051	0.029	-0.055	-1.767	0.078	0.082	13.040	<0.001
	环境 隔离人数	0.036	0.017	0.065	2.167	0.030			
	因素 隔离时间	-0.019	0.028	-0.021	-0.661	0.509			
	学习环境	-0.005	0.032	-0.006	-0.166	0.868			
	子女数量	0.038	0.061	0.019	0.620	0.536			
	教育投入	0.015	0.042	0.012	0.345	0.730			
	教育 陪伴缺失	0.105	0.038	0.110	2.758	0.006	0.169	49.984	<0.001
	监督 情绪管理	0.085	0.028	0.105	3.079	0.002			
	者因 辅导能力	0.057	0.033	0.063	1.733	0.084			
	素 横向比较	0.034	0.032	0.040	1.053	0.293			
	学习时间	0.124	0.041	0.088	3.073	0.002	0.095	12.946	<0.001
	网课数量	-0.043	0.021	-0.058	-2.042	0.041			
	教学效果	0.046	0.032	0.047	1.438	0.151			
	网络使用	0.063	0.033	0.071	1.889	0.059			
	学习管理	0.175	0.040	0.190	4.412	<0.001			
	学习能力	-0.057	0.041	-0.060	-1.377	0.169			
	视力下降	-0.002	0.032	-0.002	-0.054	0.957			
	情绪状况	0.114	0.033	0.127	3.405	0.001			

学习成绩	0.121	0.043	0.086	2.820	0.005
预期成绩	0.088	0.037	0.095	2.358	0.019

##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依据 2020 年在全国部分地区进行的疫情防控期间家长教育焦虑调查数据,探讨了 959 名家长的教育焦虑情况,并重点分析了疫情期间相关因素对家长教育焦虑水平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发现。

首先,疫情期间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处于较高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童家长的身心状况有影响<sup>[17]</sup>。焦虑控制缺乏理论强调当一个人碰到一种似乎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情境时,就会产生焦虑体验。焦虑是由自以为“对情境缺乏控制”引起的,不管实际上个体是否缺乏控制或应对能力。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停课改成居家在线学习,对开学时间的不确定、网络教学的质量未知、家中的学习环境不佳等一系列生疏的情境,让家长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失助感和“不能控制”的认识。这些“失控”可能正是家长们产生焦虑的重要因素。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习惯、居家学习效果、学习态度、开学学习成绩最为关注,这一研究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sup>[18]</sup>。学业成绩是衡量学习效果的客观指标,也是教育结果焦虑的重中之重。当今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大,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就业创业、职业发展等社会竞争相对激烈。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反映了对教育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家长焦虑发生成正比<sup>[19]</sup>。此外,手机使用、眼睛近视、缺乏锻炼等不良身体结果,也会导致家长的焦虑。在陈青文对家长的访谈报告中发现,家长对孩子使用新媒体的态度,多是强调使用新媒体的风险,且在风险方面只提及视力问题<sup>[20]</sup>。疫情期居家隔离在线学习,孩子使用新媒介的频率大幅增长,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不注意用眼卫生,不能出门进行身体锻炼,都能增加家长的教育焦虑。

其次,不同年级阶段的家长焦虑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新生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水平最高,随

着年级上升,家长的焦虑程度逐渐下降,小学六年级出现拐点,达到新高。幼儿园期间,家长主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与自我保护、饮食营养、生活习惯的养成。到了小学低年级期间,仍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教育让孩子开始背负起学习任务,家长也卷入其中。其中,教育资源稀缺感、竞争危机、攀比虚荣、媒体与教育机构的过度宣传等种种原因,给刚进入学习阶段的新生家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此次疫情还未结束,疫情期间的教育焦虑会与疫情直接相关。居家环境下,时刻陪伴式辅导学习,让家长具有更高的教育卷入,这种高威胁卷入感会让新生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关注更多。因此,一年级家长会比其他年级家长表现出更高的教育焦虑。随着年级升高,无论是总体水平,抑或是焦虑内容与表现,家长的教育焦虑的程度显著下降。在孩子学习结果、家长的情绪表现、部分行为表现与亲子关系上,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均出现“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对于“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已有研究者提出认知失调理论和个体知识经验说来解释<sup>[15]</sup>。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处于二到五年级的家长体验到认知失调,由于孩子入学学习这一客观事实无法改变,与焦虑情绪等感知相冲突,为了改变这种认知上的失调,家长会改变他们的焦虑,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应”;根据个体知识经验说来看,高年级的家长更多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来感知孩子教育中的负性事件,而新生家长则主要通过各方媒体的报道和身边亲友的诉说,因此,心理上会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当然,解释“心理台风眼效应”和“涟漪效应”的心理机制,到底哪一种理论解释最具有说服力,或者有其他情绪应激的理论来进行解释,需要加入更多变量进行更深入研究。本研究的数据只是从家长教育焦虑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六年级家长的焦虑程度显著再次上升,六年级的孩子即将从小学毕业进



入初中,新的学习环境、教学安排、学习方式,让家长再一次“陷入”焦虑情境,正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被砸中的那一点波动最大,外围水域的波动程度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sup>[2]</sup>,六年级的家长再次靠近风险事件——即孩子进入初中学习阶段,家长对于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也相对增高,这也正好符合“涟漪效应”。

最后,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来看,社会人口学特征、家长因素和孩子因素对家长的婚教育焦虑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 从社会人口学变量来看,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年龄相关。首先,年龄越大,家长教育焦虑程度越低,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sup>[17]</sup>。家长年龄越大身心状况越好,可能与年龄越大生活阅历、社会经验越丰富有关,面对疫情时心态更加平和,能够沉着应对。

(2) 从教育环境因素来看,家长的在线教育焦虑与家庭隔离人数有关。疫情期间,家庭成员都居家隔离,家庭隔离人数越多,生活上的琐事和摩擦就越多,在面对孩子的学习时越力不从心,从而使得焦虑程度上升。而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环境的焦虑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不同。但这一点结论符合单纯暴露效应,即多次经历可能会产生熟悉化和习惯化过程,从而使人们降低对风险的认知。新冠疫情居家期间,家长与孩子都居家隔离,家长对孩子教育卷入程度更高,家长更为熟悉孩子居家的学习环境,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环境的焦虑程度。

(3) 从教育监督者因素来看,无法陪伴孩子是一个焦虑因素。对于孩子的学习问题,家长总是投以最高关注。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紧密<sup>[21]</sup>。发生在家庭的陪伴学习辅导是以家长和子女为主体的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其中也蕴含着相应的教育期望。大部分的家长认为子女学习效率低,理解和记忆能力弱,扮演教师角色的家长尽管已经讲了很多遍,子女依然难以有效内化和再现某些知识内容<sup>[22]</sup>。而当家长已经复工去上班,孩子独自在家学习,无人监

督陪伴,家长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父母既会对无法陪伴孩子感到焦虑,也会在与其它家长和孩子的一次次比较中越发焦虑。父母不仅对孩子成绩十分关心,也会重视孩子与其同伴成绩的比较。孩子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同伴影响,而孩子只有与群体保持一致,甚至出类拔萃,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导致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同辈群体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还会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来感知孩子的竞争压力。在交流与比较中,家长也因此越发焦虑。

(4) 从受教育者因素来看,首先,孩子居家学习时间越长,孩子情绪越不稳定,家长的焦虑程度越高。有研究表明,焦虑在家庭中可以传播,焦虑的父母往往会在家庭中传达其对未来潜在威胁的看法和担忧,继而在儿童中传递焦虑<sup>[23]</sup>。同样地,当居家学习时间过长,孩子因疫情隔离而会产生无聊、烦躁、迷茫、郁闷、担心情绪<sup>[24]</sup>。孩子的情绪不稳定时,这种情绪也会传递给家长,引起家长的进一步担忧。

其次,孩子参与网课数量越多,家长的焦虑程度越低。研究表明,对于疫情期孩子的在线学习,家长的态度是积极与忧虑共存,家长参与子女线上学习的态度比较积极,认为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比各有利弊,甚至利大于弊,承认线上学习的有效性,并表示疫情结束以后也会继续支持子女进行线上学习<sup>[25]</sup>。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形式丰富、学习便捷,孩子所参加的数量较多,学习的助力大,家长需要操心的少,焦虑程度也因此下降。

最后,孩子学习不够自律、学习成绩情况、开学成绩落后这些学习习惯和成绩因素以及家长与其他人做比较,对家长的教育焦虑存在显著影响。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结果是最为重视的,在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下,许多家长将增强社会竞争力简单地等同于提升学业成绩。在教育焦虑下,家长过于担忧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就业问题,喜欢与同辈盲目攀比,并向孩子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成就期望。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为导向,对孩子的学习习惯与

成绩格外看重;同时,以“唯分数、唯成绩、唯排名”为第一追求,与同辈进行比较,为孩子安排高强度的学习规划,绝不允许孩子掉队,对孩子呈现出较高的期待和严格的要求<sup>[26]</sup>。

鉴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改善家长教育焦虑的几点建议:

(1)疫情期间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较高,应发挥家校联动作用,对家长观念进行干预,家长高度依赖来源不明的网络信息,并乐于在家长社群中沟通、讨论教育问题,期间缺乏专业的引导。对于新生家长,更应该提前做好通知,与家长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作为与家长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学校和老师拥有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如能举办教育理念类讲座,将能为家长输送更有效、更健康的教育观念和方法。

(2)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孩子以后的生活,只不过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被窄化和偏离。因此,在进一步的干预中,应不断帮助家长设定正确的教育目标,从

而拓展家庭教育的范围,丰富家庭教育的手段,使之更接近于素质教育。同时,应当帮助家长们厘清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将学习的主体还给子女。家长给予适当的支持,子女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既有利于其全人发展,也有利于减轻家长的焦虑。

(3)加强对媒体、培训机构宣传的监管建议监管部门针对教育培训行业,对媒体与培训机构的广告宣传提出更多要求,减少煽动性内容,控制恶性的炒作宣传。作为媒体应主动负担起引导舆论、引导观念的作用。传播儿童成长的正面典型,宣传健康的教育理念,减少对教育焦虑的煽动加温。

(4)家长对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辅导有着迫切的需求,这是进行家庭教育的有利因素。但总体看,家长仍然缺乏系统性知识与技能,缺乏权威性指导。地方部门可利用相关有利因素搭建区域性平台,提供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全国范围内也可形成家长教育网络,以利于教育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与学习。

#### 参考文献

- [1]何敏琪,何进军. 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调查研究[J]. 教育导刊(上半月), 2020(10):45-51.
- [2]温芳芳,马书瀚,叶含雪,等. “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不同程度 COVID-19 疫情地区民众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双视角检验[J]. 心理学报, 2020,52(09):1087-1104.
- [3]蒋昌忠. 从中华教育传统中汲取育人智慧[J]. 人民教育,2020(11):30-31.
- [4]高洁. 从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中洞见家庭教育焦虑之殇[J]. 中华家教,2021(01):81-84.
- [5]黄晓磊. 家庭教育焦虑作为社会综合征的治理逻辑[J]. 中华家教,2021(01):90-92.
- [6]崔保师,邓友超,万作芳,李建民,黄晓磊,秦琳,翁秋怡,曹培杰,杜云英. 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J]. 教育研究,2020,41(08):4-17.
- [7]雷望红. 中国城乡母职形象何以分化——“教育家庭化”中的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J]. 探索与争鸣,2020(10):148-156+160.
- [8]刘善槐. 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从何而来[J]. 人民论坛,2020(14):72-74.
- [9]韩海棠. 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 现状、问题与原因[D]. 华中科技大学, 2018.
- [10]Li S, Li J, Yang S,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in responses to terrorism[J].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2020,14.
- [11]Pok M T M, Stephen X Z P, Chi H L M, et al.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during COVID -19 crisis: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theory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J].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2020,74(10).

- [12]Zhang L, Ma M, Li D,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the role of coping efficacy and perceived threat. [J].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2020,16(1).
- [13]梁哲, 许洁虹, 李纾, 等.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J]. 自然灾害学报, 2008(02):25-30.
- [14]杨舒雯, 许明星, 匡仪, 等.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慌: 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台风眼效应”[J]. 应用心理学, 2020,26(04):291-297.
- [15]谢晓非, 林靖. 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综述[J]. 中国应急管理, 2012(01):21-25.
- [16]谢佳秋, 谢晓非, 甘怡群. 汶川地震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47(05):944-952.
- [17]黄峰, 杨喆, 杜春艳,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儿童家长身心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2020,31(02):151-156.
- [18]冯博, 宋莉莉. 中国城市家长教育焦虑现状解读[J]. 管理观察, 2018(23):141-143.
- [19]付晓珊. 子女教育投入、教育期望对中产阶层焦虑的影响[D]. 西南财经大学, 2019.
- [20]陈青文. 新媒体儿童与忧虑的父母——上海儿童的新媒体使用与家长介入访谈报告[J]. 新闻记者, 2019(08):15-25.
- [21]Xitao 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Growth Modeling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2001,70(1).
- [22]虎金峰. 子女家庭作业辅导中家长焦虑情绪初探[J]. 少年儿童研究, 2020(03):17-22.
- [23]马月, 刘莉, 王欣欣, 等. 焦虑的代际传递: 父母拒绝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24(01):23-27.
- [24]马天宇, 杜亚松, 王伟杰,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幼儿居家心理状态的网络调查[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28(12):1842-1847.
- [25]靳小玲, 王晓宇. 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家长参与子女线上学习的现状调查[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42(05):156-160.
- [26]刁生富, 李香玲. 基础教育焦虑探讨[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4(06):57-61.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沙盘游戏对幼儿攻击性行为的个案干预研究

楼晶 杭州市天水幼儿园

邮箱: 919975955@qq.com 邮编: 310000

**摘要:** 学前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极大危害,是令家长和教师头疼的“难题”。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一名小班幼儿进行为期三个月共 12 次的沙盘游戏,帮助个案宣泄负面能量,强化规则意识,从而有效地改善个案的攻击性行为。

**关键词:** 攻击性行为 沙盘游戏

### 一、个案背景:不受欢迎的“小魔丸”

午餐时间,浩浩一只手拿着勺子吃着饭,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向身边的晓晓伸过去,他的眼神甚至都没有看向晓晓,突然用手拧了一下晓晓的手臂,晓晓哭喊了起来。我询问浩浩为何拧人,浩浩说:“我想跟晓晓一起玩呀!”

浩浩(化名)是一名小班幼儿,入园以来,每天都有孩子哭着来向老师“告状”:游戏时,他常常无故抓小女生的头发;喝水时,他拿着水杯不自觉地敲打旁边小朋友的头,取牛奶时,只要边上有小朋友,就会被他推到在地……争抢玩具、扭打人、推搡踢打、撕扯头发,班级里 2/3 的孩子都惨遭浩浩的“毒手”,开始害怕并排斥与他玩耍,浩浩俨然成为了班里最不受欢迎的“小魔丸”。

教师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苦口婆心地教育浩浩,但成效甚微。虽然浩浩的攻击性行为属于个别幼儿行为,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班级管理以及幼儿的集体生活,阻碍了幼儿常规意识的培养以及幼儿身心发展。

笔者通过 CBCL 儿童行为量表的攻击性行为分量表,浩浩的攻击性行为得分偏高(25 分)。同时,利用行为观察记录表(见附表 1),采用时间取样观察法记录浩浩在单位时间内攻击性行为的表现与频次,在一天中随机选取 2 个时间段进行观察,每次观察 20 分钟,持续观察 5 天。

经观察,浩浩的攻击性行为主要表现为工具性攻击,当浩浩想要获取某样物品或自己的东西被破坏时,是以把攻击他人作为达到自己

目的的方法,这符合小班幼儿攻击性行为的特点<sup>[1]</sup>。在浩浩的攻击性行为中,有躯体攻击,包括推、打、抓、抢、咬、踢、撞等行为,以及言语攻击,包括恶言恶语,用粗野的话辱骂他人等,躯体攻击频次远远高于言语攻击频次。观察结果显示,浩浩在单位时间里的攻击性行为频数是 2.01,而正常儿童在单位时间里的攻击性行为频数为 0.5,表明浩浩相对于正常幼儿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学前儿童攻击性行为是指学前儿童因某种原因,有目的地向他人进行言语攻击或身体攻击,给被攻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身心伤害,影响班集体生活的问题行为<sup>[1][2][3]</sup>。

### 二、沙盘游戏的干预方案

#### (一) 沙盘游戏

沙盘游戏是目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一种心理辅导技术,其本身起源于儿童的游戏以及人们对儿童游戏的观察。沙盘游戏中的象征以及象征性,是无意识表现得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学龄前儿童喜欢“沙盘游戏”,在整个沙盘游戏过程中,通过沙子、水、沙具进行的自主性游戏与象征性表达,幼儿的无意识有了呈现的机会与可能,“自我治愈”也开始发生与发展。

相关研究显示,沙盘游戏对幼儿的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的干预成效,且有利于促进幼儿的社会交往<sup>[2]</sup>。沙盘游戏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不仅为攻击性幼儿提供了能量宣泄与问题呈现的机会,而且能够让幼儿体验到规则存在的

意义与重要性,从而增强攻击性幼儿的规则意识,有助于减少攻击性行为的出现。

## (二) 沙盘游戏的方案设计

笔者在征得家长同意之后,计划对浩浩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沙盘游戏干预,每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计划实施进行 12 次。沙盘游戏干预过程主要分为 3 个阶段(见表 2),前 3 次为第一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与浩浩建立良好的

的信任关系,并对浩浩进行初步的评估;第 4-9 次为第二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使浩浩的负面情绪得以合理地宣泄,知道攻击性行为的严重后果,尝试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第 10-12 次为第三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巩固沙盘游戏的干预效果,让浩浩做好游戏结束的心理准备,逐步结束沙盘游戏工作。

表 1 沙盘游戏干预方案

阶段	干预单元	阶段目标
阶段一	1-3 次	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阶段二	4-9 次	宣泄负面情绪,改善攻击性行为
阶段三	10-12 次	巩固干预效果,逐步结束

## 三、沙盘游戏干预过程:试探边界的“小魔丸”

浩浩拿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垃圾桶,把它装满沙子,然后倒出沙子,重复 N 次,乐此不疲。一不小心,他把沙子撒到了沙盘外面,我的裤子上也有些沙子。他看着地上的沙子,再看看我,一边用手掸去我裤子上的沙子,一边说:“哎呀,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可以把沙子弄到外面的,对不对?”我说“没关系,你继续玩吧。”

后来,浩浩看到有沙子倒在了沙盘的边缘上时,会立刻停下手上的动作,放下沙具,把沙子轻轻地拨回沙盘中,然后看着我说:“老师,我会小心的。”

这是浩浩的第 4 次来玩沙盘游戏。前 3 次他都肆无忌惮地撒着沙子,期间我用手挡了挡被他扬出的沙子,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宣泄着,仿佛在试探边界。而这次,因撒出沙子而主动道歉,并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他还帮我掸去裤子上的沙子,这让我感到很惊喜。

浩浩最喜欢的沙具是小汽车和垃圾桶,每次工作时都会拿这些沙具。辅导工作的前半程,他还会拿飞机、坦克,阻挡着小汽车的前行,那些小汽车象征着自我意识的力量,而军事武器却一直在打压着自我意识的成长。这些

沙盘场景让我看到浩浩内在秩序感的混乱以及内心的冲突,充斥着无处安放的巨大能量,似乎也在表达着情感上被父母忽略的不满。但在工作的后半程,他会说“坦克是来保护小汽车的”。军事武器不再与小汽车们发生冲突,而是与小汽车同一个方向在前行,他内在的能量正在进行梳理并积极地转化。

浩浩钟爱的垃圾桶,一个藏污纳垢的容器,容易被忽视、被厌弃、被远离,仿佛是他的自我投射,让我看到了现实中的他,尽管不受同伴欢迎、不讨喜,但仍怀着渴望得到同伴认可、融入集体的心,努力地找寻着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

## 四、沙盘游戏干预成效:友好相处的“小灵珠”

### (一) 浩浩借助沙盘游戏释放负面情绪

沙盘游戏干预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实际共进行了 11 次,前 3 次作为第一阶段,第 4-9 次作为第二阶段,最后 1 次作为结束阶段。沙盘游戏干预过程主要经历了问题呈现、斗争与转化、获得治愈这三个阶段,浩浩借助沙盘游戏逐步宣泄了负面能量,释放了不良情绪,干预效果显著。

浩浩非常喜欢沙盘游戏,进行干预后主要发生了以下 3 点变化:

### 1. 沙盘作品从创伤主题逐渐转变为治

愈主题。

浩浩在前 4 次的工作中，受限、受阻的创伤主题呈现得较多，治愈主题较少，沙盘中出现冲突、对抗等攻击性场景，从第 5 次开始，沙盘中受伤、争斗等攻击场景逐步减少，主题逐渐变得温暖和谐。通过沙盘游戏，浩浩将内心的矛盾冲突呈现在沙盘中，宣泄着对父母因工作而忽略自己的不满，释放了负面情绪。

2. 沙具种类逐步从单一变得丰富。

干预初期，军事战争、武器、车辆等能量较强的沙具使用频率很高。干预中后期，沙盘中逐渐增加了动物类、家具类、建筑类以及植物类沙具，说明孩子的内心逐渐丰富。其中，浩浩使用次数最多的是一个垃圾桶沙具，一个

藏污纳垢的容器，容易被忽视、被厌弃、被远离，仿佛是浩浩的自我投射：在现实中尽管不受同伴欢迎、不讨喜，但他仍怀着渴望得到认可、融入集体的心，努力地寻找着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

3. 扬沙、洒沙的行为逐渐减少。

干预初期，浩浩非常喜欢扬沙，并且会故意把沙子洒到沙盘外，在笔者的言语与动作提示下，浩浩仍然控制不住自己。干预中后期，浩浩扬沙与洒沙的行为明显减少，会在不小心把沙子弄出沙盘时，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把沙子拨回沙盘中，说明浩浩内在的规则意识在逐渐增强，愿意遵守游戏规则，这有利于他将沙盘游戏中的积极经验迁移到生活中。



图2：第1次沙盘游戏                      图3：第5次沙盘游戏                      图4：使用频率最高的沙具：垃圾桶  
（备注：幼儿沙盘的流动性较强，故呈现的是最终画面。已获得家长同意用于本次论文中）

（二）沙盘游戏中的积极体验迁移到日常交往中

建构区，浩浩认真地搭着积木，然后走到我面前展示给我看，“老师，你看我搭的垃圾车”。最近，你不再通过制造麻烦来吸引我的注意。

娃娃家，你问小薇：“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小薇说“好的。”只见你拿起针筒玩具轻轻对着小薇的手背说，“我给你打针吧”，打

完之后，你还一边揉揉她的手一边说“打针很疼的。”

笔者通过时间取样观察法，发现浩浩在单位时间（20min）内出现的攻击性行为频次明显降低，同时亲社会行为（包括分享、谦让、关心他人等）出现的频次有所增加，说明采取的干预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幼儿的攻击性行为（见表 2）。经过干预，教师与家长对浩浩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 3）。

表 2 单位时间内攻击性行为频次统计表（单位：次）

	躯体攻击	言语攻击	攻击总频次	亲社会行为
干预前期	1. 57	0. 44	2. 01	0. 45
干预后期	0. 80	0. 23	1. 03	0. 96

表 3 教师与家长对浩浩行为改善的评价

评价者	评价内容
教师	1. 攻击性行为明显较少；躯体攻击明显减少； 2. 干预前期言语攻击有增加，干预后期言语攻击又逐渐减少； 3. 能够在教师的提醒下，尝试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 4. 愿意遵守规则，排队时不再一味要求排在队列第一个； 5. 遇到问题时会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 6. 同伴互动时会先使用语言与其他幼儿交流； 7. 会征求他人的意见，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家长	1. 能在成人的提示下，尝试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与负面情绪； 2. 能够遵守共同商定好的规则，不满足时哭闹反应明显减少； 3. 会主动帮助家长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4. 小区里有小朋友愿意和浩浩一起游戏； 5. 在家与表姐游戏时，发生冲突大幅减少。

## 五、总结与反思

通过沙盘游戏的干预，浩浩的攻击性行为得到明显减少，规则意识增强，同伴关系也有所缓和。同时，浩浩的改变能让其他幼儿免受身心灵伤害，促进了班级常规的建立以及家长工作的开展。

在干预过程中，笔者一直作为陪伴者与观察者，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孩子，接纳他的攻击性，给予他充分的关注，建立清晰的边界，将孩子无意识的行为与情绪意识化，内在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潜在的积极能量得以发掘，心灵得到滋养与成长。所有表象背后，都有心理的需求。攻击是为了表达与联结，是孩子的成长信号，是获得成人关注的途径，是孩子试探边界的表现，是无法表达的亲密，是难以自

控的恐慌。

在“小魔丸”的沙盘之旅中，他在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間里，内在的心灵得到了充分地表达。沙盘游戏只是一盏灯，一面镜子，照见了他不曾被看到的那一面，接纳了他不被接纳的那个部分，看见了他渴望被认可的需求，发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生长欲望，逐步蜕变成为一颗友善的“小灵珠”。

当然，在干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浩浩的攻击性行为会出现反复倒退的情况。研究表明，儿童的移情能力与其攻击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sup>[4]</sup>，因此为巩固效果，有必要继续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渗透移情训练，培养浩浩的亲社会行为。

## 参考文献

- [1] 李俊. 3~9 岁儿童攻击性行为调查[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4, 10(4): 43-46.
- [2] 曲亚. 沙盘游戏对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干预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2019.
- [3] 王亚礼. 中班幼儿攻击性行为早期干预的个案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 赵欢欢, 张和云, 王福兴等. 儿童依恋、移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J]. 心理研究, 2012, 5(3): 34-39.
- [5] 朱婴, 薛爱芝, 储东升, 王青. 学前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与教育对策[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1, 8(9): 271-272.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沉迷网络游戏学生中的运用

湖州市泉生小学 沈婷婷  
stt1227@163.com 313000

[摘要] 沉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个人发展。特别是疫情期至今,学生接触电子产品时间增多,沉迷游戏的案例也呈较高的上升趋势。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一个正面的,以行动为主的治疗方法,在辅导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中有着独特的应用价值。本文从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出发,探讨其在辅导沉迷网络游戏学生中的运用,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沉迷网络游戏;学生

### 一、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通过网络学习、上课的客观需求大大增加了他们接触手机的可能性,也拉长了学生的网络使用时间。再加上因为宅家的原因,娱乐方式变得较为单一,而网络游戏就成了许多人的娱乐方式。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还不足,很容易沉迷网络游戏,进而造成亲子冲突、厌学甚至产生网瘾等。

即使在恢复学校上课后,部分学生还是无法摆脱手机游戏带来的巨大的吸引力和满足感。学习与游戏在时间上、精力上、获得感上存在着较大的冲突,这导致学生的心理也逐渐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进而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疫情期及后疫情时期,在学校心理工作中,接到了较多的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个案,其中以四、五年级以上的男学生居多,表现为沉迷游戏无法自拔、对学习、亲子关系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期和成熟期,长时间上网会使青少年迷恋于虚拟世界,导致自我封闭,与现实产生隔阂,不愿与人进行面对面交往,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青少年正常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定位,甚至可能导致人格异化,不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和正确人生观的塑造。本文从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论和实际运用出发,对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进行辅导,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二、什么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短期治疗的一种新尝试,其主要特征是治疗关注未来、目标明确。这种疗法更多关注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放在探讨问题成因上,希望从积极面去了解来访者的问题,重视来访者自身的资源,通过鼓励并塑造来访者积极的自我应验预言,从而创造改变的可能性。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提出,人是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们应当协助学生去发现自己的资源和潜能,并运用自己的资源去解决沉迷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其次,它认为我们应当聚焦解决方式而不是原因,因此在辅导过程中,采用一定的技巧使学生从“讨论问题本身”转移到“讨论解决之法”上。理论提倡小改变引发大改变,因此在辅导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中,帮助他们寻找问题背后的“例外”,并引导学生观察这“例外”是何时、何地发生的,引导他们针对自己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做出一个个小小的改变,增强改变的信心和力量。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网瘾、厌学、学生的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等问题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辅导效果。在李丽等撰写的《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焦点解决短期个案治疗》一文中,通过“建构——目标设置——探索例外——假设目标架构”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个案辅导,三周后,学生的手机成瘾性、冲动性、焦虑水平均有了下降。

### 三、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实施过程

学生痴迷网络游戏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因此,让孩子逐步摆脱对网络游戏的依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大多数咨询的学生虽没有达到“成瘾”的程度,但如不加以控制,则容易让孩子深陷其中,特别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叛逆会引起学生行为过当,加大教育的难度。因此,运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论,将关注点放在如何一步步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上,充分利用学生的自身资源,引导学生一点点改变,这对学生来说,是可以接受并愿意去尝试的方法。

### (一) 正认知——构建解决方案

#### 1. 设定目标, 离开负面情绪

在此阶段,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倾听学生的诉说, 给予共情, 帮助他理清思绪, 通过循环式提问, 将他的忧虑和抱怨转化为想要达到的目标——减少游戏时间, 提高学习效率。这个目标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也不是毫无建设性的抱怨, 而是正向、动态、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

#### 咨询片段节选:

小毅(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 我经常想玩游戏, 上课也想着, 无法集中注意力, 经常分心走神, 做作业效率非常低。我感觉玩游戏才能让我放松, 玩完以后我还想玩, 感觉自己停不下来, 我学习上的问题也静不下心来解决。

辅导老师: 那么, 你希望自己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是怎样的?(正向目标)

小毅: 我希望自己能够减少一点玩游戏的时间, 该学习的时候能认真学习。

辅导老师: 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 你会收获些什么呢?

.....

我通过引导学生正面述说, 促使他思考要达到的目标, 并引发学生描绘他想拥有的、想要达成的景象, 而非停留在负面的抱怨中。学生在述说中, 把自己的烦恼转化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 并通过对目标达成后的思考, 感受正向目标带来的吸引力, 感受到这个正向目标的重要性。

#### 2. 寻找“例外”, 发展正向资源

无论多么棘手的困扰, 总有偶尔不发生的时候, 这就是“例外”。“寻找例外”就是让学生想想在哪种情况下他不会烦躁、能暂时忘了游戏这件事, 认真学习。当协助学生找出“例外”时, 就可以减弱他深陷困境的挫折感, 引导他看到“小改变”的存在, 看重“小改变”的价值, 看到自己的能力和资源, 促进“小改变”持续发生, 增强自我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 并试图在以后让“例外”多发生一些。

#### 咨询片段节选:

辅导老师: 你在平时生活中有没有想不起玩游戏, 学得效率还挺高的时候呢?

小毅: 好像最近都没有吧!

辅导老师: 最近没有? 那以前呢?

小毅: 哦, 我在五年级之前还没玩这个游戏, 学习挺轻松的, 好像也没那么烦躁的事情, 学习效率也还好。

辅导老师: 在怎样的情况下, 你感受不到游戏带来的吸引, 也能认真地学习下去, 或者就算你玩了游戏, 也能及时从游戏中出来?

小毅: 做我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我学习的内容比较轻松, 我能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我会暂时忘了游戏。

辅导老师: 哦, 也就是说你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你自己的目标。假如现在奇迹发生了, 你的问题解决了, 此时你自己和同学、父母、老师会有什么反应?

.....

在谈话中, 我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压力源, 通过“寻找例外”明白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 进一步了解想玩游戏的心理机制, 明白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例外”的时候。而且, 这个“例外”并不遥远, 只是被自己的负面情绪掩盖了。接着, 引导学生从认知上转变态度, 进而改变想玩游戏的心理机制, 这一步也是对他的不合理认知进行修正的关键。

### (二) 塑行为——细化转变过程

#### 1. 制定“小步子”行为训练表

咨询过后, 大部分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对自己沉迷游戏、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形成了正确的认知, 也产生了强烈的改变愿望。如何改

变呢？这是关键。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小步子”技术，与学生一起制定《“小步子”行为训练表》，把玩网络游戏的时间从长到短，进行了目标的制定。根据该生目前玩网络游戏的时间进行目标设定。如：从刚开始一天玩 2 小时的目标，逐步调整到 1 小时 50 分，1 小时 30 分，1 小时，到最后，一周玩 0.5 小时。这样，我们把一个大目标，逐步细化成若干个小目标，这样孩子改变也有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根据心理学中的态度行为转变原理，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对自己影响小的转变。

在制定训练表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训练表必须是与学生一起制定，学生认可并接受的，最好可以请家长、其他老师或者孩子信任的同学作为监督人，这样更有利于约束孩子的行为。如有违反，也需制定了一系列小小的惩罚措施，如表现佳，也有其他的奖励行为。这样，通过“制定分段目标——执行目标——监督”三个环节循环作用，可以帮助学生坚持执行目标，避免出现松懈的心理。

## 2. 尝试“分段满足”的行为改变训练

部分学生刚开始的时候，对减少网络游戏时间的目标完成度很高，毕竟与原来玩游戏的时间想差不多，因此，获得的成就感也很高。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玩游戏的目标时间越来越短，行为转变的过程出现了反复，学生又想多玩会儿游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对学生进行意志力的锻炼外，可以把目标训练内容再进行细化，针对每天玩游戏的总时间，把时间分成若干小时间，每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怎么去用掉这些时间，只要总时间不超过制定的目标即可。

### 咨询片段节选：

小毅：老师，我觉得太难了。我现在又总是忍不住多玩一点时间。

辅导老师：按照我们约定好的训练目标，时间没法做出改变。那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小毅：我是很想坚持，可是，我时不时想玩怎么办？时间用完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又想玩了。

辅导老师：或许我们可以定一个分段玩游戏的时间表，总时间没有超过你这次的目标时间就可以。你看看能不能接受？

小毅：我想想，我能时不时玩上一会儿的话，我能接受。

……

在辅导过程中，学生表示，项目进行到一定时间后，坚持变得越来越难，心理也出现了疲惫，因此“分段满足”的训练方案可以让学生在改变最难坚持的时刻坚持下来。学生行为、态度转变过程中，时有反复是很正常的，在这个阶段，辅导老师需与学生一起去尝试新的解决方案，聚焦问题本身，不拘泥于首次制定的计划，在改变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办法可以去尝试。这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关注“解决问题”的内在。

## 3. 寻找“他山之石”的心理替代方案

很多学生玩游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放松方案，无聊的时候、烦躁的时候、焦虑的时候，玩游戏已经成为了他的思维定势，特别是在疫情宅家时期。这些娱乐方法一直延伸到了正常生活后，变成了学生很难摆脱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咨询过程中，可引导学生思考课余时间、周末时间可以做的事情。通过交流，引导学生去接触和参与多种娱乐和运动，打球、骑自行车、跳绳等运动；可以下下棋、与家人聊天、做做手工等；还可以多阅读课外书，在书海世界遨游，领略书中的奇妙。当学生对自己的课余生活有了一定的方向和认识，他们的精力就有了转移点，也就不会时刻想着玩游戏这件事情了。

在心理辅导中，辅导老师应更多关注求助者自身资源的开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辅导老师则充当协助他们理清思路、启发思考的引导者角色。本文中，辅导老师借助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塑造新的行为，把目标聚焦在“解决问题”上。在辅导过程中，作为辅导老师，应积极地关注到求助者自身的心理资源，充分给予他自助的能力和信心。

改变行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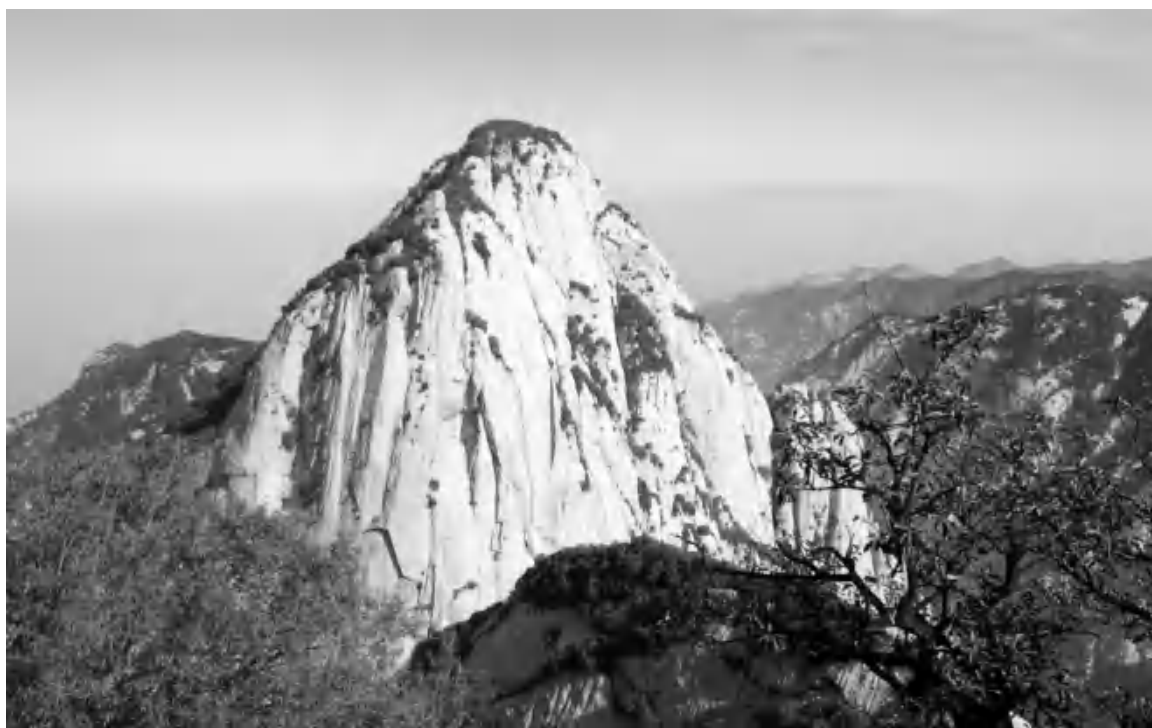
候,一些问题的导火索都会引发孩子心理问题的反复,因此,行为训练需要在辅导后多练习,

一张目标明确的行为训练表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去改变行为,并巩固训练成果。

#### 参考文献

- [1]沈黎,刘斌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模式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运用——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理论的介入视角.青年探索.2009,03.
- [2]顾蒙蒙.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运用.青春岁月.2018,02.
- [3]吕思琦,刘丽.焦点解决短期咨询在青少年心理咨询中的适宜性[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7,023.
- [4]李丽,梅松丽.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焦点解决短期个案治疗.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19.

(责任编辑:史金芳)



## 沙之物语,“蝶变”从心开始

——基于心理沙盘游戏对儿童辅导的个案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南浔附属小学 邵琳

526016515@qq.com 313009

[内容提要]: 沙盘游戏是采用意象的创造性治疗形式,“集中提炼身心的生命能量”在所营造的“自由和保护的空间”的治疗关系的气氛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富有创意的意象,便是沙盘游戏之心理治疗的创造和象征模式。亚斯伯格症是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一种,他们主要表现为由于心理理论的缺乏而导致的社交障碍和情绪行为异常。我们通过沙盘游戏对一名亚斯伯格症儿童进行了一年的干预,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把沙盘游戏疗法应用到心理辅导案例中的初探。

[关键词]: 沙盘游戏 自闭症 亚斯伯格症 心理辅导

### 一、提出问题

沙盘游戏是由瑞士心理分析师 Dora Kalf 提出,沙盘游戏是采用意象的创造性治疗形式,“集中提炼身心的生命能量”在所营造的“自由和保护的空间”的治疗关系的气氛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富有创意的意象,这就是沙盘游戏之心理治疗的创造和象征模式。它作为一种心理干预的方法,已被较多地用于改善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

亚斯伯格症是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症状最轻微的一种,通常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和情绪行为异常,与传统的自闭症儿童相较,他们并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力发展迟滞,所以这类儿童大多数在普通小学就读。他们在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控制方面有质的缺陷,导致他们经常会给老师和同伴带来严重困扰,比如不能遵守班级规则、经常和同学发生冲突以及频繁“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等。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疏通和引导,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缺陷会越来越严重,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甚至会出现伤害他人的行为。

我们通过沙盘游戏对一名亚斯伯格症儿童进行了一学期的干预,侧重探讨沙盘游戏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与儿童的互动模式以及效果,同时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治疗过程进行深度的描述与分析。探索沙盘游戏疗法在心理辅导中的应用。

### 二、分析个案

小熠,11岁,男,IQ:134,现在我校读小学五年级,顺产,母亲在公司上班,父亲是电梯厂技术人员,幼儿时期与普通孩子无异,进入小学阶段问题逐渐明显。他虽然思维活跃,学习也能跟上,但是情绪不稳定,常发生一些不受自我控制的多动行为,如:早操时,他装成“打醉拳”的样子,东倒西歪,甚至会“瘫软在地”;学习上,遇到挫折或者不顺心的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大哭大叫;活动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发出怪叫影响他人。据任课老师描述,他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喜欢奥数,语文和英语成绩差。班主任老师与他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发现他阻抗情绪严重,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经常会以“还好、都可以”之类中性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发生过的事经常说忘记了。

### 三、情况鉴定

鉴于亚斯伯格症儿童的临床表现与 ADHD(注意力缺陷)和 HFA(高功能自闭症儿童)相似,容易混淆:亚斯伯格症和高功能自闭症都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两者在社会性互动和心智理论发展上均有质的缺陷;亚斯伯格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行为表现上均有注意力不集中和行为冲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国内对亚斯伯格症的诊断过份依赖 A-DOS 测评,而该测评内容已被证明对智商 120 以上的个案不灵敏,恰好本研究的个案智商测试 134,所以,

本研究中的个案鉴定不单纯的依赖医学鉴定，会综合医学鉴定、教育和心理评估结果确保个案障碍类型的准确性。

我们对学生进行了评估，了解学生的详细情况如下：（表一）

姓名	小熠	年级	五年级
日期:	2020 年 9 月	地点	本校
参与人员	本校心理团队	施测者:	慎老师
观察\记录者	邵老师	上报原因	严重情绪行为问题
智商	瑞文推理测验 IQ134		
医院多动诊断	小熠严重注意力不能集中，主动注意力缺陷。		
教育评估	感知觉能力正常。记忆力超越同龄学生。空间和思维能力较好。 从整个测试的过程来看，学生能够配合与老师互动，但是与老师的眼光接触次数很少，回答问题很少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大家一致认为，这名学生是比较典型的亚斯伯格症儿童，鉴于他现在在学校的行为表现，需要尽快的进行干预。			

#### 四、辅导方案

##### （一）辅导方法

本案例作为沙盘游戏在心理辅导的过程中的初探，实施者采取了行动研究的取向，在分析和讨论研究的进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个深入的个案研究。所以，本次方法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

##### （二）辅导材料

一套沙盘游戏以及配套用品，包括沙盘游戏记录表、相机等。

##### （三）辅导过程

对小熠的干预过程包括 20 次沙盘游戏，

每周一下午由老师带学生进行干预，沙盘开始前，老师会和学生分享一些趣事，然后让学生分享，分享完毕后学生开始沙盘游戏。在给学生做沙盘时，我们参照了儿童玩沙盘的行为特点确定了 4 个阶段，包括沙盘游戏的启动阶段、建立与加强治疗关系阶段、治疗与问题转变阶段和发展与结束阶段。

##### 1. 沙盘的启动与初始沙盘：

小熠第一次接触沙盘游戏，他先将所有的沙具都环视一遍，几次伸出手去拿，但又马上放回原位，一直等老师告诉他，想玩什么都可以。他才开始动手摆放沙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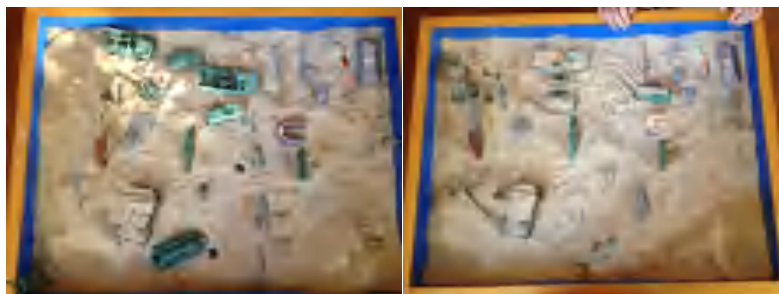


图 1. 小熠的初始沙盘照片

从上图可以看出：

	初始沙盘（英美大战）
日期	2020 年 9 月 15 日
沙具种类	人、战斗武器
被动语言	15 次（老师问，学生回答关于沙盘摆放的描述）
主动语言	1 次（你觉得我摆的好玩吗？）

该表中的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沙盘游戏的基本指标，包括使用沙具的情况，二是社会互动和情感连接指标，包括主动语言和被动语言次数。

初始沙盘的分析：小熠的沙盘主题是英美大战，从图上可以看出双方的实力悬殊，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另一方只有步枪和医院，而且在沙盘的面积划分上也有强烈的对比，学生说 he 自己是英国的，要打美国。

沙盘表现了一下主题：

受伤主题（混乱）：部署都比较乱，没有规则和次序感。

受伤主题（掩埋）：大部分的沙具都是被沙子掩埋了一部分，甚至被全部掩埋。

受伤主题（无边界）：玩的过程中，沙子会漏在沙盘外，学生没有意识到。

受伤主题（受挫）：数次想把士兵安放在坦克上，但是没有成功

受伤主题（死亡）：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均全军覆没。

初始沙盘，表达了学生内心世界的不安全感，自己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自己所在的英方面积明显的少于对方，从象限的划分来看，左边代表着过去，右边代表将来，可见学生改变的动力非常小），而在沙盘完成以后，老师询问沙盘的意义，学生也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主动表达。整个沙盘也是以受伤的主题为主，基本没有出现治愈的主题。

## 2. 建立与加强关系阶段

学生熟悉沙盘游戏环境后，接着就是建立实施者与参与者之间信任接纳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学生的互动得以发展，学生的主动语言表达越来越多，微笑的次数和老师的目光交流也呈上升趋势。

下面我们比较代表性的第 9 次沙盘为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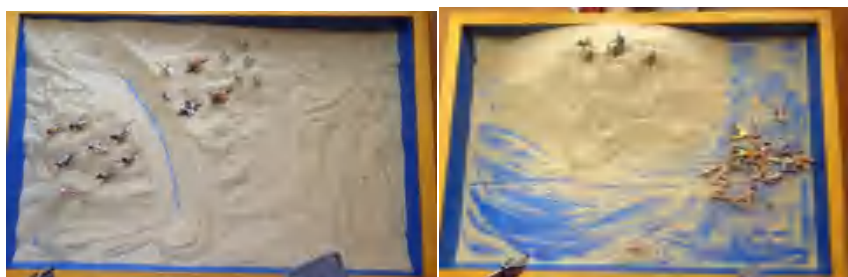


图 2. 保卫家园<sup>1</sup>

从上图可以看出：

	第 9 次沙盘（保卫家园）
日期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沙具种类	人、战斗武器、马、虚拟了沙尘暴
被动语言	11（老师问，学生回答关于沙盘摆放的描述）

<sup>1</sup> 图 2. 保卫家园

主动语言	15（主动的描述一些战斗过程、解释沙尘暴）
------	-----------------------

主题的名字从前面的“战争”等负性词语变成了保卫等正性词语。沙盘的面积划分虽然还是不平衡,但是学生已经选择了面积大的一方,而且是在沙盘的右边,代表未来的方向,说明学生内心改变现状的动力更强大。保卫家园的结果也不再是全部死亡,而是有三人幸存。

对于主题的分析:

受伤的主题(掩埋):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部分人还是被掩埋。

治愈主题(整齐):双方的兵马摆放都有共同的方向、目标。

治愈主题(动物):虽然只有少量的3匹马,但代表学生的内心出现了生命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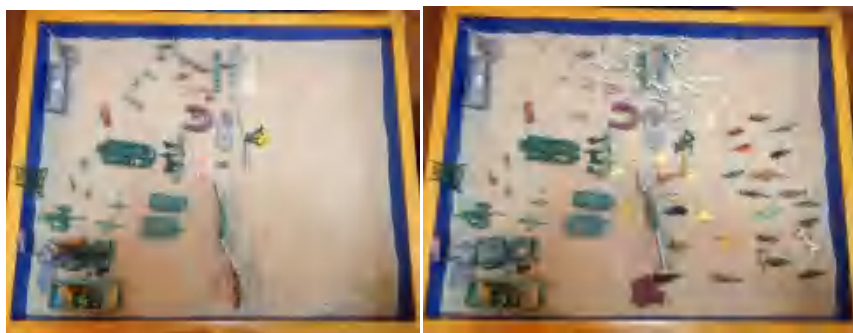
治愈主题(存活):结果是胜利了,而且动物和人都在。

关系建立沙盘:这个阶段学生一共历经了9次沙盘,中间也有出现反复的状况,这和学生的亚斯伯格问题相关,但是学生还是和老师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也达到了内心安全感的建立。学生在沙盘的描述上开始主动,有时候会主动来问老师的意见,摆放过程中会微笑,在改变和不确定的时候会主动的看老师的反应。

### 3. 治疗与问题转变阶段

治疗与问题转变阶段既是对个案沙盘游戏的深入发展,也是对治疗关系的进

一步发展。这一阶段学生的主动性增加,游戏中的创造性和社会互动性因素增多,富有生命力的物体数量会增多,杀戮会更少。学生也出现了勇于挑战过去、改变过去的想法。我们以第15次沙盘为例(见图三)



<sup>2</sup>图3 恐龙来了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

	第15次沙盘(恐龙来了)
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沙具种类	人、战斗武器、恐龙、鱼、蜥蜴
被动语言	7(老师问,学生回答)
主动语言	22(主动的描述游戏过程、询问老师的工作、主动讲妈妈的工作状况)

<sup>2</sup> 图3 恐龙来了



主题的名字基本成了一种描述状态的句子。而且,学生的领土不仅面积上比较大,而且拥有先进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游戏不再是人与人的斗争,变成了人与动物的战争,而且学生说这群恐龙中有很多都是自己人,是卧底。

基于主题的分析:

治愈主题(秩序):双方的沙具摆放具有秩序感,方向一致、摆放整齐。

治愈主题(医院):学生在自己的领土出现了医院,对受伤的人有了安置。

治愈主题(存活):战争结束,大部分的动物和人都活着。

治愈主题(生命力):沙盘中动物的数量增多,种类也增多,生命力明显增强。

治愈主题(支持性):学生运用了交通信号灯作为辅助性工具,有了外界支持性力量。

问题转变沙盘:从沙盘的摆放可以看出学生的内心力量是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在沙盘的创作之前,学生还讲述了妈妈的工作,这些都是主动的语言表达。

#### 4. 发展与结束阶段

经过 20 次的沙盘,学生的各方面都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最后一次课老师和学生进行了一学期的回顾,阅读了绘本《弗洛格回家了》,告知他本学期的课要结束了,祝愿他期末考出好成绩,而他也主动问老师过年的安排,可见与老师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了。

同时,学期即将结束,老师通过电话联系,从家长那里了解到小熠和父母的交流还是少,但是有时会主动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在妈妈面前,会去试着解释自己的一些行为的原因。在学校,与同学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也没有再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 五、讨论反思

#### (一) 小结

小熠在经历 20 次沙盘游戏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 沙盘作品中,沙具不断丰富、受伤的主题慢慢变少、治愈的主题不断涌现。

(2) 小熠在沙盘游戏室中与老师的互动

能力增强,总体的对话次数明显增加,主动对话的次数上升,被动对话的次数下降。

(3) 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小熠的状态都发生了改变。可见,经过沙盘游戏的辅导,小熠心理整合越来越好。同时,在对个案进行统计考察时,发现在沙具的种类表达的次数以及沙游主题这三个指标上,都随着沙盘游戏的进行呈好转的趋势。这些结果说明,沙盘游戏治疗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具有积极的辅导意义。

#### (二) 反思

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让老师反思的地方。

##### 1. 接纳的心态

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可以发现,建立关系历经了 6 次沙盘游戏,可见,建立关系对于这类孩子而言比较困难。在 20 次沙盘的过程中,学生也因为外界的因素出现过反复的状况,这就需要老师接纳孩子,帮助孩子解决困难,这样才能使双方的关系建立的更好。

##### 2. 训练的整合

虽然经过一学期的共同努力,学生的情况有了改善,但是特色和局限是相生的。学生的社交存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理解、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的问题。所以老师在干预的时候可以融入心智解读和心理理论的训练,综合性的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

##### 3. 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配合

慎老师积极协调各科老师和小熠的关系,也营造了一个比较融洽的班级环境,慎老师通过班会和团体心理辅导课引导班上的同学理解、接纳他。在学业上,不给他压力,尊重学生的特殊,提供合适的学科目标。

##### 4. 家庭的支持

小熠的现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父母、奶奶都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希望家长减轻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正视学生的问题,为学生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最重要的是让家长利用家庭生活与学生进行行为调控,比如共同扫地、共同洗碗等需要参照他人行为调控自己行为的活动,让学生在生活



养成等待、轮流和调控的能力。

#### 六、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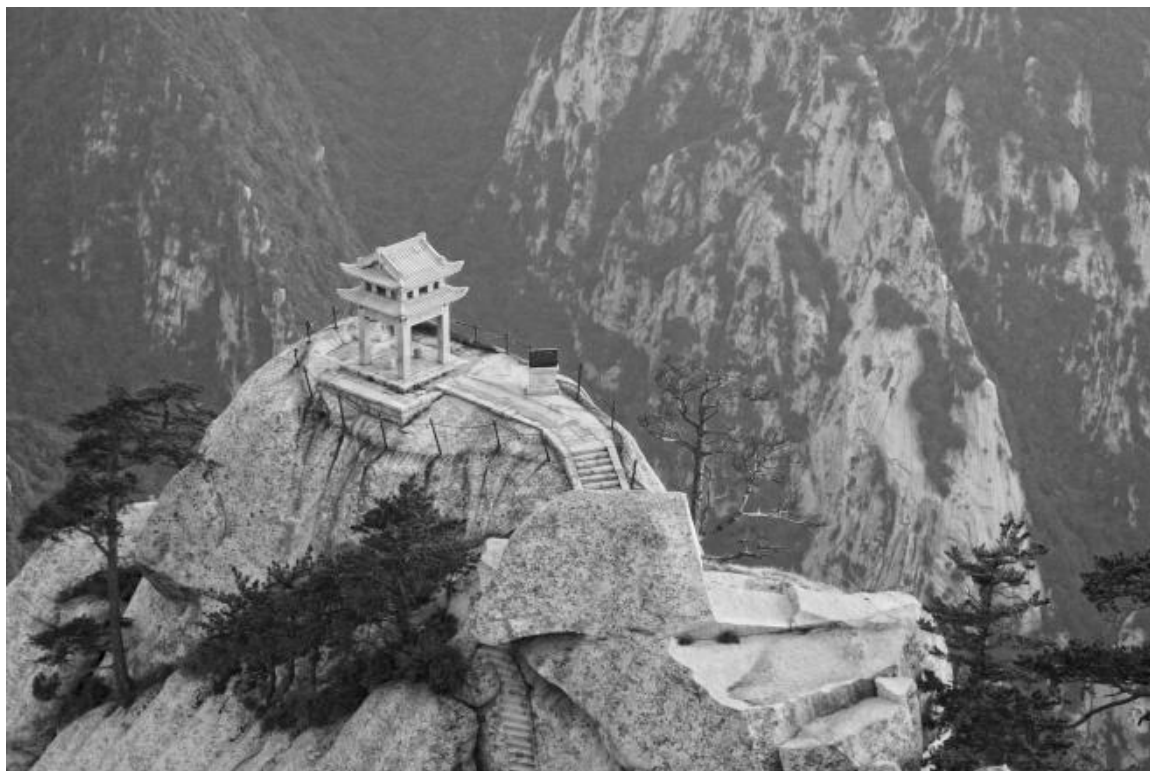
经过一学期的共同努力,学生的情况有了改善,但是特色和局限是相生的,沙盘游戏疗

法不能实现儿童所有的成长需要,未来的心理辅导中干预趋势必将是整合性的。对于特殊教育工作者、以及数以百万的家长来说,任重而道远。

#### 参考文献

- [1]李江雪, 申荷永. 沙盘游戏的形成与应用. 社会心理科学[J], 2005,20(1):180.
- [2] 范国平, 高岚, 李江雪. “沙盘游戏”的理论分析及其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03, 2:51 — 54
- [3]尤娜, 杨广学. 自闭症“地板时光”疗法:象征游戏和逻辑智慧[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 12:61 — 63.
- [4]孙敦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世界自闭症日”的讲话[EB]. 自闭症论坛, 2010-3-17.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犯罪青少年的形成因素及预测模型评估\*

徐淑慧

**摘 要:** 探究犯罪青少年的形成因素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及矫治青少年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意识的关系、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疏离感以及公正世界信念和法律意识的交互作用进行测评,并对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做预测分类模型,结果显示: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可有效解释其自我意识的形成,且与非犯罪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意识存在显著差异;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疏离感、公正世界信念及法律意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预测关系及交互作用;自我意识各维度和疏离感各维度可有效预测和解释犯罪和非犯罪青少年组别。因此,对青少年犯罪预防的关键在于家庭教育,重点在于发展青少年积极的自我意识与良好的亲社会关系。

**关键词:** 犯罪青少年 因素 预测模型 自我意识 疏离感

青少年犯罪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Hawkins & Weis, 1985),这一问题导致青少年个体发展受阻、家庭不幸福、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以探究青少年犯罪形成机制及预测模型有助于增强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教育与行为矫治。主流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父母的监管教育在预防和管理子女的反社会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Unnever, Cullen & Agnew)。后期相关研究也证实了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存在相关性(Hoeve, Dubas, Eichelsheim, Der Laan, Smeenk, & Gerris, 2009; Walters, 2019),其中父母的文化水平是预测青少年后期犯罪的一个重要因子(Walters, & Espelage, 2019)。对青少年犯罪形成机制的探究就是揭示青少年犯罪形成的最初原因,进而为初级预防犯罪提供策略。那么,父母作为个体成长的第一任教师便成为一个重要考察的因素。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从影响犯罪青少年形成的最初原因入手,一步步揭示犯罪青少年形成的个体、家庭、社会、价值观上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提出预测青少年犯罪的关键因素,即犯罪预测模型。

### 一、文献综述

(一) 青少年犯罪与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

研究表明,犯罪者的父母一般缺乏温暖、做事独裁、过于严苛以及使用不一致的教育方式,相对于非犯罪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多的表现为惩罚和低支持性,以及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欠和谐。对于男性来说,父母的低支持以及他对母亲的反对程度是预测其犯罪的独立因素(Baldry & Farrington, 2000)。家庭压力理论则认为,邻里的不利条件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被父母行为,如监督所影响(Conger, Ge, Jr, Lorenz & Simons, 1994)。更多的研究已证实,犯罪高发地带的青少年,其获得父母的支持与监督就越少(Furstenberg & Jr, 1993)。缺乏家庭情感支持、家庭教育惩罚标准不一致的青少年与家庭中人际关系融洽、教育惩罚标准一致的青少年相比,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有更多的犯罪行为(Henry, Tolan & Gormansmith, 2001)。也就是说,家庭始终可作为犯罪形成的初始因素。

赫希(1990)的一般犯罪论认为,低水平的自我控制是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并且,他进一步认为,自我控制的发展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整体来说,如果父母不能够正确监督他们的孩子、不能认识到孩子的反社会行为以及对孩子完全放任不管,则会养育出低自我控制力的孩子(Perrone, Sullivan, Pratt & Margaryan, 2004)。赫希认为,自我控制力水平在8岁左右就趋于稳定,那么父母

通讯作者: 徐淑慧, E-mail: miaowang90@wzu.edu.cn

对其形成影响的时间也是短暂的。换句话说,父母早期的养育方式会影响到孩子自我控制力水平的高低,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孩子犯罪的可能性。换言之,孩子自控力也就是形成于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方式中,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父母的何种养育方式会造成孩子的低自我控制力呢?一项研究揭示,相较于高自制力水平的母亲,低自制力水平的母亲更有可能采取无效的教养方式(Nofziger, 2008)。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技巧又会通过代际传递(Chen & Kaplan, 2001),从而导致几代人之间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那么,这对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来说,就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不幸的是,人们在一系列反社会特征,包括低自我控制中存在社会选择配对倾向(Boutwell & Beaver, 2010),也就是低自我控制力水平的个体在对伴侣的选择上更偏好低自制力水平的个体。这也就造成了犯罪的代际传播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则可能是家庭因素,比如教养方式的代际传播所造成的(Farrington, Coid & Murray, 2009)。除了自我控制外,研究也证明,低自尊和犯罪之间存在关系,且这种关系在男女两性上均适用(Donnellan, Trzesniewski, Robins, Moffit & Caspi, 2005)。赫希更是指出,低自我控制的个体往往比较冲动、自我中心主义、懒惰等,这些特质则会导致犯罪行为。一方面,低自我控制作为犯罪的个体性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低自我控制的特质,进一步会影响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建立。

### (二)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关系

研究已证实,在环境不佳的社区里,青少年犯罪率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率均很高(Ludwig, Duncan & Hirschfield, 2001),且认为邻里结构和社会特征通过家庭和同伴将风险传递给青少年,从而邻里结构和社会特征成为预测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子(Beyers, Bates, Pettit & Dodge, 2003)。社区社会关系对青少年会产生影响是确定的,社区的不利因素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等间接地与青少年犯罪有关(Chung &

Steinberg, 2006)。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会影响到青少年犯罪。赫希后期也试图从社会关系来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他认为个体与家庭、学校、以及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依恋程度可以预测其是否选择去犯罪(Brown & Jennings, 2014)。后期的一些研究亦通过个体与家庭、老师、同伴以及对法律和宗教的信仰来判断其社会联结状况(Bouffard & Rice, 2011)。尤其是,不利的社区环境和失序的社会组织与青少年拥有的反社会伙伴数量呈正相关(Ge, Brody, Conger, Simons & Murry, 2002)。相关研究验证了社会关系是犯罪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Brown & Jennings, 2014)。反过来,犯罪行为则会削弱社会纽带,导致犯罪行为的持续发生。先前的行为通过社会纽带与未来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Ford, 2005)。这些研究均说明,社会关系可以预测犯罪的发生率。那么,反过来,任何可能削弱社会关系的因素,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犯罪行为的发展变化。

### (三)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控制理论

赫希的社会控制论是当今犯罪学中引用率最高的理论之一。与早期的罪犯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控制论关注的是哪些因素抑制了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不是为什么一些人要去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社会关系发展良好的个体有更高的概率去遵循社会规范,反之,社会关系发展不佳的个体则更有可能偏离社会规范,做出违法行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会有四个社会纽带:与父母或者重要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认可并接纳主流社会价值观、参与传统社会活动以及拥有一种公正的世界信念观(Booth, Farrell & Varano, 2008)。也就是说,个体与社会的四个纽带关系是密切的、良性的,那么就可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具备各种适应社会的能力;反之,有可能被社会边缘化,走向犯罪的道路。

在社会控制论中,家庭对个体价值观的传递以及个体与父母之间的联结对其未来是否会犯罪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与父母的依恋、对

父母传统价值观的认可和内化可有效减少青少年与犯罪同龄人的联系以及犯罪行为的发生。关于家庭对犯罪的影响,目前学术界从家庭所能够生成的社会资本,比如家庭建立的社会关系所蕴含资源的跨代传递对个体人生轨迹的影响来分析对犯罪的作用。当家庭和社区内的社会资本枯竭时,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所以,家庭不再看成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通过父母,积极地引导青少年远离犯罪风险的动态社会资本系统(Wright, Cullen & Miller, 2001)。父母对孩子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以及创造和维持的情感联结,对孩子提供的亲社会行为指导,会改变青少年加入犯罪行为或犯罪团伙的可能性。在家庭投资中获益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与父母保持强烈的情感依恋、抱有亲社会信念、同样在学校中也表现良好,而这些均可削弱他们加入犯罪团伙的概率(Farrell & Banerjee, 1995)。增强个体与社会的依恋,以及让其接受传统规范并信任社会秩序具有公平性,可降低犯罪率(Laundra, Kiger & Bahr, 2002)。与对家庭依恋类似,对学校的依恋亦可降低青少年越轨行为(Dornbusch, Erickson, Laird & Wong, 2001)。这是因为对学校依恋程度较低,更有可能从事问题行为或更有机会与问题青少年进行接触(Jessor, Den Bos, Vanderryn & Costa, 1995; Hogue & Steinberg, 1995)。个体对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公正世界信念的获得,也是在与家庭和同伴的交互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青少年自我因素、家庭因素、青少年与社会的关系、青少年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态度探讨青少年犯罪的形成机制,以及构建青少年犯罪的预测模型。研究通过父母教养方式测评工具量化家庭因素的影响力、青少年自我意识测评工具量化青少年自身因素、疏离感量化犯罪青少年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法律意识量化犯罪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发展状况。通过相关理论及文献梳理和分

析,本研究推论,家庭因素可揭示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即自我控制、自我认知、自我体验的形成机制;而自我意识、人际疏离感、社会疏离感对犯罪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法律意识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具体提出以下几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家庭因素,即家庭教养方式对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对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对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假设二: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可显著预测其社会化程度,即自我意识有效预测其人际疏离感、社会疏离感、公正世界信念和法律意识。

假设三:人际疏离感和社会疏离感在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和世界公正信念及法律意识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四: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调控和疏离感的九个维度可有效区分犯罪青少年和非犯罪青少年,即这两个因素可作为预测青少年犯罪模型的主要因子。

### (二) 研究方法

#### 1. 研究数据来源及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数据通过分批采集所得。第一批数据包含两个群体,其中犯罪青少年群体是在山东省未成年人管教所通过随机选取两个监区,最后剔除无效样本后保留有效样本 403 名男性罪犯青少年,平均初次犯罪年龄为  $M=15.85$ ,  $SD=1.17$ ,调查时的年龄为  $M=19.71$ ,  $SD=2.54$ ,样本进监狱时候的文化程度为小学的人数有 134 名,占总调查人数的 33.3%,初中文化程度人数有 228 名,占总人数的 56.6%,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有 41 人,占总人数 10.2%。第二个群体为非犯罪青少年,从某中学随机选取 270 名男性高中生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M=18.42$ ,  $SD=0.54$ ,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数据样本 256 个。

第二批数据是在山东省未成年人管教所通过随机选取两个监区,最后剔除无效样本后保留 300 名男性罪犯青少年,平均初次犯罪年

龄为  $M=15.89$ ,  $SD=0.93$ , 调查时的年龄为  $M=19.27$ ,  $SD=2.17$ , 其中进监狱时候的文化程度为小学的人数有 78 名, 占总调查人数的 26%, 初中的人数有 184 名, 占总人数的 61.3%, 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有 38 人, 占总人数 12.7%。

第三批数据包含两个群体, 其中一个群体依然是犯罪青少年, 另一群体是与犯罪青少年同个年龄阶段的非犯罪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用的是第二批施测的样本, 非犯罪青少年是在山东省某中学随机选取 5 个班级进行施测, 剔除无效数据后保留 236 个样本, 平均年龄为  $M=16.11$ ,  $SD=1.15$ 。

对罪犯青少年和青少年学生进行调查均得到了相关机构(未成年人管教所和学校)及本人的知情同意。三个批次数据的收集均采用团体纸笔施测法, 犯罪青少年由未管所具有心理测评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于未管所大教室共同施测, 并由两名狱警进行秩序的维护与管理; 中学生则由班主任和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于班级内进行施测。

## 2.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调查青少年罪犯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 预期证明原生家庭对青少年自我意识形成的影响程度, 以及通过将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进行对比, 预证明二者在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意识变量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研究基础上, 探究青少年罪犯自我意识对其社会化程度的影响, 社会化主要从罪犯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认可、对主流价值观, 如公正信念及法律意识方面进行量化; 以及探究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第三部分研究内容则基于前两部分的研究, 建立青少年犯罪的预测模型, 以期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实证支持。

## 3. 研究工具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戴晓阳, 2010)由 Carlo Perris (1986) 等人编制, 岳冬梅等人进行了修订。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 通过被试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回忆来进行作答。量表共 115

个条目, 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六个维度: 情感温暖、理解,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 偏爱被试, 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 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五个维度: 情感温暖、理解,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过度保护, 偏爱被试, 拒绝、否认。量表采用四点评分方法,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本次研究父亲总量表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3, 母亲总量表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7。

青少年自我意识量表: 采用由聂衍刚等人编制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量表》(聂衍刚, 张卫, 彭以松, 2007)。该量表共 67 个项目, 包含九个因素, 分别为体貌自我、社交自我、品德自我、学习自我、焦虑感、满足感、自觉性、自制力和监控性。其中体貌自我、社交自我和品德自我三个因素属于自我认识方面; 学习自我、焦虑感、满足感三个因素属于自我体验; 自觉性、自制力和监控性三个因素属于自我控制方面。各个因素的得分为所包含的项目得分直接相加, 得分高的表明该因素评价好, 总分得分高表明个体自我意识水平高。总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2, 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在 0.64 至 0.84 之间; 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90, 各分量表的分半信度在 0.64 至 0.81 之间。总量表的稳定性系数为 0.79, 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58 至 0.79 之间, 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二阶九因子模型的 CFA 拟合指数为  $\chi^2=3784.5$ ,  $df=2108$ ,  $\chi^2/df=1.79$ ,  $NFI=0.92$ ,  $CFI=0.92$ ,  $RMSEA=0.053$ , 这表明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次研究犯罪青少年样本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6, 非犯罪青少年样本数据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4。

青少年疏离感量表: 采用由杨东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量表以 Jessor & Jessor S (1977) 的疏离感量表作为效标, 结果显示相关程度在中等以上, 相关系数达显著水平。量表分为一阶因素和二阶因素。二阶因素包括三个因素, 分别是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 量表采用 7 点计分法, 每

个维度的均分大于 4, 表明具有较高度度的疏离感。这九个维度又构成了量表的一阶因素。本次研究该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alpha$ ) 犯罪青少年的为 0.91, 非犯罪青少年为 0.96。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由杜建政、祝振兵和李兴琨于 2008 年编制的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该量表共 19 个项目, 包含三个因子, 分别是: 终极公正因子、内在不公正因子和内在公正因子。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总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1, 三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终极公正系数为 0.78、内在不公正系数为 0.67、内在公正系数为 0.64。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数  $\chi^2=292.661$ ,  $df=149$ ,  $\chi^2/df=1.964$ ,  $GFI=0.906$ ,  $RMR=0.054$ ,  $RMSEA=0.058$ ,  $IFI=0.863$ ,  $TLI=0.839$ 。本次研究的总量表 (Cronbach'  $\alpha$ ) 系数为 0.69, 终极公正因子为 0.82、内在不公正因子为 0.66、内在公正因子为 0.61。

法律意识测评量表: 法律意识问卷包含 18 个项目的, 每个项目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4, 内容涉及对法律的认知、评价、情感和

法律价值判断。总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一致性系数为 0.70; 6 个月后重测信度 Cronbach  $\alpha$  值为 0.72, 表明量表信度较好; 量表的  $\chi^2/df$  的值为 1.46, RMSEA 的值为 0.04, GFI 的值为 0.92, CFI 的值为 0.90, AGFI 的值为 0.89, IFI 的值为 0.90。

#### 四、研究结果

##### (一) 教养方式对自我意识的预测回归分析

从表 1 可得, 在回归模型中, 对“自我认知”校标变量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认知的解释率达 14.8%; 对“自我体验”校标变量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严厉惩罚”、“母亲情感温暖”, 其中“父亲严厉惩罚”为负向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体验的解释率达 21.2%; 对“自我调控”校标变量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为“母亲拒绝否认”, 且为负向预测,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调控的解释率达 20.6%; 对“自我意识”校标变量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拒绝否认”,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意识解释率为 23.3%。

表 1 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自我意识各维度的复回归分析摘要表

预测变量	方程 1 (自我认知)		方程 2 (自我体验)		方程 3 (自我调控)		自我意识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父情感温暖理解	.294	2.798**	.258	2.553*	.121	1.193	.251	2.520*
父严厉惩罚	.005	.05	-.233	-2.490*	-.093	-.997	-.131	-1.421
父过分干涉	-.103	-.991	.027	.271	.147	1.461	.039	.398
父偏爱被试	-.152	-1.394	-.023	-.216	-.082	-.778	-.104	-.990
父拒绝否认	.023	.208	.111	1.014	-.020	-.189	.054	.497
父过度保护	.002	.018	-.027	-.262	.032	.315	-.001	-.010
母情感温暖	.099	.682	.338	2.414*	.246	1.745	.261	1.877
母拒绝否认	-.239	-1.706	-.128	-.902	-.443	-3.278***	-.358	-2.550*
母惩罚严厉	-.020	-.149	-.023	-.180	.103	.801	.037	.292
母偏爱被试	.035	.286	-.056	-.470	-.070	-.602	-.038	-.323

母过度保护		.165	1.082	-.085	-.575	.026	.174	.055	.371
回归模型	F	3.496***		5.414***		5.207***		6.053***	
摘要	R <sup>2</sup>	.148		.212		.206		.233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二）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在自我意识和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差异检验

将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各个因子及其总分与普通非犯罪青少年人群进行比较,发现除了体貌自我、自觉性和自制力三个因子外,其他因子均有显著性差异。且未犯罪青少年群体的自我意识各个因子得分及总分均显著低于普通非犯罪青少年群体。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各因子与非犯罪青少年的比较 (M±SD)

自我意识因子	犯罪青少年	非犯罪青少年	t
体貌自我	19.22±3.12	19.44±3.43	-0.56
社交自我	24.59±4.77	28.41±4.90	-6.56***
品德自我	16.91±4.47	18.31±4.14	-2.63**
学习自我	28.99±5.88	33.05±6.72	-5.54***
焦虑感	13.59±3.23	14.98±4.33	-2.83**
满意感	19.53±3.53	21.35±4.69	-3.39***
自觉性	28.38±5.51	29.03±6.49	-0.95
自制力	32.50±6.23	32.66±6.61	-0.28
监控性	29.63±4.82	34.00±6.44	-5.85***
自我认识	60.82±9.23	66.29±9.54	-4.84***
自我体验	62.09±8.77	69.48±12.42	-5.15***
自我控制	90.54±11.75	95.96±14.43	-3.16**
自我意识总分	213.60±25.16	232.08±31.93	-5.55***

对犯罪青少年和非犯罪青少年父亲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六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因子情感温暖理解上,非犯罪青少年得分高于犯罪青少年,且差异显著;在因子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上,犯罪青少年得分高于非犯罪青少年,且差异显著;在因子偏爱被试和过度保护上差异不显著。(详见表 3)

对犯罪青少年和非犯罪青少年母亲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理解、过度保护过度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偏爱被试五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因子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非犯罪青少年得分高于犯罪青少年,且差异显著;在因子惩罚严厉维度上,犯罪青少年得分高于非犯罪青少年,且差异显著。因子过度保护过度干涉、因子拒绝否认和因子偏爱被试上无显著差异。(详见表 4)

表 3 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 (父) 各维度差异比较 (M±SD)

	情感温暖理解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	偏爱被试	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
犯罪青少年	46.83±11.31	25.12±9.14	23.76 ± 5.04	10.68±3.53	12.40±4.79	13.52±3.42
非犯罪	53.68±11.46	19.18±6.98	21.41 ±	19.18±6.98	10.14±4.03	13.94±3.67

青少年			5.66			
<i>t</i>	-3.67***	4.39***	2.76**	1.76	3.31***	-0.77

表4 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母)各维度差异比较(M±SD)

变量	情感温暖理解	过度保护干涉	拒绝否认	惩罚严厉	偏爱被试
犯罪青少年	49.12±12.04	39.11±8.30	15.82±5.42	16.13±6.42	10.72±3.49
非犯罪青少年	55.52±11.58	37.73±8.83	14.52±5.46	12.95±4.66	9.19±5.77
<i>t</i>	-2.98**	0.96	1.54	3.53**	1.88

(三)自我意识、社会疏离、公正世界信念、法律意识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理论及假设,以自我意识各维度为自变量,疏离感为因变量做逐步多元回归;以自我意识各维度、疏离感各维度为自变量,公正世界信念为因变量做逐步多元回归;以自我意识各维度、疏离感各维度、公正世界信念为自变量,法律意识为因变量做逐步多元回归。具体表现为表5的三个方程。由表5方程1可知,自我意识三个维度进入回归方程模型中的只有自我体验,判定系数为0.084,故可

有效负向解释“疏离感”8.4%的变异量;由方程2可知,进入回归模型中的预测变量有三个,根据 $\beta$ 值及判定系数可知,三个维度可有效负向解释“公正世界信念”16.403%;由方程3可知,进入回归模型中的预测变量有四个,其中“无意义感”、“自然疏离感” $\beta$ 系数为负,故对“法律意识”的影响为负,“公正世界信念”、“自我控制”指标的 $\beta$ 系数为正,故为正向影响,根据判定系数可得,四个预测变量对“法律意识”的解释率达18.8%。

表5 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各维度、公正世界信念、疏离感各维度、法律意识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预测变量	方程1 (疏离感)		方程2 (公正世界信念)		方程3 (法律意识)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自我体验	-.290	-5.019***				
孤独感			-.167	-2.184*	-.174	-2.618**
无意义感			-.184	-2.711**		
自我疏离感			-.151	-2.319*		
自然疏离感					-.172	-2.797**
公正信念					.146	2.800*
自我控制					.146	2.500*
回归模型摘要	F 值	25.187***	16.403***		15.182***	
	R <sup>2</sup>	0.084	0.156		0.188	



为关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相关理论提出理论模型图,并绘制因果模型图,由图 1 可知模型图包含三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第一个复回归分析模型以自我意识为自变量,总疏离感为因变量;第二个复回归模型以自我意

识、疏离感为自变量,以公正世界信念为因变量;第三个复回归分析模型以自我意识、疏离感和公正世界信念为自变量,以法律意识为因变量。采取强迫进入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三个复回归分析结果摘要表

预测变量		方程 1 (疏离感)		方程 2 (公正世界信念)		方程 3 (法律意识)	
		β	t 值	β	t 值	β	t 值
自我意识		-.289	-5.001***	.043	.726	.144	2.459*
疏离感				-.360	-6.079***	-.249	-3.966***
公正世界信念						.163	2.681**
回归模型摘要	F 值	25.013***		21.923***		17.716***	
	R <sup>2</sup>	0.084		0.141		0.158	

将上述路径分析的路径系数及相关统计量填入理论模型图中,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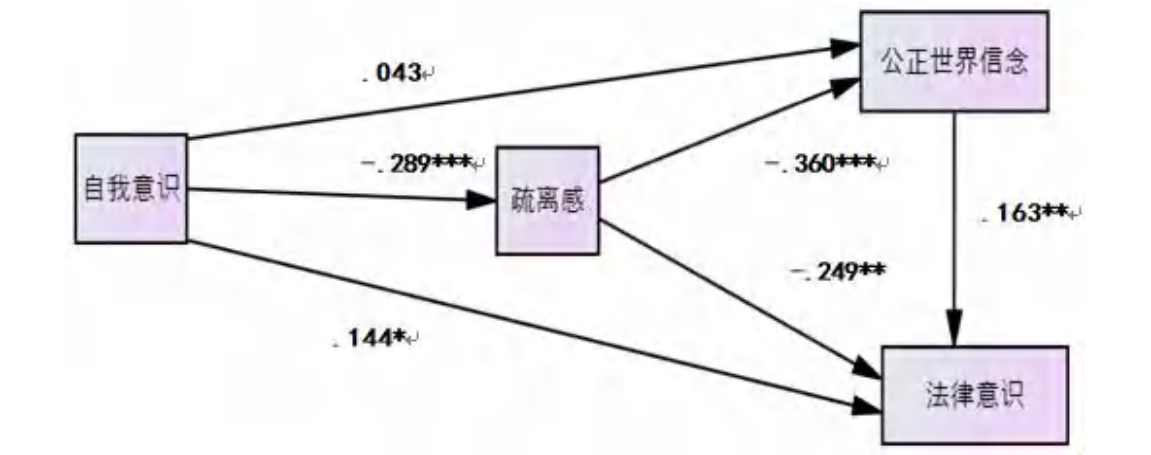


图 1 自我意识、疏离感、公正世界信念及法律意识路径分析图

依据变量间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得知各外因变量对内因变量的直接效果值:“自我意识”对“公正世界信念”,“法律意识”和“疏离感”三个内因变量的标准化直接效果值分别为 0.043, 0.144, -0.289;“疏离感”对“公正世界信念”和“法律意识”两个内因变量的直接效果值分别为-0.360, -0.249;“公正世

界信念”对“法律意识”内因变量的直接效果值为 0.163。路径分析模型中的五条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达 0.05 的显著水平。

间接效果情况:“自我意识”对“公正世界信念”变量的间接效果值等于-0.289×-0.36=0.104;“自我意识”对“法律意识”变量的间接效果值等于-0.289×-0.249=0.072;

“疏离感”对“法律意识”变量的间接效果值等于 $-0.36 \times 0.163 = -0.059$ 。根据基本原则：直接效果 $>$ 间接效果，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直接效果 $<$ 间接效果，表示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故，疏离感并不是自我意识影响公正世界信念和法律意识的关键因素；公正世界信念对疏离感与法律意识具有中介效应，所以，公正世界信念是疏离感影响法律意识的关键因素。

（四）两组被试的逻辑斯分析模型

从表 7 可知，投入模型中的自我意识三个维度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与青少年疏离感的九个维度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孤独感、自然疏离感、亲人疏离感、生活环境疏离感、社会孤立感、压迫疏离感、不可控制感共十二个自变量对犯罪青少年和非犯罪青少年组别预测的回归模型的整体模型显著性检

验的  $\chi^2=196.407$ （ $p=0.000<0.001$ ），达到 0.001 显著水平；而 Hosmer-Lemeshow 检验值 $=6.636$ （ $p>0.05$ ）未达显著水平，表示自我意识和疏离感十二个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适配度非常理想。从关联强度系数而言，Cox-Snell  $R^2=.327$ ，Nagelkerke  $R^2=.438$ ，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呈中等强度的关联，十二个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犯罪变量总变异的 32.7%，43.8%。

再从个别参数的显著性指标来看，自我体验、自我疏离感、孤独感、自然疏离感四个自变量的 Wals 值分别为 40.207、25.448、8.867、7.597，均达 0.05 显著水平，表示这四个自变量与青少年犯罪与否组别间有显著关联，这四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与解释犯罪和非犯罪青少年组别。

表 7 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检验及个别参数显著性的检验摘要表

投入的变量名称	B	S.E.	Wals 值	Df	关联强度
自我认知	-.119	.108	1.231	1	Cox-Snell $R^2=$ .327
自我体验	-.793	.125	40.207***	1	
自我控制	.217	.119	3.318	1	Nagelkerke $R^2$ =.438
无意义感	.023	.185	.016	1	
自我疏离感	-.723	.143	25.448***	1	
孤独感	-.529	.178	8.867**	1	
自然疏离感	.363	.132	7.597**	1	
亲人疏离感	.030	.105	.079	1	
生活环境疏离感	-.148	.116	2.433	1	
社会孤立感	.314	.167	3.543	1	
压迫疏离感	-.070	.132	.284	1	
不可控制感	.148	.144	1.061	1	

常量	9.223	1.402	43.265	1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卡方 =196.407*** Hosmer-Lemeshow 检验值 =6.636 n. s.				

注：\*p<0.05, \*\*p<0.01, \*\*\*p<0.001n. s. p>0.05

从表 8 预测分类正确率交叉表来看,原来 220 名非犯罪青少年的观测值根据逻辑斯回归模型进行分类预测,有 146 名被归类为非犯罪青少年(分类正确)、74 名被归类为犯罪青少年(归类错误);原先 275 名犯罪青少年的

观测值根据逻辑斯回归模型进行分类预测,有 233 名被归类为犯罪青少年组(分类正确)、42 名被归类为非犯罪青少年组(分类错误)。整体分类正确的百分比为(146+233)÷495=76.5%。

表 8 预测分类正确率交叉表

群体类型		预测值		正确百分比
		非犯罪青少年	犯罪青少年	
实际值	非犯罪青少年	146	74	66.4
	犯罪青少年	42	233	84.7
总预测正确率				76.5

五、讨论分析与结论

(一) 讨论分析

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犯罪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解释率达 14.8,也就是说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是犯罪青少年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因素。究其缘由,可能是本研究犯罪青少年的样本全部为男性,故对同为男性的父亲有着更高的认同性。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母亲的情感温暖均可显著正向预测犯罪青少年的自我体验,父亲的严厉惩罚显著负向预测犯罪青少年的自我体验。自我体验属于情感体验,故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其有着显著积极影响,父亲的严厉惩罚则有着负面影响,这一点也是可以用性别差异来解释。关于自我调控,则仅有拒绝否认对犯罪青少年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提及,自我控制形成于儿童早期,在

早期的亲子关系中,母亲的位置非常重要,不管是从相处时间方面还是实际情况中,母亲均作为主要的养育者,故母亲的拒绝否认会显著预测其自我调控力。整体上来说,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母亲的拒绝否认可显著预测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水平。从侧面反映出了犯罪青少年对父母情感支持与接纳理解的渴求。

通过与非犯罪青少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大多维度显著低于非犯罪青少年。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可揭示犯罪青少年的自身因素,即自我意识发展不良,成为其犯罪的关键个体因素。进一步比较两个群体的父母教养方式,结果显示犯罪青少年父母较非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更缺乏情感支持、更为严厉、有着过多的拒绝否认。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可显著预测犯罪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两个群体的自

我意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显著差异更是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作用。假设一得证。

本研究通过测量犯罪青少年疏离感来评价其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并用公正世界信念和法律意识评价其主流价值观。结果显示,自我体验对疏离感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疏离感中的孤独感、无意义感和自我疏离感对公正世界信念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自我控制、公正世界信念及疏离感中的若干维度对犯罪青少年法律意识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也就是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得出犯罪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体验对其人际和社会关系具有预测作用,而自我意识和疏离感对世界公正信念具有预测作用,最后自我意识、疏离感和公正世界信念共同对其法律意识具有预测作用。通过路径分析图可进一步观察到自我意识、疏离感、公正世界信念与法律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至此,假设二、假设三得证。简言之,也就是犯罪青少年形成是在家庭、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作用下,导致其法律意识低下,最后违背刑法成为了一名罪犯。在整个过程中,家庭具有基础性的影响作用,由于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导致其自我意识水平发展低下,低自我意识又影响到其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在与其他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对主流价值观不予认可与接纳,最终触犯主流价值文化的代表——法律,成为了一名犯罪青少年。

最后的一个研究则基于前面的研究,利用自我意识三个维度和疏离感九个维度建立一个区分犯罪青少年与非犯罪青少年的预测模型,模型的分类正确率可达 76.5%,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区分能力。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自我意识与疏离感可作为预测青少年犯罪的关键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疏离感的影响因子分析,可揭示青少年犯罪形成的内部机制。

在解释本研究的结果时,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各个变量是基于犯罪青少年和非犯罪青少年的自我报告,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数

据的客观性。那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后期可采用其他渠道的信息来源,比如对青少年父母和朋友的测评收集数据,还可以从邻居或社区人员的观察取得相关数据,从而保证数据来源的多样化,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相互印证,便可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国内女性犯罪青少年总体样本人数少,且是关押在女子监狱内,本研究犯罪青少年的样本全部为男性。那么对青少年犯罪形成机制的探究以及最后建立的预测模型是否适合于女性犯罪青少年?也就是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后期可增加女性样本,并检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第三个问题就是,本次研究的数据依然是横断数据,故不能进行时间序列检验。比如目前测量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基于理论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比较稳定或者是随着教养方式的改变会导致对等关系发生变化(Patterson, Dishion & Yoerger, 2000),但事实上,我们基于家庭对青少年自我意识形成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其他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故,未来研究对纵向数据的收集依然很有必要。

## (二) 结论

尽管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果整合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文化因素阐释了青少年犯罪的形成机制,并对之前的犯罪学理论予以验证。研究结果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形成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不良所导致的人格方面的缺陷,即自我意识发展低下。自我意识发展低下又持续影响了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进而间接导致青少年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拒斥,从而最后导致自我意识发展扭曲,形成了犯罪倾向的人格特质。最终本研究基于前面的研究提出了预测青少年犯罪的结构模型,即可通过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和疏离感来判断其犯罪倾向性。这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即通过促使个体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帮助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 参考文献

- 戴晓阳. (2010)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 人民军医出版社, 167, 193, 318.
- 聂衍刚, 张卫, 彭以松, 等. (2007). 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功能结构及测评的研究. *心理科学*, 30(02), 411-414.
- Arrindell, W. A., Perris, C., Eisemann, M., Perris, H., Jan, V. D. E., & Ross, M., et al. (1986). Cross-national generalizability of patterns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variance of embu 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healthy subjects from australia, denmark, hungary,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1), 103-112.
- Baldry, A. C., & Farrington, D. P. (2000). Bullies and Delinqu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ental Styles.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0(1), 17-31.
- Beyers, J. M., Bates, J. E., Pettit, G. S., & Dodge, K. A. (2003). Neighborhood Structure, Parenting Proces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s'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53.
- Booth, J. A., Farrell, A., & Varano, S. P. (2008). Social Control, Serious Delinquency, and Risky Behavior: A Gendered Analysis. *Crime & Delinquency*, 54(3), 423-456.
- Bouffard, J. A., & Rice, S. K. (2011).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Bond on Self-control at the Moment of Decision: Testing Hirschi's Redefinition of Self-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6(2), 138-157.
- Boutwell, B. B., & Beaver, K. M. (2010).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ow Self-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7(2), 174-209.
- Brown, W., & Jennings, W. G. (2014). A replication and an honor-based extension of hirschi'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control theory and crime and analogous behaviors. *Deviant Behavior*, 35(4), 297-310.
- Brown, W., & Jennings, W. G. (2014). A replication and an honor-based extension of hirschi'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control theory and crime and analogous behaviors. *Deviant Behavior*, 35(4), 297-310.
- Chen, Z., & Kaplan, H. B. (200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nstructive Parent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1), 17-31.
- Chung, H. L., & Steinberg, L. (2006). Relations between neighborhood factors, parenting behaviors, peer deviance, and delinquency among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2), 319-331.
- Conger, R. D., Ge, X., Jr, G. H. E., Lorenz, F. O., & Simons, R. L. (1994). Economic stress,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and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5(2), 541-561.
- Delvecchio, E., Mabilia, D., Lis, A., Mazzeschi, C., Nie, Y., & Li, J. B. (2014). From china to italy: validation of the adolescent self-consciousness questionnair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1(1), 120-128.
- Donnellan, M. B., Trzesniewski, K. H., Robins, R. W., Moffitt, T. E., & Caspi, A. (2005). Low Self-Esteem Is Related to Aggression,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linquen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4), 328-335.
- Dornbusch, S. M., Erickson, K. G., Laird, J., & Wong, C. A. (2001). The Rel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to Adolescent Deviance in Diverse Groups an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6(4), 396-422.
- Farrell, M. P., & Banerjee, B. S. (1995). Family cohesion as a buffer against the effects of problem-drinking father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eviant behavior, and heavy drinking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6(4), 377-385.
- Farrington, D. P., Coid, J. W., & Murray, J. (2009). Family factor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offending.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19(2), 109-124.
- Ford, J. A. (2005). Substance Use, the Social Bond, and Delinquency\*. *Sociological Inquiry*, 75(1), 109-128.
- Furstenberg, F. F., Jr. (1993). *How families manage risk and opportunity in dangerous neighborhoods*. In W. J. Wilson (Ed.),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agenda* (pp. 231 - 258). Newbury Park, CA: Sage.
- Ge, X., Brody, G. H., Conger, R. D., Simons, R. L., & Murry, M. B. (2002).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 of pubertal transition effects o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mong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1), 42-54.

- Hawkins, J. D., & Weis, J. G. (1985).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elinquency prevention.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6(2), 73-97.
- Henry, D. B., Tolan, P. H., & Gormansmith, D. (2001). Longitudinal family and peer group effects on violence and nonviolent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30(2), 172-186.
- Hoeve, M., Dubas, J. S., Eichelsheim, V. I., Der Laan, P. H., Smeenk, W. H., & Gerris, J.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Delinquenc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7(6), 749-775.
- Hogue, A., & Steinberg, L. (1995). Homophily of internalized distress in adolescent peer grou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6), 897-906.
- Jessor, R., & Jessor, S. L. (1977). Problem behavior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th.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7(6), 948-949.
- Jessor, R., Den Bos, J. V., Vanderryn, J., & Costa, F. M. (1995). Protective factors i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Moderator effects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6), 923-933.
- Laundra, K. H., Kiger, G., & Bahr, S. J. (2002). A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of Serious Delinquency: Exam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22(4), 389-407.
- Ludwig, J., Duncan, G. J., & Hirschfield, P. J. (2001). Urban Poverty and Juvenile Crim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Housing-Mobility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2), 655-679.
- Nofziger, S. (2008). The “Cause” of Low Self-Control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Self-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5(2), 191-224.
- Patterson, G. R., Dishion, T. J., & Yoerger, K. (2000). Adolescent Growth in New Forms of Problem Behavior: Macro- and Micro-Peer Dynamics. *Prevention Science*, 1(1), 3-13.
- Perrone, D., Sullivan, C. J., Pratt, T. C., & Margaryan, S. (2004). Parental Efficacy, Self-Control,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Y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8(3), 298-312.
- Unnever, J. D., Cullen, F. T., & Agnew, R. (2006). Why is “Bad” Parenting Criminogenic? Implications From Rival Theories.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4(1), 3-33.
- Walters, G. D. (2019). Mothers and Fathers, Sons and Daughters: Parental Knowledge and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Predictors of Delinquency in Same- and Cross-Sex Parent-Child Dyad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7), 1850-1861.
- Walters, G. D., & Espelage, D. L. (2019).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Subsequent Delinquency: A Regression-Based Analysis of Early Adolescent Schoolchildren.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9(5), 669-688.
- Wright, J. P., Cullen, F. T., & Miller, J. T. (2001).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delinquent involvement.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9(1), 1-9.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对暴力风险罪犯的影响

胡宗南 倪金荣 张友良 史金芳\*  
(浙江省长湖监狱, 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目的:** 探讨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对暴力风险罪犯的影响。**方法:** 将监狱 100 名暴力风险罪犯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50 名。干预组参与八周认识团辅课程, 对照组不参与。干预前、后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心理年龄自评表进行评估和比较。**结果:** 干预组罪犯后测较前测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其它 (睡眠、饮食) 症状显著改善, 危险性评估暴力风险普遍降低, 狱内违规事件明显减少, 心理年龄显著提升。**结论:**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能有效改善暴力风险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 减少暴力风险和狱内违规事件, 提升心理年龄, 可进一步应用规范。

**【关键词】** 认识领悟疗法 暴力风险罪犯 心理健康 心理年龄

在监狱, 暴力、自杀、脱逃是罪犯最主要的三大危险因素。暴力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会对罪犯、民警的心理、躯体甚至生命造成侵害行为的风险。狱内暴力可分为心理暴力和躯体暴力两种形式。以人格侮辱为代表的心理暴力和以打架斗殴为代表的躯体暴力是古今中外监狱都面临的共性问题。<sup>[1]</sup>近年来, 狱内暴力事件在监狱违规事件比例中居首, 严重扰乱了正常监管改造秩序, 损害了监狱形象, 也对罪犯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2002 年,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暴力犯罪的第一份全世界范围调查报告指出: 暴力不可避免, 但可以通过一些工作来锁定、减少和预防暴力。<sup>[2]</sup>关注、研究狱内暴力, 评估、预测暴力风险一直在我国各地开展。但是, 当前很多监狱仅仅停留在评估预测阶段, 对于高度暴力风险罪犯除了事后给予高度戒备关押等惩罚外, 往往并无科学、合理、有效的矫治能力。《黄帝内经》载: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所谓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法于自然之道, 故而, 在实践中研究出针对暴力危险罪犯的项目化矫治方法不仅迫在眉睫, 而且意义重大。

认识领悟疗法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心理治疗专家钟友彬先生和他的小组创立的。他

们将心理分析和心理动力学原理与中国人心理特点结合起来创立了这一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所以, 认识领悟疗法又被称为中国式心理分析。国内同行也有人称之为“钟氏领悟疗法”<sup>[3,4]</sup>。实践证明认识领悟疗法的主要适应症是各类心理问题、神经症、性心理障碍、进食障碍、习惯和冲动控制障碍等<sup>[4]</sup>。以往认识领悟疗法应用于罪犯也时有报导<sup>[6,7]</sup>, 但这一疗法针对暴力风险罪犯是否有效, 尚无文献报导。本项目基于认识领悟疗法为背景和框架, 进行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实证研究, 并以心理健康自评量表 (SCL-90) 等作为工具, 探究对暴力风险罪犯的影响。

###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浙江省某监狱危险性评估筛选中的具有暴力中度、高度或极高度风险的罪犯 100 名, 随机选择 50 名为干预组、50 名为对照组。

#### 1.2 一般情况:

1.2.1 性别: 均为男性。

1.2.2 刑期: 干预组罪犯无期徒刑 5 人, 20 年以上 6 人, 10 年以上 26 人, 10 年以下 13 人; 对照组罪犯无期徒刑 3 人, 20 年以上 6 人, 10 年以上 27 人, 10 年以下 14 人。将无期徒刑换算成法定最低服刑年限 27 年后, 干预组服刑年限为  $15.21 \pm 8.06$ , 对照组服刑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系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2019 年重点工作项目, 并于 2021 年纳入到科技部司法专项课题“循证矫正策略推荐技术与装备研究”衍生项目。通讯作者: 史金芳, 邮箱: 21132259@qq.com。

年限为  $14.96 \pm 7.46$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1.2.3 罪名：干预组故意杀人罪 19 名，抢劫罪 11 人，故意伤害罪 6 人，聚众斗殴罪 6 人，诈骗罪 4 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4 人；对照组故意杀人罪 16 名，抢劫罪 9 人，聚众斗殴罪 8 人，故意伤害罪 6 人，诈骗罪 3 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3 人，盗窃罪 2 人，寻衅滋事 1 人，强奸 1 人。

1.2.4 年龄：干预组罪犯年龄 24~63 岁，平均  $37.80 \pm 8.78$  岁；对照组罪犯年龄 23~59 岁，平均  $38.06 \pm 10.45$  岁。两组无统计学

差异。

1.2.5 婚姻：干预组已婚 15 人，未婚 25 人，丧偶 5 人，离婚 5 人；对照组已婚 20 人，未婚 18 人，丧偶 6 人，离婚 6 人。

1.2.6 文化：干预组文盲 5 人，小学 11 人，初中 25 人，高中或中专 8 人，大学 1 人；对照组文盲 3 人，小学 20 人，初中 22 人，高中或中专 5 人。文化程度折合成受教育年限，干预组为  $8.14 \pm 3.76$ ，对照组为  $7.65 \pm 3.49$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表 1、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课程安排表

周数主题	必选内容	备选内容	结束内容	日常作业
入组访谈	互相介绍、导入成长史、介绍项目背景、意愿、期待、契约	查询档案、危评报告单	与管教民警沟通补充资料	填写入组访谈表，并前测
第一周：觉察	(1) 互相认识；(2) 年龄止语排队；(3) 四个年龄；(4) 保密仪式；(5) 觉察练习。	分享感受、幼年印象最深的事	总结、解释	自由联想式、创伤经历
第二周：防御	(1) 作业分享；(2) 心理年龄测评；(3) 防御机制说明。	温习正念数息和觉察、讲述 16 字精髓	掉坑、了解应对模式，与内在小孩和未来我对话。	自由联想式、后期感悟)
第三周：认识	(1) 心理年龄测试评分和反馈；(2) 温习觉察；(3) 适应观点；(4) 唤醒少年。	性心理的个体发展	回家、辅导情感卷入成员	撰写感悟日记
第四周：检验	(1) 温习觉察；(2) 回忆儿时爱称，回到童年；(3) 写成长缺点并交流；(4) 成员检验写优点，并交流，启动检验鉴定。	房树人测试、草绳故事、言行不一游戏、大小我沙具	走在街上练习，孩子遇蛇故事，延伸鼓励检验	检验任务，每日 1-5 人
第五周：修通	(1) 上周反馈、检验分享；(2) 房树人反馈；(3) 生命线分享；(4) 类别故事。	近周故事、躯体扫描	天使与魔鬼，大小我沙具辅助并觉察	检验任务，撰写大小我感悟
第六周：类别	(1) 检验反馈分享；(2) 选取大小我沙具、思考大小我；(3) 团体沙盘	生命线、近周故事、躯体扫描	T 小组训练法、父母我概念、引入 TA 理论	检验任务，撰写父母我感悟
第七周：领悟	(1) 上周反馈、近周思考；(2) 就幼稚性、现场继续修通、类别；(3) 重温正念觉察；	理想我、墓志铭	临终练习，辅导情感卷入成员	撰写感悟日记
第八周：成长	(1) 上周领悟；(2) 就幼稚性、现场继续修通、类别；(3) 益处反思和展望。	“理想的我”的探索 and 发现	赠别、赠言、告别仪式	鼓励领悟成长，并后测



1.3 干预方法: 干预组全程参与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 对照组不参与。干预组由曾系统学习认识领悟疗法课程且通过项目内部师资磨课演练的资深专职心理咨询师担任团辅主持, 由心理咨询师担任或民警心理辅导员担任助教。项目严格依据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课程表(见表1)实施。干预组共五期每组10名罪犯, 为12人团辅小组形式。每次活动为2-2.5小时, 所有成员均全程参加了项目。

#### 1.4 研究方法:

1.4.1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分别在项目开展前和结束后进行前测、后测, 使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

1.4.2 采用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委托浙江省警官学院自编的“罪犯暴力量表(V-HCR16)”进行了项目前和项目后危险性评估。

1.4.3 采用国际通用的心理年龄自测表<sup>[8]</sup>(包括办事的果断性、处事方法、办事效率、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记忆力、情绪控制、兴

趣爱好、生活追求、自信心等方面, 共30项, 每个问题分为“是”、“中间”和“否”3个等级, 总分0~76分), 测试罪犯的心理年龄总分, 将总分与心理年龄范围评估表对照, 找出所属心理年龄范围(总分0~30分, 心理年龄为20~29岁; 总分30~50分, 心理年龄为30~39岁; 总分50~65分, 心理年龄为40~49岁; 总分65~75分, 心理年龄为50~59岁; 总分>76分, 心理年龄为>60岁)。总分越高, 心理年龄越大。

#### 2. 结果分析

2.1 SCL90前测数据的组间比较和常模比较结果(见表2)

2.1.1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Levene检验方差不齐, 使用t'检验), 比较干预组、对照组罪犯SCL90前测数据, 未及显著性差异。

2.1.2 采用单样本t检验, 分别用两组罪犯前测数据与常模比较。结果显示, 对照组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它各因子均显著高于常模。

表2、前测SCL-90组间比较和常模比较结果

	对照组前测 (n=50)	干预组前测 (n=50)	国内常模 (n=1388)	$t_1/(t_1')$	$t_2$	$t_3$
躯体化	1.94±0.89	2.42±0.94	1.37±0.48	-1.697	2.907**	5.086** *
强迫	2.09±0.86	2.57±0.96	1.62±0.58	-1.633	2.416*	4.371** *
人际关系敏感	1.98±0.96	2.35±1.08	1.65±0.51	-1.120	1.526	2.863*
抑郁	2.07±0.97	2.69±1.05	1.50±0.59	-1.935	2.632*	5.112** *
焦虑	1.89±1.02	2.34±1.13	1.39±0.43	-1.342	2.191*	3.810**
敌对	1.99±1.15	2.43±1.12	1.46±0.55	-1.203	2.044	3.865**
恐怖	1.51±0.71	1.90±1.24	1.23±0.41	(-1.247 )	1.765	2.440*
偏执	1.90±1.12	2.27±1.11	1.43±0.57	-1.057	1.898	3.422**
精神病性	1.76±0.89	2.22±1.12	1.29±0.42	-1.448	2.392*	3.771**
其它	2.09±0.91	2.71±1.02	/	-2.008	/	/

注: 1.  $t_1(t_1')$  对照组与干预组前测数据的t检验与t'检验, 凡使用t'检验即说明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在0.05水平上拒绝假设;  $t_2$ 表示对照组与国内常模比较;  $t_3$ 表示干预组与国内常模比较; 2. “\*”,  $p<0.05$ ; “\*\*”,  $p<0.01$ ; “\*\*\*”,  $p<0.001$ 。

## 2.2 SCL90 前、后测数据组内比较结果

2.2.1 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对照组前、后测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强迫、抑郁因子分后测较前测显著降低 ( $P<0.05$ )。

## 2.2.2 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干预组前、后

测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后测较前侧抑郁因子分极显著下降 ( $P<0.01$ ),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其它(睡眠、饮食,下同)因子分显著下降 ( $P<0.05$ )。(见表 3)

表 3、两组 SCL-90 前、后测组内比较结果

	对照组前测 (n=50)	干预组前测 (n=50)	对照组后测 (n=50)	干预组后测 (n=50)	t <sub>1</sub>	t <sub>2</sub>
躯体化	1.94±0.89	2.42±0.94	1.73±0.99	1.89±1.01	2.003	2.012
强迫	2.09±0.86	2.57±0.96	1.79±1.01	1.93±1.08	2.297*	2.319*
人际关系敏感	1.98±0.96	2.35±1.08	1.69±0.83	1.83±0.80	2.030	2.380*
抑郁	2.07±0.97	2.69±1.05	1.74±0.85	1.93±0.99	2.166*	3.100**
焦虑	1.89±1.02	2.34±1.13	1.69±0.97	1.81±1.03	1.476	2.008
敌对	1.99±1.15	2.43±1.12	1.81±1.15	1.97±0.93	0.999	2.306*
恐怖	1.51±0.71	1.90±1.24	1.45±0.67	1.46±0.86	0.455	2.031
偏执	1.90±1.12	2.27±1.11	1.71±0.98	1.71±1.06	1.436	2.480*
精神病性	1.76±0.89	2.22±1.12	1.59±1.01	1.86±1.05	1.465	1.756
其它	2.09±0.91	2.71±1.02	1.91±0.99	2.09±1.03	1.511	2.551*

注: 1. t<sub>1</sub>: 对照组前后测配对 t 检验; t<sub>2</sub>: 干预组前后测配对 t 检验。2. “\*”,  $p<0.05$ ; “\*\*”,  $p<0.01$ 。

## 2.3 暴力风险危险性评估和违规情况变化

2.3.1 干预组项目项目后极高度降为中度 3 人, 高度降为中度 6 人, 中度降为低度 26 人。对照组项目项目后高度降为中度 2 人, 中度降为低度 11 人。

2.3.2 五期干预组罪犯在参加项目前三月内共有狱内违纪(包含吵架、打架、不服管

理等)共计 27 起, 项目实施的二个月内仅发生 3 起, 项目实施后三月内发生 5 起。五期对照组罪犯在对照的干预组罪犯开展项目前三月内共有狱内违纪次数共计 20 起, 项目实施的二个月内发生 8 起, 项目实施后三月内仅发生 11 起。

## 2.4 暴力风险危险性心理年龄变化

表 4、两组心理年龄前测组间和前、后测组内比较结果

	对照组前测 (n=50)	干预组前测 (n=50)	对照组后测 (n=50)	干预组后测 (n=50)	t <sub>1</sub>	t <sub>2</sub>	t <sub>2</sub>
心理年龄总分	39.14±8.14	41.00±9.06	39.58±7.96	45.64±8.76	1.080	-1.776	-14.312**
							*

注: 1. t<sub>1</sub> 干预组与对照组前测独立样本 t 检验; 2. t<sub>2</sub>: 对照组前后测配对 t 检验; 3. t<sub>3</sub>: 干预组前后测配对 t 检验。4. “\*\*\*”,  $p<0.001$ 。

2.4.1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比较干预组、对照组罪犯心理年龄自测表总分, 未及显著性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对照组前、后测组

内比较, 未及显著性差异。

2.4.2 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干预组前、后测组内比较。结果显示, 后测较前侧总分极显

著上升 ( $P<0.001$ )。(见表 4)

### 3. 讨论

#### 3.1 SCL90 前测数据的组间比较和常模比较解释

3.1.1 干预组、对照组罪犯前测数据未及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组被试带有同质性,符合随机抽样。

3.1.2 干预组、对照组罪犯前测数据与常模比较说明了暴力风险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常人,特别是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精神病性五个方面两组罪犯均显著低于常人。

#### 3.2 SCL90 前、后测数据组内比较结果讨论

3.2.1 对照组前、后测组内比较显示,强迫、抑郁因子分后测较前测显著降低。这说明经监狱危险性评估显示有暴力风险后,在传统的五大改造手段作用下,暴力危险罪犯心理健康水平也略有提高,特别是在强迫、抑郁这类显性症状上,传统的个别教育或心理辅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2.2 干预组前后测组内比较显示的大量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项目疗效,也符合项目组姊妹项目和既往实践的期待<sup>[6-7,9]</sup>。后测较前测抑郁症状极显著改善说明了项目对不仅旨在成长,也就抑郁、自杀自残等向内暴力有疗愈。向内暴力是指罪犯由于与正常社会产生了隔离,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弱化或失效,强化了敌对性、攻击性情绪,监狱管理对罪犯对外的攻击行为起到了遏制作用,这就致使部分罪犯的攻击性转向了自己本身,如果这些不良情绪得不到恰当、及时的干预和疏导,很可能造成罪犯自杀或自伤自残的行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睡眠、饮食方面的显著改善说明了项目的整体效果,也符合团辅式认识领悟成长项目中的相应设置点的起效。项目有针对强迫症状的自由联想式回家作业、精神分析理论和防御机制的认识领悟,有针对偏执、敌对症状的检验、修通、类别环节,有针对人际关系敏感的 T 小组训练,也有针对睡眠、饮食的觉察和幼年我意象对话

环节。特别是相比对照组,干预组表现出的显著改善点也基本符合项目期待。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在组内活动时充裕的时间,组员的讨论与分享会很充分,这对于描述感受、认识检验、类别修通和领悟成长更有帮助。小组反馈和交流过程中团辅主持现场运用认识领悟的核心技术可以撼动罪犯的思维固定模式,以指出问题的幼稚性为出发点,要远比提醒组员有不良认识,远比通过技术或辩论来纠正或督促其接受合理信念更容易让组员接受。特别在回忆早期幼年经历的环节,让组员的思考和回忆变得开阔和灵活,也更利于组员关注自己的成长。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当组员意识到自己的脾性或问题源于幼年创伤事件的影响时,更乐意积极地去和内心受伤的小孩进行连接和对话。所谓“影响你的是你对原生家庭的态度而非原生家庭,”当组员明白幼年创伤不可避免、人人皆有的时候,便更乐于回忆并重新对待创伤事件,借以成年人的思维和当时的幼年我进行交流,并充分抚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组员的这些变化主要是小组成员自行领悟成长的,并非来自咨询师的刻板灌输,这里有认识领悟疗法各类技术的作用,更有团辅神奇“圆圈”的加持,使得诸如检验、类别、修通等技术得以在活动中更迅速、更便捷地得到反复使用。最终让小组成员得以摆脱“幼年心理的奴役”,认识到暴力冲动行为的“幼稚性和幼年痕迹”,从而以一个成年人的思维促使人格趋向自我完善。

#### 3.3 暴力风险危险性评估和违规情况变化讨论

3.3.1 干预组、对照组罪犯暴力风险危险性评估结果的变化,说明干预组罪犯暴力风险下降幅度好于对照组,这和国内文献基本相符<sup>[10-12]</sup>。浙江省监狱系统的危险性评估采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罪犯暴力量表(V-HCR16)答案,量表涉及一般特征(9项)、近三个月内关键事件(7项)、近三个月内异常表现(3项)和特殊情形(2项)共21项构成。虽然量表涉及预警项,不能简单的通过换算得到分

值进行统计分析,但从下降幅度来看,还是能够看到明显的差异。针对特殊类型罪犯的项目化矫治项目,相比传统教育有着节约警力和时间、实施范围广、可调动小组推动力量、促进主动改变和领悟成长等优势。特别是认识领悟疗法本就不象经典精神分析法那样费时、费力,它原理明了、方法步骤清晰、操作简便,再辅以团体心理辅导的项目形式更显规范和成效。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核心是确保监管安全,提高改造质量,帮助罪犯培养健康心理,塑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认识领悟疗法除了具有灵活性大、疗效好、疗程短、易于来访者接受等特点能够确保监管安全之外,还具有促进来访者的成长,增长其心理年龄、社会年龄的特点,从而不断提升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从容地面对挫折和多变的环境,为刑满释放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干预组仍有 8 人处在中高暴力风险,且对照组也有 6 人下降了风险等级。这可能因“禀性难移”导致一般特征、特殊情形项目计分难以改变,也可以说明对照组在接受监狱的五大改造手段也有积极的成效。

3.3.2 项目后干预组的狱内违纪次数少于对照组,这和国内文献基本相符<sup>[13]</sup>。暴力风险罪犯的狱内违纪行为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特别是暴力风险罪犯在项目实施前三月内的狱内违纪行为普通较多,而在相应惩戒之后的几月内一般狱内违纪发生率会普通降低。本文提及的违纪事件不仅指吵架、打架、不服管理等与暴力直接相关的事件,也包含自杀自残、习艺差错等间接事件,可能在指向性上有所欠缺,但也可能有项目疗效的影响。项目组正在进行新一轮有针对性的实践研究,期待得以实践检验和修复完善。

#### 3.4 暴力风险危险性心理年龄变化

3.4.1 干预组、对照组罪犯前测数据未及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组被试带有同质性,符合随机抽样。对照组前、后测组内比较未及显著性差异,符合预期,说明对照组罪犯未引入心

理年龄概念、未开展认识领悟疗法的情况,两月后心理年龄无显著变化。

3.4.1 干预组前、后测组内比较显示极显著性差异,说明经八周项目后,干预组罪犯心理年龄普遍提高。这符合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认识领悟疗法增长了干预罪犯的心理年龄,项目促进了干预罪犯的心理成长。心理年龄是一个人某一阶段所显示出来的心理状况或水平,它反映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文显示干预组心理年龄的增长伴随着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这与范菊仙的研究相反<sup>[14]</sup>。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实际年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所谓的“心理老化”不仅不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变差,反而会变好。

#### 3.5 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3.5.1 暴力风险的量表检验。本项目在设计阶段由于定位清晰,仅使用症状自评量表测量了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因为国内外尚无权威的暴力风险相关量表,也因为项目时间设置的原因,项目未采用暴力风险相关专用量表和特定症状的心理测量。如愤怒自评量表、状态愤怒量表(SAS)、特质愤怒量表(TAS)和愤怒表达量表(Ax)、攻击性问卷(AQ)或自编相关攻击性、冲动性、攻击行为等方面的自评量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价值,项目虽然能够说明对心理健康水平的显著提高,但并不能更科学的描述在降低暴力风险方面的成效。

3.5.2 本项目的样本量较小、跟踪时间短。因为项目时限、认识领悟疗法资深心理咨询师的缺乏、未进行标准化推广等原因,项目目前仅限在一所监狱的评估矫治中心进行内部课程设计、研究和标准化实践。这可能会对项目疗效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另外,本项目结束后仅随访了三个月,所以项目疗效能够持续多久,还不得而知。项目组已在在标准化项目方案中增加在周年随访进行调查反馈的内容,以期未来能够得到相关数据便于分析解惑。

3.5.3 控制变量的排除不够。首先是参与者的动机问题。因为随机分配的原因,罪犯容易出现被动和强迫的现象,可能会出现阻抗。

如若依据罪犯的报名欲望进行入组干预,又可能会出现求询意愿不同质的现象。其次是自评量表的误差问题。目前罪犯一般通过网络心理测试或集体纸笔测试,而在测试时因为指导语弱化或罪犯抵触、掩盖、敷衍等问题,可能会造成测评误差。项目组已经决定在以后项目执行时,增加前测的科学和严谨,尽量减少有测评误差的罪犯进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另外,由于本次项目实施是资深民警心理咨询师带领,也可能让干预组受社会赞许性和民警期待的影响,夸大好的方面。因此,本项目结果的解释和推广仍需要谨慎和证实,期待在未来的

实证研究中得到改进或拓展。

#### 4. 结论

4.1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能有效改善暴力危险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暴力危险罪犯的心理年龄。

4.2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有降低罪犯暴力风险、减少狱内违规的可能。

4.3 团辅式八周认识领悟成长项目初步具有标准化、规范化、针对性、有效性、可复制、可传承等特性,可以将其纳入对暴力危险罪犯开展循因循证的项目化矫正对策,并在进一步的实践推广和研究中得到证实和完善。

#### 参考文献

- [1] 徐明书. 一所重刑犯监狱狱内暴力行为调查报告[J].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8,9: 49.
- [2] Krug EG, Mercy JA, Dahlberg LL, et al. 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The lancet, 2002, 360(9339): 1083-1088
- [3] 李曙亮. 认识领悟疗法常用的几种心理治疗技术 [J]. 中国民康医学, 2012, 23( 5): 596—597.
- [4] 钱铭怡.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75-184.
- [5] 钟友彬, 张坚学, 康成俊, 等. 认识领悟疗法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194-202.
- [6] 史金芳. 强迫思维服刑人员的认识领悟疗法治疗个案报告[J]. 社会心理科学, 2014. 2-3: 199.
- [7] 史金芳. 认识领悟疗法在监狱心理矫治工作中的应用[C].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6. 9
- [8] 刘晓红主编. 护理心理学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309 - 310
- [9] 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矫治项目课题组: 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对自杀危险罪犯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J]. 中国监狱学刊, 2020. 01 (35): 107
- [10] 毛燕静. 男性成年犯冲动性攻击行为的团体干预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38-52.
- [11] 张万里. 团体心理辅导对提高女性罪犯情绪稳定性的有效性研究[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 4 (32): 108-111.
- [12] 肖玉琴, 赵辉, 文凤等. 认知行为团体矫正对未成年犯暴力风险水平的影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1 (27): 201-205.
- [13] 孙越. 冲动性暴力犯愤怒情绪的团体心理干预[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5. 6 (94): 13-17.
- [14] 范菊仙. 可变的心理年龄[J]. 老年健康, 2008. 7: 35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胜任特征构建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时勤, shik@ucas.ac.cn, 325035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李秉哲, libingzhe.ok@163.com, 325035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杨雪琪, 1029699627@qq.com, 325035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李晓琼, 604114924@qq.com, 325035

**摘要:** 通过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和团体焦点访谈, 构建了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胜任特征模型。模型包括知识技能、个性特质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 并区分为共性胜任特征和科研、工程、管理领域下的特异性胜任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 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胜任特征模型是科研机构人才理念、发展目标在人才个体上的具象化; (2) 人才开发战略中, 应以胜任特征模型为标准, 构建能力为基、理念引领、情怀树人的人才开发全流程模式。

**关键词:** 胜任特征模型, 行为事件访谈, 科技人才, 人才开发

### 1 引言

#### 1.1 科技创新需求与人才瓶颈

在国家与地区间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各国人才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水平、科研创新能力愈发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3月15日于《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文中指出,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 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提出“加快形成13项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明确要求“做优做强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浙江作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桥头堡, 已具备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和先发优势。但人才瓶颈日益凸显, 高端人才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桎梏。数字经济产业、智能装备产业、生命健康产业、新材料产业领域紧缺高端人才。而以浙大为代表的高校系、以阿里巴巴IPO后出来创业的阿里系、以千人计划人

才为代表的海归系、以创二代新生代为代表的浙商系人才数量有限, 远远不能满足浙江企业对于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由此可见,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也是促进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但是目前的人才短缺问题明显制约了浙江高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瓶颈亟待突破。

目前, 我国科技人才总量众多, 但创新能力突出的跨学科人才匮乏, 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 人才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的问题是: 随着我国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发展, 人才规模逐渐扩大, 现阶段高端人才开发的主要矛盾由数量不足向精度不足转变,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问题逐步显现。以心理学前沿成果为基础的人格、兴趣、特质等要素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所占权重越来越高。因此, 应着眼于科技人才选聘、评估、培养的全流程标准, 从准确、便捷、可操作的人才标准构建入手, 探索能够准确反映中国科技人才特色的胜任特征模型。

#### 1.2 新型混合所有制科研机构——之江实验室

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委、省政府重点打造的科研机构, 于2017年9月6日正式揭牌成立, 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混合所有制的新型科

研机构之一。之江实验室聚焦国家实验室布局领域及国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重点领域,立足浙江现有科研基础与优势,聚焦网络信息技术前沿,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以泛智能、强实时、高安全为抓手,以未来网络计算和系统、泛化人工智能、泛在信息安全、无障感知互联、智能制造技术为方向,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推进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的有机互动和深度融合。

目前,之江实验室已经形成包括科研、工程和行政管理序列在内的人才队伍和中心-科研团队架构下的科研架构。这一不同于传统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新型科研机构,表现出颇具特色的科研能力和人才需求。

因此,研究从之江实验室这一颇具特色的新型混合所有制科研机构入手,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计算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科研领域中科研人才的胜任特征模型,为科研领域的人才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 1.3 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进展

胜任特征(Competency)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管理科学之父泰勒的“管理胜任特征运动”(Management Competency Movement)。泰勒用“胜任特征”的概念指代不同工作活动对能力的要求(Burgoyne, 1993)。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McClelland首次采用了行为事件访谈(Behavioral Events Interview, BEI)方法进行胜任特征研究,提出“为胜任而非为智力进行测验”的观点并引发学界反响(McClelland, 1973),在胜任特征取代智力测量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胜任特征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Spencer, 1993)。而胜任特征模型

(Competency Model)则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人物角色所需要的具备的胜任特征的总和(时勘 et al., 2002)。

## 2 方法与过程

### 2.1 被试

行为事件访谈中,邀请之江实验室高层领导、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和心理学科研人员,依据2018至2020年绩效考评结果,确定绩效平庸组和绩效优异组的区分绩效指标。根据确定的指标,选定了包括科研、工程、管理序列的共16名科技人才参加行为事件访谈。其中,绩效优异者8人,绩效平庸者8人,年龄从29岁至48岁。访谈采用双盲设计,访谈人员和被访谈者事先均不知道样本所属于绩效平庸组还是绩效优异组。

团体焦点访谈中,邀请所有访谈参与者、之江实验室领导、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和心理学科研人员进行当面对谈。

### 2.2 工具设计

研究事先设计了《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和《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其中,《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包括引导语、访谈程序、注意事项和具体问题,提供纸质版供被访谈者使用;《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包括引导语、访谈程序、注意事项和通过初步编码建立的胜任特征模型,提供纸质版供团体焦点访谈供被访谈者参考。

研究所采用的《胜任特征编码词典》由在时勘(2001)等人修订的《胜任特征词典》基础上进行修订。词典包括现有研究确定的通用20项胜任特征,在实际编码过程中,我们又根据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进行再次修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特异性胜任特征。

### 2.3 行为事件访谈与编码

访谈在安静的封闭房间进行,所有流程严格依照《行为事件访谈提纲》进行操作。在被访谈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对于访谈中的行为表现等补充信息进行文字整理,为胜任特征编码进行补充。

访谈录音采用科大讯飞提供的API接口予以转录,在校对后整理为16分文本材料,共约14万字。编码采用背靠背编码的方法,

由两名受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依照《胜任特征编码词典》分别独立进行编码。

#### 2.4 数据处理和胜任特征模型 M1

对独立编码者的编码数据进行汇总,针对绩效优异组和绩效平庸组在每一胜任特征上表现出的频次和等级进行比较分析,而后采用 SPSS 26.0 进行差异性检验,构建胜任特征模型 M1。

#### 2.5 团体焦点访谈和胜任特征模型 M2

将胜任特征模型 M1 录入《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团体焦点访谈在封闭、安静的会议室内进行,各流程严格依照《团体焦点访谈提纲》进行。采用德尔菲循环法对胜任特征模型 M1 进行循环讨论,将访谈专家对模型 M1 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进而补充修订,最终形成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共性胜任特征和特异性胜任特征,交叉聚合为胜任特征模型 M2。

### 3 结果

在之江实验室人力资源部的支持配合下,根据绩效评估数据,邀请科技人才进行访谈。经过语音转录与编码,获得之江实验室的共性核心胜任特征 8 条,获得科研领域、工程领域、管理领域的特异性胜任特征各 9 条。

#### 3.1 共性胜任特征

共性胜任特征是所有访谈对象表现出的共有胜任特征,具体表现在知识技能、个性特质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通过访谈、编码、统计与修订,共得出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共性胜任特征 8 项(见表 1)。

#### 1.3 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进展

胜任特征(Competency)的相关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初管理科学之父泰勒的“管理胜任特征运动”(Management Competency Movement)。泰勒用“胜任特征”的概念指代不同工作活动对能力的要求(Burgoyne, 1993)。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 McClelland 首次采用了行为事件访谈(Behavioral Events Interview, BEI)方法进行胜任特征研究,提出“为胜任而非为智力进行测验”的观点并引发学界反响(McClelland, 1973),在胜任特征取代智力测量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

胜任特征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Spencer, 1993)。而胜任特征模型(Competency Model)则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人物角色所需要的具备的胜任特征的总和(时勘 et al., 2002)。

### 2 方法与过程

#### 2.1 被试

行为事件访谈中,邀请之江实验室高层领导、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和心理学科研人员,依据 2018 至 2020 年绩效考评结果,确定绩效平庸组和绩效优异组的区分绩效指标。根据确定的指标,选定了包括科研、工程、管理序列的共 16 名科技人才参加行为事件访谈。其中,绩效优异者 8 人,绩效平庸者 8 人,年龄从 29 岁至 48 岁。访谈采用双盲设计,访谈人员和被访谈者事先均不知道样本所属于绩效平庸组还是绩效优异组。

团体焦点访谈中,邀请所有访谈参与者、之江实验室领导、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和心理学科研人员进行当面对谈。

#### 2.2 工具设计

研究事先设计了《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和《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其中,《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包括引导语、访谈程序、注意事项和具体问题,提供纸质版供被访谈者使用;《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包括引导语、访谈程序、注意事项和通过初步编码建立的胜任特征模型,提供纸质版供团体焦点访谈供被访谈者参考。

研究所采用的《胜任特征编码词典》由在时勘(2001)等人修订的《胜任特征词典》基础上进行修订。词典包括现有研究确定的通用 20 项胜任特征,在实际编码过程中,我们又根据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进行再次修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特异性胜任特征。

#### 2.3 行为事件访谈与编码



访谈在安静的封闭房间进行,所有流程严格依照《行为事件访谈提纲》进行操作。在被访谈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对于访谈中的行为表现等补充信息进行文字整理,为胜任特征编码进行补充。

访谈录音采用科大讯飞提供的 API 接口予以转录,在校对后整理为 16 分文本材料,共约 14 万字。编码采用背靠背编码的方法,由两名受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依照《胜任特征编码词典》分别独立进行编码。

2.4 数据处理和胜任特征模型 M1

对独立编码者的编码数据进行汇总,针对绩效优异组和绩效平庸组在每一胜任特征上表现出的频次和等级进行比较分析,而后采用 SPSS 26.0 进行差异性检验,构建胜任特征模型 M1。

2.5 团体焦点访谈和胜任特征模型 M2

将胜任特征模型 M1 录入《团体焦点访谈提纲》。团体焦点访谈在封闭、安静的会议室

中进行,各流程严格依照《团体焦点访谈提纲》进行。采用德尔菲循环法对胜任特征模型 M1 进行循环讨论,将访谈专家对模型 M1 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进而补充修订,最终形成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共性胜任特征和特异性胜任特征,交叉聚合为胜任特征模型 M2。

3 结果

在之江实验室人力资源部的支持配合下,根据绩效评估数据,邀请科技人才进行访谈。经过语音转录与编码,获得之江实验室的共性核心胜任特征 8 条,获得科研领域、工程领域、管理领域的特异性胜任特征各 9 条。

3.1 共性胜任特征

共性胜任特征是所有访谈对象表现出的共有胜任特征,具体表现在知识技能、个性特质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通过访谈、编码、统计与修订,共得出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共性胜任特征 8 项(见表 1)。

表 1 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共性胜任特征

维度	名称	内涵
知识技能	审辩质疑	审辩质疑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指通过巧妙地运用思维内在的结构和用智能标准对思考施加影响。青年科技人才应当秉持“尊重真理,但不信奉真理”的信念,才能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探索出新。
	创新前瞻	创新前瞻是另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指目光长远地提出有别于常规的见解,为满足理想化需要或社会需求,而改进创造新的事物。青年科技人才应当具备广阔且深远的创新前瞻思维,探前人所未见,行前人所不能。
	理性开放	理性开放是青年科技人才在审慎认识基础上的对外界事物的包容接纳态度。青年科技人才应当视野广阔,思维开通解放,既不迷信盲从,也不摇摆飘忽。
个性特质	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情感上表现为个体对祖国的认同,行动上表现为促进祖国发展。之江实验室的科研人才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其做出回国奉献的抉择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
	严谨求实	严谨求实是态度严肃谨慎、行动讲求实际。之江实验室大多从事基础性科学研究,应当尊重科学规律,细致、周全、客观、冷静地探索才能确保研究稳步进行。
	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是家国情怀的延续,即敢于主动担责、勇于牺牲奉献。之江实验室从建立伊始就树立了“做高校做不了企业不愿做的事”的理念,众多科研人才怀揣对该理念的认同前来工作,体现了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社会交往	协作民主	协作民主是在目标实施过程中,部门与部门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协商与配合,它建立在所有个体对事务享有发言权利的基础上。之江实验室构建了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学科带头人的三级科研体系和管理、科研、工程协同协作的创新型人才架构。体系和架构的稳定有赖于协作民主的基本原则。
	转心向学	转心向学指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对纯粹科学理想进行不懈追求,它是建立在个体自我选择上的产物。纯粹并非天真,向学也非闭塞,而是科研人员主动树立人生目标、做出利弊权衡并最终选择。

3.2 特异性胜任特征 构了包括管理领域、科研领域和工程领域在内  
针对之江实验室的科技人才队伍结构,建 的不同序列人才的特异性胜任特征(见表2)。

表2 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特异性胜任特征

人才领域	一级特征	二级特征
管理领域	服务取向	关注需要
		发展他人
		体贴入微
		深层沟通
	变革型领导	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领导魅力
		个性化关怀
	人际敏感	信息收集
		人际洞察
		影响他人
		关系建立
科研领域	创新发展	变革创新
		灵活应变
		危机应对
		抗逆发展
	战略意识	国际视野
		勇于开拓
		合作竞争
		前景预判
	团队建设	组织引领
		人际沟通
		团队合作
		价值聚合
工程领域	项目推动	任务导向
		关注秩序
		求真求细
		严谨务实

	知识技能	基本能力
		计算编程
		数据处理
		系统操作
	成就动机	积极进取
		兴趣驱动
		自信乐观
		追求卓越

4 结论与讨论

在结合文献研究、战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根据行为事件访谈和团体焦点访谈构建了之江实验室科技人才的胜任特征模型。这些核心胜任能力根据之江实验室人才序列，主要应用于科研领域、工程领域、行政领域的人才开发，特别利于后期的培训、考核和人员选拔时采用。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1）根据现有访谈调研结果，探索出以之江实验室科研人员为代表的青年科技人才胜任特征模型。“责任担当”、“创新前瞻”、“纯粹向学”等共性核心胜任特征的发现，印证了之江实验室在价值观树立上“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以无我之境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总体思路。研究认为，“之江定义”下青年科技人才的核心胜任特征模型，是之江实验室“做高校做不了企业不愿做的事”理念的延展，更是其“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目标在人才个体上的具象化。

（2）在之江实验室未来的人才开发战略中，应以青年科技人才的核心胜任特征模型为基础，紧密围绕之江价值观建设，构建能力为基、理念引领、情怀树人的人才开发全流程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将青年科技人才的核心胜任特征模型融入人才开发的选聘、定岗匹配、评估考核、培训发展等全流程之中。

（3）通过此轮调研访谈，我们也收集到诸多来自一线科研人员对之江实验室整体发展的意见建议，具体来说，应当从改良考核机

制、健全反馈渠道、灵活制度执行和保持科研定力四个方面继续完善。之江实验室着眼基础性、长期性科学研究，科研成果的产出形式与传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应改革以论文论高低的传统方式，从人才选聘培养入手，积极探索，建立充分互信基础上的多元化考评机制。同时，之江实验室建立了较为扁平化的科研架构，但上下沟通仍有较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科研、工程人员与上级的沟通往往需要经过PI、行政两层，造成沟通效率较低，基层声音难以传达至决策层，导致上级决策存在与现实脱节的状况。在人员流动、科研设施申购等方面，部分制度被刻板执行，人才难以自由流动，科研设备需求难以被满足，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此类细节条目的执行应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灵活执行。最后，先进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挑战、阻碍甚至失败，成果的科研影响和社会效益可能短期内也无法显现。此时，应保持科研定力，允许试错、允许犯错，才能保障之江战略定位下科研成果的最终产出。

由于调研样本量的限制和之江实验室的演进历程，未来仍需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坚持开发胜任特征自动化建模系统的智能化工具，为大批量、高效率的胜任特征模型构建提供可能。进而构建起囊括“卡脖子”关键领域的高端人才关键性岗位胜任特征模型，形成海量数据库，助力之江发展与科学精进。

## 参考文献

- 时勘, & 侯彤妹. (2002). 关键事件访谈的方法. *中外管理导报*(03), 52-55.
- 时勘, 王继承, & 李超平. (2002). 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模型评价的研究. *心理学报*(03), 306-311.
- 时雨, 仲理峰, & 时勘. (2003). 团体焦点访谈方法简介.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01), 37-40.
- 张杰, & 吴书凤. (2021). “十四五”时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障碍与突破路径分析. *人文杂志*(01), 9-19.
- 仲理峰, & 时勘. (2003). 胜任特征研究的新进展. *南开管理评论*(02), 4-8.
- 庆海涛, 陈媛媛, 关琳 & 丁炫凯. (2016). 智库专家胜任力模型构建. *图书馆论坛*(05), 34-39.
- 聂继凯 & 危怀安. (2015). 国家实验室建设过程及关键因子作用机理研究——以美国能源部 17 所国家实验室为例.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0), 50-58.
- 潮龙起. (2014). 高校高层次海归人才现状及其作用研究——以中央“千人计划”为中心. *东南亚研究*(04), 57-63.
- 闫燕. (2012). 海归知识员工组织支持感和主动性人格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
- 李平 & 许家云. (2011). 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季刊)*(03), 935-964.
- 李晶. (2008). 逆向文化冲击中的文化适应(硕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 王晓莺. (2008). 海归人才群体现状、引才问题及对策思考.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01), 66-69+65.
- 李晓轩, 牛珩, 冯俊新. (2005). 科研拔尖人才的成才规律与启示. *中国青年研究*(04).
- 夏松, 张金隆. (2004). 关于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若干思考. *研究与发展管理*(05), 97-101+119.
- Spencer, L.M(1993). *Competence at w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 Burgoyne, J. G. (1993). The competence movement: Issues, stakeholders and prospects. *Personnel Review*.
- McClelland, D. C. (1973).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1), 1.

(责任编辑: 史金芳)



## 长江三角洲高端人才智能匹配的初步探索

时勘<sup>1</sup>王译锋<sup>13\*</sup>宋旭东<sup>1</sup>王明山<sup>2</sup>方鹤<sup>2</sup>覃馨慧<sup>1</sup>焦松明<sup>1</sup>  
(1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教育学院, 温州 325035  
2 重庆云日集团 重庆 400014)

**【摘要】** 高端人才指在各个行业内拥有着丰富知识储备、优秀专业能力的人才。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领先地区, 与美国纽约地区的发展对比结果表明, 我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 某些领域高端人才紧缺、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不均衡等问题突出, 为此, 之江实验室邀请我院前往解决人职匹配机制瓶颈问题: 一方面是通过心理测评技术获得求职群体的岗位能力素质和人格特征的要求, 寻求关键领域核心科技人才的心理素养的可操作的测量标准; 另一方面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型岗位的不同的职业特征要求。我们通过战略分析、工作分析, 在此基础上, 借助大数据集成, 将大范围各地区紧缺岗位的职业要求与求职人员的心理特征相匹配, 进而设计出新型的结构化面试和投射测验等方法, 对于已经人职匹配的岗位进行分门别类的测试。目前, 通过工作分析和人格测试的大数据集成收集数据, 已经将人员按照科研、工程和管理进行分类, 完成了人才智能匹配的初步研究, 这项研究以高效率与精准性提升人员招聘的成效, 为下一步关键行为事件访谈, 获取核心胜任特征模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高端人才的职业需求; 职业人格测试; 大数据集成; 人职匹配; 智能评估。

### 引言

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 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 互联网、机器人、5G等技术的出现和使用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深刻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形式。日趋紧张的国际竞争, 其背后是各国的人才之争, 谁拥有更多的高端人才, 就能在大国重器的铸造中更好的把控主动权; 而着眼我国当前情况, 人才总量很大但结构性矛盾突出, 其中高层次人才尤其是一流领军人才的匮乏是我国人才资源的薄弱之处。

高端人才又可以称为高层次人才, 是指在各个行业内拥有着丰富知识储备、优秀专业能

力以及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前瞻目光的人才, 通常处在行业中心位置, 是国家与地区人才培养的重点, 也是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 对于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 如何寻觅高端人才, 引导他们到达合适的岗位发挥自身价值、助推国家科技发展与产业进步, 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针对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人职匹配问题进行分析, 以核心胜任特征网络测评与培训系统为基础, 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集成与智能评估的, 以职业人格测试为基础的人职匹配新模式。

### 1 研究基础与问题提出

#### 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人才发展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创新和发展需求为基础, 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面对日益紧迫的国际竞争压力,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强化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亟待产生突破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诸多研究表明, 人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评估重点项目《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成长评估模型研究》(19FCLA002)的资助。通讯作者: 王译锋, 电子邮箱: fs\_wyf1997@foxmail.com

的发展<sup>[1-4]</sup>，可以认为，高端人才在其中起到基础且多元的作用，高端人才紧缺、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不均衡、不明显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人职匹配机制瓶颈亟需突破。本文旨在探索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的职业要求，并探索高端人才在职业心理特征方面可供操作的测量标准，通过大数据集成将各地区紧缺岗位职业要求与求职人员心理特征相匹配，提升高端人才选拔质量并实现人力资源宏观供求关系可视化。

## 1.2 人职匹配问题的研究现状

### 1.2.1 人职匹配的概念与影响因素

1903 年，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中人与职的匹配：“工作只要是对员工来说是合适的，那么这个工人就是第一流的”<sup>[5]</sup>。员工属性与岗位属性间的一致程度是人岗匹配度的基本定义。<sup>[6]</sup>其中，除了工作能力与岗位要求的适配外，<sup>[7,8]</sup>人格因素在其中也占据较大比重。因为具有相同职业能力的个体，可能因为职业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性而有不同的工作表现，所以准确分析不同个体间的职业心理差异是人职精准匹配的前提之一，而心理测验则是判定个别差异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人才选拔环节。

### 1.2.2 工作分析与招聘方式对人职精准匹配的影响

工作分析作为一个收集工作相关信息的

系统过程，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起着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企业招聘的决策基础。O\*NET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是一项由美国劳工部组织发起，吸收了多种工作分析问卷(如 PAQ、CMQ 等)优点的工作分析系统，可以使人们了解有关工作多方面信息，如工作风格、技能、知识领域、工作情境和工作特征等，各国学者使用 O\*NET 在美国、新西兰、中国、中国香港四地进行施测，证实了获得的工作职位信息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有较为可观的适用性<sup>[9]</sup>。

基于文凭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的招聘方式因其具有权威性、推广效率高、统一体系、筛选便利等优点广为应用。然而，由于近年来的文凭膨胀效应，经文凭与职业资格两方面的筛选后，面试候选人基数依然很大，具有高水平、高能力、岗位高适配性的目标求职者难以识别，且难以深入到员工心理层面的职业特征。因此，在批量筛选求职者后，用人单位一般会通过职业心理测试和结构化面试等方式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的筛选。据此，我们提出，通过分析岗位工作要求总结出人才需求，并探索出一般人员心理层面的测量标准，进而转化为各岗位人才选拔标准，通过大数据集成实现员工心理特征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初步匹配，从而在人力资源市场与企业间建立一个智能沟通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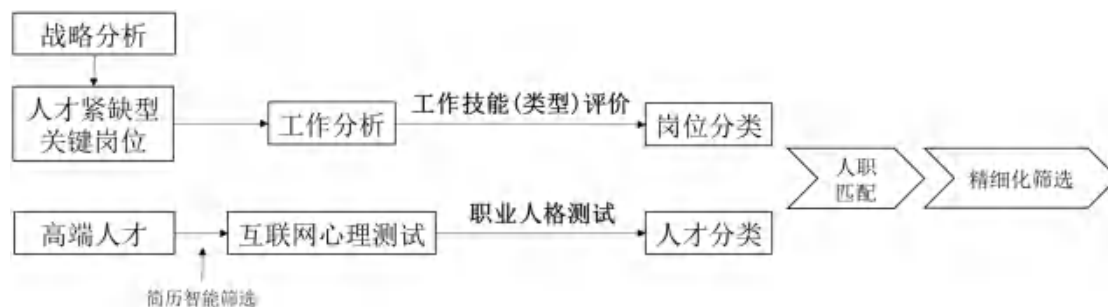


图 1 高端人才人职智能匹配过程示意图

## 1.3 心理测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 1.3.1 霍兰德职业人格理论

美国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德从个体特征与

要素维度出发，提出六种人格类型和六种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模式（见表 1），且大多数人都属于六种职业类型中两种以上类型的不同组

合,用六边形模型来表示六种人格、职业类型的相互关系如图 2 所示,其职业满意感、稳定性和职业成就取决于个体人格类型和职业环境的匹配与融合程度。<sup>[10]</sup>在此基础上,霍兰德

编制了职业人格自测问卷,被试可通过测验测量人格类型,为其职业选择提供较为明确的方向,企业也可依据被试职业人格特质与岗位性质间的匹配程度进行选拔。

表 1 职业人格类型分类表

职业人格类型	人格特征	职业特征
现实型 (R)	非社交的、物质的、遵守规则的、实际的、安定的、缺乏洞察力的、敏感性不丰富的、不善与人交往等特征。	需要进行明确的、具体的、按一定程序要求的技术性、技能性工作。
研究型 (I)	分析的、内省的、独立的好奇心强烈的、谨慎的、敏感的、喜好智力活动和抽象推理等特征。	通过观察、科学分析而进行的系统性的创造性活动研究对象侧重于自然科学。
艺术型 (A)	想象力丰富、理想的、直觉的、冲动的、独创的、但是秩序性较少的、感情丰富、但缺乏事务性办事能力等特征。	通过系统化的、自由的活动进行艺术表现,但精细的操作能力较差。
社会型 (S)	助人的、易于合作的、社交的、有洞察力的、重友谊的、有说服力的、责任感强的、比较关心社会问题等特征。	从事更多时间与人交往的说服、教育和治疗工作。
管理型 (E)	支配的、乐观的、冒险的、冲动的、自我显示的、自信的、精力旺盛的、好发表意见和见解的、但有时是不易被人支配的、喜欢管理和控制别人的等特征。	从事需要胆略、冒风险且承担责任的活动。主要指管理、决策方面的工作。
常规型 (C)	自我抑制的、顺从的、防卫的、缺乏想象力的、持续稳定的、实际的、有秩序的、回避创造性的活动等特征。	严格按照固定的规则、方法进行重复性、习惯性的活动,希望较快地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有自控能力。

### 1.3.2 职业人格测试量表的本土化

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又称“潜在特质理论”或“潜在特质模型”,是现代测量理论的一种,认为被试存在一种“潜在特质”,被试在某项测验中的反应与潜在特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在认知测验中,常以被试的测验总分作为被试某项潜在特质水平的估计。<sup>[11]</sup>其意义在于对测验项目筛选和测验的编制提供指导。这一理论是职业人格自测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也为职业人格自测问卷的本土化提供指导依据。莫文斌、时勘等人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积淀,形成了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极高信效度的霍兰德职业人格测试问卷,并在人力资源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 1.4 大数据方法在人职匹配中的应用

大数据是需要采用新处理模式才能使其

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一般具有大量 (volume)、高速 (velocity)、多样 (variety)、价值 (value) 四个特点。<sup>[12]</sup>大数据分析是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可以帮助决策的隐藏模式以及其他有用信息的过程。<sup>[13]</sup>目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其在人力资源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吴波等人认为,通过挖掘应聘者发布求职信息,大数据分析能较好的帮助企业进行社会化招聘决策<sup>[14]</sup>。韩雪平将考生志愿填报、高校人才培养及应届生人才输送等问题,与人职匹配研究系统地结合起来,向下辅助考生填报志愿,向上辅助用人单位选聘人才;同时针对不同人才的类型和特点,对高职院校学生实行分类教育,精准制定教学方案和职业生涯规划<sup>[15]</sup>;朱宁等人开发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人力资源智能匹配、推荐的方法

法,通过计算简历信息与岗位需求的关键词的权重的相似度将求职者建立进行排序,为企业招聘决策提供建议<sup>[16]</sup>;周书泉等人通过大数据智能绩效评估的方式,极大提高了企业绩效考核的准确性和可信度。<sup>[17]</sup>大数据高精度、高效率的特点,为企业人才招聘与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大数据分析在人员招聘方面,对心理层面的探查与匹配深入不够,且在高端人才智能评估方面的延伸较少。本研究将在这两方面做进一步的应用和深化。

## 2 研究方法 with 结果

###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岗位的需求分析

目前,我国的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还存在“卡脖子”问题,迫切需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优势,充分激发关键领域高端人才的创新创造才能。近年来,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制裁,更让国人意识到缺乏核心和关键共性技术,已成为制约我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瓶颈所在,据《科

技日报》报道,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有35项“卡脖子”技术,包括光刻机<sup>[18]</sup>、芯片<sup>[19]</sup>、操作系统<sup>[20]</sup>、核心算法<sup>[21]</sup>、激光雷达<sup>[22]</sup>、航空钢材与设计软件<sup>[23, 24]</sup>、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sup>[25]</sup>、数据库管理系统等<sup>[26]</sup>。要掰开“卡住脖子的手”,当务之急是要针对高端产业的需要,从人才选拔与流动角度聚集一批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提高人才选拔的质量与效率。目前,本研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切的科技前沿攻关领域与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总结出21项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及7项管理、职能类岗位(表2)。针对以上关键领域,必须建立起新时期高端人才筛选与评估的智能模式,从提高人职匹配的效率入手,招募一批能够长期服务于岗位,并产出卓越绩效的高水平专业人才,以期将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中的软肋转变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的脊梁,将“卡脖子”变为“杀手锏”。



表 2 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

产业类型	关键岗位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大数据算法工程师
	人工智能项目经理
	量子通信工程师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智能集成工程师
	机械研发工程师
	机器人算法工程师
金融科技产业	区块链产品总监
	产业投资咨询师
	风控建模专家
生物经济产业	药物筛选研究员
	医疗器械技术顾问
	基因技术工程师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采购运营总监
	电驱动工程师
	项目质量工程师
集成电路产业	半导体技术工程师
	工艺整合工程师
	芯片测试工程师
空海开发产业	载人潜水器潜航员
	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质保管理工程师
管理、职能类岗位	人力资源经理
	员工援助师
	财务经理
	行政经理
	首席执行官
	首席技术总监
	首席信息总监

## 2.2 基于 O\*NET 工作分析的关键岗位职业特征

通过工作分析得出岗位的需求可作为人才选拔的依据来源。本研究通过工作技能评价问卷（35 题）<sup>[9]</sup>，探测圆满完成各岗位工作的能力，从岗位需求角度提供人职精准匹配的依

据，获得了 21 项关键性岗位职业特征，并分别对标霍兰德职业人格特征维度进行分析，形成各岗位的职业人格特质类型，据此，可将岗位需求的职业特征与求职者的职业人格特征进行匹配，从而形成可测量的人才内在职业心理特征选拔依据（表 3）。

表3 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工作分析结果

产业类型	关键岗位	职业特征	人格特征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大数据算法工程师	需要使用工具, 产出实际产品, 并独立分析, 完成定向任务, 目标导向。	研究/管理/现实型
	人工智能项目经理	产出实际产品, 具备管理才能, 分析问题并得出最终解决方案, 有灵活协调能力。	管理/研究/现实型
	网络运维工程师	洞察客户需求, 具备创造和表达能力, 且能形成实际产品。	研究/现实/艺术型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智能集成工程师	具备创造力, 具备机械方面的才能, 需要较强的协调、运筹帷幄的能力。	艺术/现实/管理型
	机械研发工程师	需要从事操作性工作, 具备观察、估测并形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注意细节和精确度。	现实/研究/常规型
	机器人算法工程师	具备逻辑分析和推理, 不断探讨未知领域, 擅长具体任务, 目标导向。	研究/现实/管理型
金融科技产业	区块链产品总监	具有经营监督和领导才能, 擅长言谈与沟通, 人脉广博, 具有创造、表达能力和直觉。	管理/社会/艺术型
	产业投资咨询师	从事提供信息和帮助的事务, 关心客户需求, 具备表达艺术, 决策能力强。	社会/艺术/管理型
	风控建模专家	从事需要胆略、冒风险且承担责任的活动, 分析各种可能性, 敏锐察觉社会风险。	管理/研究/社会型
生物经济产业	药物筛选研究员	注重细节, 擅长记录与整理, 从事实物工作, 分析并解决问题。	常规/现实/研究型
	医疗器械技术顾问	需要抽象、分析才能, 按照特定要求组织数据和文字信息, 从事提供专业信息的事务。	研究/常规/社会型
	基因技术工程师	需要从事操作性工作, 动手能力强, 能独立分析问题, 具有探索精神。	现实/研究/管理型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采购运营总监	需要进行组合决策类工作, 习惯记录、归档, 关注细节, 谨慎保守, 善于沟通。	管理/常规/社会型
	电驱动工程师	具有创造精神, 动作协调能力强, 注重细节, 有条理, 进行有规则的活动。	艺术/现实/常规型
	项目质量工程师	注重细节, 按照预先安排好的程序工作, 有大局观, 善于沟通。	常规/管理/社会型
集成电路产业	半导体技术工程师	需要进行明确的有一定程序要求的技术、技能型工作, 能独立分析问题, 善于合作。	现实/研究/社会型
	工艺整合工程师	具有艺术设计才能, 从事整体性思维的工作, 并将其用于观察、衡量, 形成最终方案。	艺术/管理/研究型
	芯片测试工程师	从事具有严格工作程序的任务, 善于独立思考, 目标导向, 推动性强。	常规/研究/管理型
空海开发产业	载人潜水器潜航员	从事需要艺术直觉的任务, 需要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实践导向。	艺术/社会/现实型
	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需要严格按照工序进行工作, 具有创造才能, 注重细节, 但思维并不保守。	现实/艺术/常规型
	质保管理工程师	谨慎保守, 要求注意细节与精确度, 表达能力强, 有监督和管理才能。	常规/社会/管理型

## 2.3 基于大数据的高端人才智能匹配研究

在基于大数据的人职匹配智能评估过程中, 简历智能筛选、职业心理测试、人岗供需对接为人职智能匹配不断深化的三个过程。面

对人才数量大、结构复杂的人力资源市场, 其具有大批量、高效率的特点。大数据技术的合理运用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 2.3.1 简历智能筛选

此阶段以人力资源市场中的求职简历, 与

高端行业特征、岗位需求间的匹配度进行初步筛选,通过文本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比简历与岗位需求间的语义拟合度进行计算,从而初步细化求职群体,缩小人职匹配的范围。百度 AI 平台依托于大数据、网页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以及高性能集群(GPU、CPU 和 FPGA),打造了基于 DNN 和概率图模型的语义计算引擎,可进行包括语义匹配、语义检索、文本分类、序列生成以及序列标注在内的计算。

首先,从各个渠道获得各岗位应聘者的求职简历,存入数据库中;然后,以工作分析结果为基础,分别归纳各岗位关键词标签并分析其权重;第三步调用百度 AI 接口,对海量简历与进行文本智能分析,将关键词与简历之间进行语义比对,按权重计算并统计每个简历与岗位信息间的匹配度;最后,将简历匹配度高于某一阈值的求职者,推荐其进行下一步的职业心理测试。

### 2.3.2 基于互联网的职业人格测试

《核心胜任特征心理测试与网络培训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

中心、温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和重庆云日集团共同研发,后端采用 MongoDB 作为数据库支撑,具有扩展性强、无模式、高性能、易管理等优势,以及面向集合的存储、动态查询、完整的索引支持、查询监视、复制及自动故障转移等特点<sup>[27,28]</sup>,支持较为复杂的量表测验系统。量表填答支持电脑端、手机端输入,受测者可进行多平台登录,采用线上、线下(答题卡读卡机)两种数据输入方式,各使用单位具备独立前台,前台架构可以独立配置,可提供不同网址指定提供量表测评服务。目前,系统可供用户注册登录并进行职业心理网络测试、生成测试报告并批量导出测试结果,为问卷填写数据的收集等提供便捷、高效的途径、手段和方法。高端人才进入系统后,首先需填写人口学信息与意向岗位,然后进入职业人格测试。个体填答完毕并提交后,系统会根据填写答案,自动计算并生成个体职业人格六大维度的分布情况。而所有职业心理测试的数据,均会被保存在内部数据库中,为人职匹配做准备。



图2 职业人格测试界面与自评结果

### 2.3.3 基于智能计算与大数据的人职匹配

人职匹配的关键阶段,是在为高端人才进行职业测试之后,与各关键岗位的岗位需求对接,实现人才类型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系统获得区域民众的职业人格测试数据后,内部的代码逻辑自动将被试群体按高分维度分为六大类型;然后,将此分类结果对标由工作分析所得各个岗位的职业需求,通过智能算法将六类人才群体与岗位类型之间连结匹配,即以

职业人格类型与岗位需求相匹配为原则,将求职者与岗位进行一一对应。匹配后的人才作为参与企业精细化筛选的备选群体。

### 2.3.4 基于 LBS 的人职匹配可视化平台的建立

系统根据人职匹配的结果,通过后端逻辑,一方面给人发送适合其岗位的信息,另一方面给企业提供满足一定匹配要求的求职者简历信息,促进社会人力资源体系与企业用人单位间的良性沟通。为后续的人才精细化筛选

创造良好条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专注于社交强关系招聘、垂直行业招聘等招聘方式正蓬勃发展,基于地理位置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的招聘通过确定移动设备或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并为用户提供与位置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简称“定位服务”,“附近招聘”和“强关系关联招聘”,正用于解决传统行业蓝领招聘难的问题。<sup>[9]</sup>本研究在获得人职匹配的信息后,在个人层面,系统可显示基于地理位置的应聘建议,企业也可查询一定范围内与岗位需求适配的高端人才;在社会层面,利用人职匹配的结果使宏观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可视化、透明化,提高政府及企业对我国人才现状的宏观把控;及时为高端人才提供岗位信息,促进宏观人才流动,推动形成良性有序的引才用才环境。

### 2.3.5 关键岗位人才画像的建立

经过初步匹配后,企业将通过结构化面试、图片投射测验等方式,深入评价求职者岗位胜任特征行为等级、成就动机等因素来进行招聘决策,并通过情境评价测试的方式考虑企业团队的组建。用户画像是通过对用户的人口属性、行为属性、社交网络、心理特征、兴趣爱好等数据进行分析,抽象提炼出的信息标签组合。<sup>[29]</sup>在面试过程中,系统搜集面试者学业履历、职业履历、兴趣爱好等各方面信息,针对岗位需求,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并与职业人格测试结果与面试过程中的表现结合起来,为企业的招聘决策提供客观建议。高端人才就职后,系统将继续进行追踪研究,对其就职期间的绩效产出、团队合作行为进行记录与统计,并利用核心胜任特征网络评测与培训系统对其进行工作绩效、工作投入、变革型领导、个体及团队抗逆力水平等方面进行 360° 评价,挑选出能够长期从事并热爱某岗位,并产出卓越绩效的高端行业精英人才,依此建立岗位职业画像,为前几个阶段的人职匹配提供结果性反馈,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进一步提高匹配效能。

### 3 讨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对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类职业甄选提出如下实践建议:

首先,当前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使组织总体战略与发展方向、内部的雇佣关系、工作和职业结构以及工作组织的业务流程在不断改变,作为人力资源决策的基础,工作分析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需求,针对当前国际竞争与国家战略中的最新情况,锚定人才需求,通过对工作技能的探讨来明晰各个关键岗位的职业特征,并以此作为前提依据,才能提升人职匹配的效率和精准性,与此同时降低招聘成本,让人力资源配置发挥最大成效。

其次,我们以霍兰德职业人格理论为支撑,通过工作分析手段对岗位的职业人格需求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岗位类型的划分也可直接对标职业人格测试的分类结果,使高端人才经过职业心理测试与分类后,可直接进行大批量的人职匹配,其所揭示的选拔标准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可操作性的特点。

再次,人格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的特征<sup>[30]</sup>。其作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心身组织,在对环境的主观选择与适应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从人职匹配的角度来讲,职业人格探讨个体是否适合参与某一特定职位并在其特定的职业环境下工作,进而也能较好地预测一般人员在岗位上是否能够长期任职,产生较高的工作投入,收获工作幸福感,产生组织公民行为<sup>[31, 32, 33]</sup>等。因此,采用以霍兰德职业人格理论为主的人职匹配方式相较于其他职业性向测试<sup>[9]</sup>(职业能力、职业兴趣、职业价值观等)更为高效且精准。因此,本研究以职业人格层面的匹配为主进行人职匹配,以提高精细化筛选的效率。

大数据集成应用于人职匹配的全过程。首先,我们通过智能词向量分析,按岗位搜集并分析海量简历在专业对口、知识与技能达标等方面的要求,能在极大程度上缩减人工简历初筛的繁琐工作,更重要的是将企业被动接受简历的地位转化为主动、积极地寻找人力资源市场的简历,迎合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的高端人

才需求;第二,基于互联网下的职业人格测试为受测者提供了方便的填写手段,更为系统对高端人才的归类提供了良好的网络背景与数据条件。在大数据分析背景下,服务器性能可通过搭建分布式节点的方式横向扩展,为某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所有关键岗位的人职批量测试与匹配奠定了技术支撑与时代基础。最后,将获得的岗位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可视化上升至国家层面,形成可视化平台,进而为政府、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形成良性有序的引才育才环境。

####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 4.1 研究结论

第一、本研究首先探究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限的外部威胁,现阶段先聚焦于高端人才的寻觅与选拔,结合国际竞争态势与国家战略,总结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1 项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与 6 项职能、管理类岗位。

第二、对每一个关键紧缺型岗位进行的工作分析总结出这些岗位的职业特征,一方面明晰了人才紧缺型关键岗位的七大职业类型,另一方面对这些岗位进行科学且客观的分析,通过工作技能要求总结出相应的岗位需求,形成可供操作与测量的人才选拔标准。

第三、基于霍兰德职业人格理论,将七大职业类型的职业特征所对应需求的人格特质类型进行分析总结,使高端人才经过职业心理

测试与分类后,可直接大批量推荐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性岗位进行下一步的甄选。

第四、本研究利用大数据与智能计算的方式,建立了一套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线、以心理学为基础、步步深入且高效的高端人才人职匹配系统,对高端人才进行大批量的职业人格测试,以探查心理层面的个人特征,这种方式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纸笔测验的时空限制,且方便测试数据的收集与分类;进而对已建立的岗位需求进行快速、大批量的人职匹配,极大提高了企业内部对高端人才精细化筛选的效率,为人力资源供给端与需求端建立了智能沟通的桥梁。

##### 4.2 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高端人才的大批量人职智能匹配模式进行探索,建立了一套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线、以心理学为基础、步步深入且高效的高端人才人职匹配系统,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工作分析尚缺乏目标岗位自身员工的评价数据,本研究中的关键性岗位归类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第二,对人职智能匹配模式的有效性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未来希望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事业单位中试点实践,检验通过职业人格测试筛选的候选人是否适配岗位需求的职业特征,还有待通过结构化面试、情景测验、投射测验等手段完善高端人才的甄选环节。

#### 参考文献

- [1] 熊励,蔡雪莲.基于人才视角的上海全球城市构建问题与对策[J].科学发展,2020(02):26-31.
- [2] 沈跃春.安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06):32-36.
- [3] 田晶,张超.江苏科技人才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科技和产业,2021,21(01):87-91.
- [4] 唐勇.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人才集聚问题[J].浙江经济,2020(05):56-59.
- [5] 刘欣婷.人职匹配理论下的曲靖市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5.
- [6] Edwards JR. Person-job fit: 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1, 6: 283-357.
- [7] Cable D M, Dorue D S. Th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subjective fit percep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87(5): 875-884.
- [8] Kristof A L. Perceived applicant fi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cruiters perception of person-job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0, 53(4): 643-667.

- [9] 时勘,张腾. 青年干部的胜任特征模型开发[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01.
- [10] 时勘,时雨.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1.
- [11] 杨治良,郝兴昌. 心理学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 [12] 河海大学《水利大辞典》编辑修订委员会. 水利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 [13] 汪友海.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17.
- [14] 吴波,王璨. 大数据背景下企业社会化招聘研究[J]. 现代商业,2016(04):86-88.
- [15] 韩雪平. 大数据时代人职匹配问题研究初探[J]. 才智,2020(10):242-243.
- [16] 朱宁,张涛,陈思雨.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人力资源智能匹配、推荐的方法[P]. 重庆市:CN110633960A,2019-12-31.
- [17] 周书田,王会宾,于海洋,王子微.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绩效管理系统[P]. 山东省:CN111461538A,2020-07-28.
- [18] 高博.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N]. 科技日报,2018-04-19(001).
- [19] 张盖伦,付丽丽.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中兴的“芯病”,中国的心病[N]. 科技日报,2018-04-20(001).
- [20] 高博.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丧失先机,没有自研操作系统的大国之痛[N]. 科技日报,2018-04-23(001).
- [21] 杨仑.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算法不精,国产工业机器人有点“笨”[N]. 科技日报,2018-05-24(001).
- [22] 崔爽.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激光雷达昏聩,让自动驾驶很纠结[N]. 科技日报,2018-05-10(001).
- [23] 孙玉松.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航空钢材不过硬,国产大飞机起落失据[N]. 科技日报,2018-05-23(001).
- [24] 张晔.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航空软件困窘,国产飞机设计戴上“紧箍咒”[N]. 科技日报,2018-05-30(001).
- [25] 高博.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拙钝的探测器模糊了医学影像[N]. 科技日报,2018-06-25(001).
- [26] 高博.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国还在寻找“正确打开方式”[N]. 科技日报,2018-07-02(001).
- [27] 余敦一. 基于Web的煤矿物联网资源抽象描述方法研究[J]. 煤炭技术,2013,32(11):324-326.
- [28] 刘愉,王立军. 基于MongoDB的EHR存储方案研究与设计[J]. 中国数字医学,2013,8(06):20-24.
- [29] 孟巍,吴雪霞,李静,王婧,杜颖,梁雅洁,王艳玫,徐美玲,林晓兰.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电力用户画像[J]. 电信科学,2017,33(S1):15-20.
- [30]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40.
- [31] Borman W C,Motowidlo S J.Expanding the criterion doma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performance[M]. 1993:71-98.
- [32] 安鸿章,时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02. 144-145.
- [33] 董林苓. 人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人与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D]. 河北大学.

(责任编辑:史金芳)



